

JOURNAL OF JIANGSU SECOND NORMAL UNIVERSITY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5 / 05

第41卷 第5期 (总第234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梅景辉

副 主 任 王 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冯保善 孙爱军

李洪天 张 莉 张 勤

姚苏平 黄光耀 蒋 波

路 明 潘 文

主 编 梅景辉

副 主 编 王 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之道:政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 李粟燕 张小晴(1)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

..... 叶一鸣 曹永森(9)

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政策思想体系的主题和逻辑

..... 刘立 贾宝余 应验(19)

“两个结合”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新及方法论启示

..... 孙萌(30)

【课程与教学研究】

“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体系:价值旨趣与实践效能

..... 刘元欣 王伟(38)

课程思政与文献学课程教学新业态的探索性研究

——以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为例

..... 朱仙林(47)

定位·结点·融合

——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双螺旋”模式构建策略

..... 王雅琴(53)

【学前教育研究】

栏目主持人/张莉

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路径与展望

——基于深层生态学的探讨

..... 廖莉(61)

“从无地方到地方”:地方教育学视域下幼儿园园本课程的重构进路	
.....	滕 艳 张 莉 (70)

【高等教育研究】

高校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究	
.....	祁 麟 (79)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以“1345”培养模式为例	
.....	张少杰 孟令豪 肖铁桥 (87)

【历史与文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探究	
.....	郭进萍 (95)
布热津斯基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薛鹏程 (104)
《道德经》造物审美意蕴探析	
.....	高云庭 (112)

Main Contents

Adherence to the Legislative Approach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oli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LI Liyan ZHANG Xiaoqing(1)
Constru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YE Yiming CAO Yongsen(9)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wo Integrations"	SUN Meng(30)
Integration of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urriculum;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LIU Yuanxin WANG Wei(38)
New Teaching Form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Curriculum: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Jiangsu Reg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ZHU Xianlin(47)
Positioning, Nodes and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Double Helix" Teaching Model f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x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WANG Yaqin(53)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Prospects of Empowering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Evalu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Deep Ecology	LIAO Li(61)
"From No-place to Place": Reconstruction Path for Kindergarten-based Curriculu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Pedagogy	TENG Yan ZHANG Li(70)
Pathway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ud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University Governance	QI Lin(79)
Construction of Talent Training System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Architec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1345" Training Program	ZHANG Shaojie MENG Linghao XIAO Tieqiao(87)
An Exploration of Patriotic Public Health Campaigns of the Red Cros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O Jinping(95)
Brzezinski's Visit to China and the Adjustment of U.S. Policy Towards China	XUE Pengcheng(104)
Aesthetic Implications of Creation in "Tao Te Ching"	GAO Yunting(112)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立法之道： 政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李 栗 燕¹ 张 小 晴²

(1. 河海大学法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2.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 立法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立法法》第六条提出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规定具有展示法治背后政理逻辑的价值,意在用一种显性的立法形式直接表现国家的政治立场,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民主鲜明特征,也印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特有的本质属性。应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认知原则,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与政治的辩证逻辑关系,揭示立法的基本政治导向;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坚持人民立场的逻辑证成,揭示其深刻的文化根基、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聚焦新时代社会主义立法实践,揭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本价值取向。力求比较系统地揭示立法中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理逻辑和实践路径。

[关键词] 全过程人民民主; 立法; 政理逻辑

[中图分类号] D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01-08

一、引言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法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尤其是关于法律是否具有政治性的问题研究。本文探讨“政理逻辑”中的“政理”,其含义多指“为政之道”“政治事理”“政治理念”“政治智慧”等。在当代中国,法治领域的“政理”指的是“依法治国”的“政治之道”“政治逻辑”“政治理念”等^[1]。

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政理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立法逻辑。每一个国家关于立法的政理逻辑都是基于自己的治理模式、法治方式、实践经验,具有价值、理论、道

路、制度上的独特属性。西方各国的法治范式发展至今已逾数百年,在人类法治理论的演进与实践探索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不管是传统的自由法学、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比如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强调了法律与政治是相互交融相互关联的关系,并且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2]3-14}。戴维·E.阿普特也曾表示西方民主强调机械的和谐与均衡^{[3]121-136}。目前西方法治的局限性已显现,国家运行调控出现失灵失衡的现象,也因其异质性不可能为我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思

* [基金项目] 2024 年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课题“数字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4VSZ126),江苏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基于德法兼修的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思政课程群建设研究”(项目编号:B20220149)。

[收稿日期] 2025-08-15

[作者简介] 李栗燕,女,湖北武汉人,河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小晴,女,江苏徐州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想指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攻坚克难的法治实践进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对当前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与经验的系统凝练。学者胡水军主张中国法治需融合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权利制度,避免全盘西化^{[4]1-30}。学者封丽霞认为,党领导立法是我国政治与法治关系的最重要体现^[5]。G.萨托利表示政党的引导是现代政治特别“现代”的表现^{[6]5}。学者马怀德表示法治是人权的最重要的保障方式,强调要将全面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有机结合^[7]。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为分析标准,法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充分吸收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遵循法治发展的必然规律,坚持法治的基本内涵、共同价值和核心准则;法治的特殊性则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路径,推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本文将以此法治研究为归旨,聚焦法治建设应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以《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应当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分析对象,分析立法背后的政理逻辑及实践路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与政治的辩证逻辑关系

“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8]34}在总结人类法治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法治与政治的关系做出精辟的阐释:“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种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8]34}在法治与政治的诸多关系范畴里,立法与政治的关系是最集中的体现。

(一) 政治的诉求呼唤立法的有效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需要通过宪法和法律予以确认。现代政治的本质就是制度化运行的政治形态,法律又是制度化的最有效手段。基于此,法律确定的民主制度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评价指标,而政治的正

当性必然呼唤立法的有效体现与表达。

首先,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架构需要以法的形式确定。立法具有的最大功能或价值体现在要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架构,各机关、部门的权力分配与配置,权力运行的原则、程序进行制度化与规范化的安排,自始至终是要把国家利益、政治安全、权力、权利放在首位进行考量,政治在主导、规制着法律的运行,法律也不能离开政治的约束、控制。立法的过程和内容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活动,更是一种政治活动,决定着国家的政治走向和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或者说法律是以其规范化、标准化、权威化的要求表达着政治的诉求,而政治的诉求也在直接决定甚至改变着法律的命运^[9]。

其次,民主政治的推进离不开立法这一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10]27}立法的本质是制定规则,而规则的形成与运行本质上是政治权力的规范化体现。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语境中,民主是核心原则,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国家政治的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持续推进,由宪法法律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正朝着日益完备的方向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日臻成熟,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显然,立法对国家和社会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文化传统、社会福利需要立法予以确认。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受到法律的影响。政治的诉求呼唤立法的不断完善。法律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它通过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框架,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法律也是社会的引领者,通过确立价值和行为的标杆,为社会的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二) 立法需要政治制度为其保驾护航 在我国,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

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促进立法体制机制和程序的优化^[11]。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始终指引着立法体制机制的完善。政府是立法的重要依托,拓宽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积极发挥协调作用。另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是在党的领导下,深刻体现了立法工作与平衡人民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立法工作提供制度载体。立法工作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主要工作,其核心是让人们来掌握国家的权利。这一制度设计从根本上确立了立法权的来源与归属是人民。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将人民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确保立法的人民性与合法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不仅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载体,而且是当今世界上人类民主形式中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形式之一,承载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使命。通过立法活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主张、人民意志等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只有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能切实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保障民主立法。立法是充满利益各方利益博弈的政治活动,促进民主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其具有的合作性、监督性、非对抗性等特征,能够正确协调平衡各方利益,推动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第一,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具有与国家政权体系相对应的内部科层等级和结构功能,形成了全面嵌入国家政权体系的组织形式^{[12]72}。我国立法机关嵌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党政体制之中,立法活动不仅是立法机关的内部事务,而且是不管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党政体制的深刻塑造,可以说其本身就是党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5]3-16}。在具体实践中,立法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为立法工作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第二,我国立法权属于人民,但是人民通常并

不直接行使立法权,中国共产党本质要求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解放人民,一直在超越党派、超越集团、超越阶层,代表、维护、实现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立法民主的内在价值转变为社会民主的外在实践。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考虑多方利益和意见,平衡各方利益,通过协商民主达成共识,有利于实现政治平衡,保证立法过程的公正和民主,避免一方利益过于强势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冲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坚持人民立场的逻辑证成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我国法治体系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本质差异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并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专章,提出和论述了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提升人民民主的中国话语。2023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进一步明确立法要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原则有深刻的文化根基、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 坚持人民立场的文化根基

中国作为一个法制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文化演进中,社会治理结构经历过多次沧桑变化,但是始终保有先进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历久弥新的法律智慧。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法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古人的观念中,无法制则无盛世^{[13]47},法律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前提。战国时期韩非子曾言,“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唐代吴兢认为,“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都强调治国无法,法是社会运行之准绳。现代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积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目标,是对传统中国“良法善治”思想的积极回应。

细观之,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来源于古代中国“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法治实践中的运用。“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强调的是把百姓视为国家的依托与根本,没有民众,也就无所谓国家和政权。中国的法律制度与国家制度建设,几乎都围绕着“民为邦本”这一理念制定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统治权的正当性以及合理性,都需要从“民”这一角度来审视、度量,人心之向背,决定着国家的存亡兴衰,正如《贞观政要·政体》中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古代思想家在论及治国不可无法的同时,也分析了为何要立足于百姓立法。战国时期慎子指出:“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揭示了民为法之源的重要性。王安石也有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周公》),阐明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重要意义。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安尔。”“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辛未会试程策》)认为立法要体现民情、洽于民心。国家一方面要担负起保境安民的职责,抵御外敌侵略,维护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则是要发挥法律定分止争的功能,保护民众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这对现代社会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提高立法质量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政府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的民本文化,人民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二) 坚持人民立场的理论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法治思想,吸收借鉴了其中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立场。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主义最初的起源是批评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压迫,马克思目睹了资本在牟取利润时的不

择手段、对劳动者的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由此萌发了最初、最朴素的人本主义追求。随着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马克思的人本主义思想实现了从哲学思辨到科学理论的革命性飞跃。尤其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求承认和尊重人民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作用,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力量。以马克思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人类理想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更鲜明体现了这一立场。马克思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4]649}。因此,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精神世界获得自由,每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些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人民性立场。

立法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立场的时代呈现。马克思认为,应该使“社会主义的法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15]340}。这里面不仅包含法律的产生要围绕保护人民利益这一根本要求,还包括从发展的视角看,法治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需求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正如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6]9}。国家的主体是人民,政权的主体是人民,全面依法治国的主体也应该是人民。人民是国家和社会主义主体的宪法地位和政治定性,决定了法律制度在权利、义务、责任安排设计实施上,都必须有效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经得起人民根本利益的检验。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法治是国家的基石,是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立场,将全面依法治国贯穿于各个领域,积极发挥法治的功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把人民民主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宗旨,用法治保障人民的幸福美满。因此,坚持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中国化科学化。

(三) 坚持人民立场的实践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溯源是对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精神内涵的追问,是立法要坚持人民立场的实践逻辑的有力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建设是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也看到了法治建设的重要性。闽西苏区和中央苏区法治建设,铸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法魂”^{[17]16-33}。中央苏区时期宪法确定的宪制模式为中国宪法所沿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性质,后被1954年和1982年《宪法》确认和沿袭为人民民主专政。确立的政体后被延续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创的人民调解和“马锡五审判方式”对现代诉讼制度都有借鉴意义。大规模的立法实践,确立了坚持党的领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开展调查研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立法原则,秉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出鲜明的人民性、实践性和先进性等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毛泽东法律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将民主法治建设提上重要议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新征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18]6}。20世纪90年代,法治建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强调“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18]27}。进入21世纪,法治建设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重要理念,并将保障公民权利纳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18]2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要求通过法治国家建设保障公民合法权益^{[19]635}。2012年以来,中国法治

建设迈入新阶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法治理论体系,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为民的核心要义,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纵观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始终立足中国实际,依靠人民,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之路^{[20]76-78}。百年立法实践过程彰显着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和治国逻辑。

四、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路径

诚如法国学者莱昂·狄骥所言,“法律的‘自然物’植根于自然存在的社会现实,而任何实质性的立法,本质上都是对这种社会现实所衍生之法律规则的表达”^{[21]22}。立法是一种创制法律规范的活动,是对国家公权力与公民权利进行划分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22]93}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核心的“政理”要义就是如何立足于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立法角度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要义”就是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法》第六条明确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原则,有利于拓展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表达意愿关切的途径和形式,丰富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其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的十六字原则,不仅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的基本遵循,更彰显了社会主义立法区别于西方立法模式的本质特征。

(一) 以制度保障“为了人民”立法

以制度保障“为了人民”立法,需要一套多层次、全流程的制度体系,既涵盖宏观层面的根本制度设计,也包括中观层面的体制安排和微观层面的程序规范,核心是将人民的利益贯穿于立法的立项、起草、审议、通过、评估等全链条。

首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立法为

民的方向。健全人大主导立法的体制机制,调整有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工作部门的组织设置,提升立法专家的参与水平,使人大在立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人大在反映人民意愿方面的工作更加有效,从而确保国家法律顺应民心、体现民意。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有管理干部的重要职责,中国共产党通过管理监督国家立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发挥中国共产党员在立法中的关键作用^{[23]33-41}。另外,中共党员与人大代表具有高度的身份重叠,中国共产党代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重要来源群体,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大代表,应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收集和回应人民的法治新期待,增强人民的法治获得感^[24]。

除宏观层面的制度外,还要积极拓展落实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立法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还要积极落实民生保障立法专项制度、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制度、权利救济衔接制度。比如建立民生问题大数据平台,通过基层人大代表和人民关注的热点抓取民生立法的重要方面,将人民真正关心的事情进行分析,形成立法优先级。关注人民利益落地的程序规范,通过微观程序消除立法的梗阻,形成人民利益可获取、可参与、可评估、可救济的变换立法治理模式^[25]。显然,中国立法追求的是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集体善治,通过制度主动塑造和实现人民福祉,这与西方通过博弈程序获取平衡有着根本的区别。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等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多层次制度安排,确保立法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立法的宗旨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整体利益。

(二)“依靠人民”完善立法调研

立法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就是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经验和实践需求的总结。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注重立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只有坚持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落实民主立法的实践要求,让广大群众参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制定的法律才会有坚实的群众基

础,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立法实践,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立法调查的途径和渠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论衡·书解篇》),科学立法要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的权利和权益需求日益多元化,只有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才能掌握人民的需要,找准地方立法的重点,抓住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立出好法,实现良法善治。调查研究是开门立法的重要举措。

另外,立法调研贯穿立法活动的始终。从立项论证、项目调研、法规起草到草案审议等各环节,均需开展调研工作,而且每阶段的调研活动都承载着不同的责任和任务。由于立法调研覆盖面广、对象复杂以及对事不对人等特点,部分参与者缺乏积极性,不能充分表达意愿。这就要求立法调研注意互动,积极提高自己的调研水平,为不同对象提供表达意愿的平台,引导调研对象正确看待利益争端,提出切实有用的建议和意见^[26]。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立法调研者不能仅仅依赖座谈会等常规方式,还要深入一线,获取第一手资料,针对性地设计沟通方式,比如对待不识字的老年人、常年在外工作的人,借助互联网等技术优化调研方式。总之,立法调研的“兼听”,不是机械地“多听几个人”,而是关注那些不便表达和不会表达的对象,对他们多一些耐心和追问,让每一种合理诉求都能转化为立法考量的资源,最终实现法律条文既合法理又接人情。

(三)坚持共同富裕“造福人民”

共同富裕的实现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也得益于法治建设的保驾护航。法治是社会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相关体制机制建设要围绕共同富裕,以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高质量发展与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关系,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奋斗目标,是通贯经

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各个重要领域的基本价值和评价标准,牵涉所有法律部门和各层次法律规范,亟须打破原有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等部门法壁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工作要积极助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打破固有的部门法及其相应程序法空白,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牵引、以协调为抓手,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而建构和完善相关法律规范。

在具体立法上,首先,完善引导促进城乡居民创新发展共同致富的法律制度。诸如养老、医疗、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方面的法律制度,守住共同富裕的底线标准^[27]。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的基本生活权利进一步完善法律保障。其次,完善调整社会财富分配、维护基本社会公平稳定的配套基础性法律制度。在消弭城乡发展失衡的进程中,需依托立法手段为农民与农村走向共同富裕筑牢制度根基,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投入^[28]。在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上,要通过顶层央地立法设计和区域协同立法,完成对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等区域发展不均衡情况的调节。在缩小居民间的差距上,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相关财税立法,扩大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群体比重,增加处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筑牢共同富裕的分配基础,推动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四)以基本权益为基础“保护人民”

人民的基本权益不仅包括基础性人权保障,如生命权、健康权,还包括政治参与权、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等。立法过程中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坚持立法护民的理念^[29]²⁸⁵⁻³⁰⁹。完善保障低收入人群的普惠性社会基本福利法律制度。采取社会促进型政策立法,加强对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尤其是在国家发展全局和社会利益的基础、薄弱产业或事业上,需要由国家立法推动或参与发展。立法要与时俱进,扎实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

领域的立法,尤其要以这几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立法重点^[30]。知识产权规则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业态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响应及时、保护合理的新兴领域和特定领域知识产权规则体系,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积极全方位保障现实与网络的人权。随着微信、抖音等自媒体的出现,近期网络暴力事件频繁出现。相比传统的违法犯罪,网络暴力往往针对陌生人实施,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和即时性令受害人取证困难,证据不足又将导致立案难、认定难。同时,现有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暴力的内涵和外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31]。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依据多散落在刑法、民法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条款中,较为零散,法律适用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一些行为人因为得不到应有惩罚而更加无所忌惮,这也是网络暴力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网络是人民表达思想的精神家园,不是法外之地。用立法的法治源头方式厘清网络暴力的具体行为、社会危害、法律救济、综合治理方式等,是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望,也是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32]。

五、结语

综上所述,立法作为国家治理的根基,其过程与导向深刻反映着一国的政治逻辑与民主本质。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写入《立法法》,不仅是对人民立场的坚守,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时代传承、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创新发展,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论证其坚持人民立场的文化根基、理论依据与实践逻辑,最终揭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立法实践中的核心价值取向。这一研究阐明,中国的立法活动绝非纯粹的技术性规程,而是深深植根于独特政治土壤、承载着明确价值追求的伟大实践,它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与推动这一民主形态持续发展的坚实法治力量。未来,应继续推动立法实践迈上新

台阶,强化“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健全立法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深化区域协同立法和新兴领域立法的探索,持续深化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立法取向和政治规则内在关联的认知,让法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发展并增进人民福祉。在立法实践中,不断践行人民立场、回应人民诉求,将立法更加聚焦于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加重民生关切、权益保障、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立法分量,使人民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面向“十五五”规划,我们还要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对立法民主的效应赋能,增强立法的前瞻性,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民立法”等核心概念转化为国际社会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提升中国法治模式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参 考 文 献]

- [1] 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理、法理和哲理[J].政法论坛,2022(3):3-26.
- [2] 马丁·洛克林.剑与天平——法律与政治关系的省察[M].高秦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3] 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M].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4] 胡水君.法律的政治分析(第2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 [5] 封丽霞.党领导立法的逻辑与意义[J].行政法学研究,2023(3):3-16.
- [6] 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7] 马怀德.法治是人权保障的最重要方式[J].人权,2024(1):28-2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9] 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J].政治学研究,2010(2):32-40.
- [10]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
- [11]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12]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3] 张晋藩.中华法文化史镜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22.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 [17] 丁凌华,王盛泽.法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溯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9] 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0]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21] 狄骥.宪法论(第一卷):法律规则和国家问题[M].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22]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23] 陈斯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6.
- [24] 黄文艺.论党法关系的规范性原理[J].政法论坛,2022(1):3-15.
- [25] 张明军,李天云.民生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发展的有效路径[J].行政论坛,2024(5):15-26.
- [26] 郭跃.论立法精细化的标准与实现路径[J].学术界,2016(2):164-173.
- [27] 林佳.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社会法体系的完善[J].中国法学,2025(1):49-69.
- [28] 管立杰,赵伟.农村基础设施 PPP 模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6):114-120.
- [29] 沈春耀,许安标.大智立法:新中国成立70年立法历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9.
- [30] 冯晓青,孙雪静.新质生产力的知识产权法保障研究[J].知识产权,2024(7):43-57.
- [31] 丁晓东.从网络、个人信息到人工智能:数字时代的侵权法转型[J].法学家,2025(1):40-54.
- [32] 刘艳红.网络暴力治理的法治化转型及立法体系建构[J].法学研究,2023(5):79-95.

(责任编辑 王遐见)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

叶一鸣¹ 曹永森²

(1.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扬州 225009;
2.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江苏南京 210009)

[摘要]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保障社会稳定的应有之义。需要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生成演化的历史逻辑,揭示社会管理模式由中央“集中统管”到政府主导的市场基础作用、由行政管理到公共服务为中心、由市场决定作用下创新治理体系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的三级递进趋向;明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共同体新发展格局的价值逻辑,揭示其具有的应然性思想导向价值、实然性行为规范价值及工具理性价值;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优质高效发展的实践逻辑,揭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增强特色优势向实践效能转化的能力,更加有效地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现代化。

[关键词] 社会治理共同体; 共建共治共享; 建构逻辑; 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09-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分析了社会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指出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1]5}等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新征程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潜在隐患。经过全党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具体落实,日益深化了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思想共识。社会矛盾无穷尽,学术探索就无止境。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在正确把握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历史定位及科学内涵基础

上,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及制度创新,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格局有效发挥理论先导和实践指南作用。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社会内在矛盾变化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变迁,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体关系的不同角色及职能转换,推进社会历史曲折前进,从国家控制的社会化阶段,到改革开放的逐步改革,再到新时代的共建共治,中国社会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专项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4ZXZA039)。

[收稿日期] 2025-08-10

[作者简介] 叶一鸣,男,江苏宿迁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扬州大学)专家组成员,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曹永森,男,湖南澧县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经济管理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治理不断演进。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与创新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一)简政放权:推进中央“集中统管”转向“社会管理”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约为1949—1997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杂糅无章的经济成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人为制造的政治外交困局等问题,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挑战。为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局面的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国情,选择了以苏为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元化的社会管控模式。三大改造完成后,以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统管、垂直领导为特征的社会管控模式被建立起来,“集中统管”成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组织协调、整合力量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

政府本位下的社会管控模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得以进一步强化。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虽在形式上重视集体利益,但限制了社员个人特长的发展;政府对单一的公有制统筹计划安排,实行统购包销,限制了单位及其员工经营自主权的发挥,这种本应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产品经济模式,受到物质产品严重不足、财政短缺等瓶颈制约,在急躁冒进、个人崇拜、过“左”思想、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误导下,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暴露出单一公有制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生产力潜能发挥的局限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告全党工作中心开始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使社会管理得以有所放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理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开始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并着重强调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等三方面内容,传统“政社合一”的一元式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被打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十四大报告明确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市

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往的指令性计划主导的计划经济由社会主义制度特征改变为经济手段,它同市场调节手段相结合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调节方式,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市场活力的高质释放。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政府和社会关系得到良性调整。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新社会管理模式打工潮、下海潮带来巨大的人口流动,各种享受优惠政策的非公有制参与市场竞争;很多国有企业面临资源分配不公、负担过重、亏损加剧等窘境,经营自主权明显不足,这些都使党和国家领导下的社会管理面临新挑战新难题。

(二)勤政为民:推进社会公共事务从“行政管理”走向“公共服务”

这一时期的时间跨度约为1998—2011年。随着20世纪90年代西方公共治理理论流入中国,学术界也在探讨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和方式。自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说明》中强调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起,公共事务处理方式开始由“垂直管理型”为主向扁平状的“公共服务型”为主转变。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党的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进展基础上,强调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2]的社会管理格局。次年6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²⁸⁷,表明重构扁平式公共治理方式、强化公共服务的必然性和必要性。200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4]⁴⁵⁵,明确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5]²⁵这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

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建构现代公共管理体制、推进公共治理方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08年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更强调了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注重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转变,表明具体落实公共服务的至关重要性。在积极的改革转型过程中,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显露:面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化发展进程加快带来的井喷式社会需求和复杂的社会事务,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均、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明显暴露;应变能力不足、管理方式不够灵活的现象时有发生;职能转型不到位、仍存在对社会事务包揽式处理;行政权力与企业及市场的密切接触,易于形成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搭便车”现象等,这些均制约着社会资源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现实变革,信息技术的普及,全球化趋势加强等都要求建立适应社会发展与生产力进步的新的公共管理制度,进一步实现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

(三)协商民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

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约为2012年至今。由于政府对市场及企业干预的权力仍然过大,存在越权越位、错权错位问题,出现不少干部独断专行、滥用职权等现象,使党政内部问题与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动摇政府的公信力,根本威胁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半期向后半期转变的时间节点,如何通过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性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进一步推进权力过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向公共治理、公共服务的深层转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2012年党中央公布严肃整治“四风”问题的《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后,自我革命的作风建设带动了社会革命的社风建设,社会秩序开始根本好转。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引入“社会治理”概念,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水

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要求。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给地方和基层管理”^[6]。从而显示政府在深化改革中扎实推进对企业的间接管理,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活力的决心。在社会事务管理上,强调“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6]。这些标志着市场主体多样性决定作用与党政机构宏观政策指导的内在契合,推动着政府重在引导市场、企业拥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社会组织自治和中介作用充分发挥,在各主体合理分工又密切配合中全面实现社会活力和秩序的统筹兼顾。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党对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的理论创新,是促进政府政策引导、社会组织评估搭桥、居民积极参与等不同主体实现多元共治、良性互动的实践探索,更是进一步推进“垂直型”“单中心”“压力型”“垄断性”的行政管理向“扁平式”“多中心”“协商型”“民主性”的公共治理转化的深层次变革,是提高社会资源整合效率的切实有效手段。

中国特色的“政党—国家—社会—社区”治理逻辑,展现了与西方迥异的治理路径。推进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社会,体现了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努力提高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自觉自治的信心和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社会治理领域继续探索,不断细化和深化社会治理理论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社会治理中心向基层下移”^{[7]34},社会治理呈现为从抽象理论到具体实践、从上层遥控到基层扎根的标本兼治转变。然而在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过程中,一些新旧问题依然暴露其中: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仍有对局部大包大揽的情况存在;社会组织的系统化建设程度较低,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经验;政府与社会组

织、民众间的联动性不足,协商民主还不充分,制度还不完善,公共危机事件增多等,根本影响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社会治安,社会治理结构面临理论和实践新的优化调整。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8]²⁸⁷。这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中央文件中的首次亮相。2022年7月党的二十大明确要在“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中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⁵⁴。202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党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同时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9]。

社会治理共同体,意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等基于互动协商、权责对等原则,为解决社会问题、回应治理需求的共同目标,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且关系稳定的群体^[10]。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对社会治理的升华,体现了宏观政府牵头、中观组织服务、微观群众依法参与社会资源调整的系统性;政府、单位、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多样性;群策群力、共建共治的整体性;以人民为主体、激发全体人民自觉自主处理社会事务、表达利益诉求的民本性;以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目标、推进社会福祉共享的群体性。从本质而言,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组织管理模式趋向“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现代化的升级版,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应有之义,更是立足于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交织发展大背景下引领新时代的突破性进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新发展格局的价值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

期”^[11]。中国式现代化以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广泛覆盖党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管党治党伟大事业和国计民生各项领域。党的二十大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独有特征,也为新征程社会治理共同体助力新发展格局建构提供根本价值导向。

(一) 应然性思想导向价值: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

共同体是人类作为社会群体存在而为抵御包括自然环境变化、生存条件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危机和挑战时,基于共同意识建立起来的具有相同或相似价值追求的联合体。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共同体就已经普遍存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共同体指的是有机的生命结合和持久的共同生活”“本质是一种关系的结合,是富有生命力的有机结构关系”^[12]⁷¹。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在其唯物史观创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的,是以“现实的人”以及人的发展作为共同体思想逻辑基点的理论,认为自然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实的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三种共同体阶段。自然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水平和认识世界能力较低背景下为规避来自自然界未知力量建立起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工业革命特别是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促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的衍生。“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13]⁵⁷¹,这种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体现极强的“物的依赖性”的共同体,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掣肘。马克思强调“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4]¹⁶⁷。他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暴力工具”为特征的强制性国家终将回归到非强制性社会领域中,成为以社会化组织管理形式出现的政府机构,并成为维护“自由人的联合体”聚焦点,实现资产阶级宣扬的政治共同体的虚幻性和抽象性的扬弃^[15],即

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在这一情境下,个人不再作为某一阶级成员存在于不可控制的共同体内,而是作为控制着自己生存条件的独立体参与到联合体中^[16]。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积蓄着个体成员在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参与主体性与目标一致性的能量。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服务于少部分人、少部分地区的现代化,而是致力于幅员辽阔的当代中国社会整体以及每个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具有集体性、协调性、共生性的现代化。中国未来建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时代融合,更是社会治理话语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与创新。中国社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阶段面临着更高标准、更高质量、更大发展、更新格局的调整和转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将创造更多的发展新动能,生发更多的新生事物,同时不免引发更复杂的矛盾,这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对传统模式的新冲击,全面深层次地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和完善,将是营造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趋势,也势必促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入更完善的新境界。

(二) 实然性行为规范价值:应对公共危机的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

多元主体间利益诉求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利益主体间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政府关注国家利益最大化、社会组织聚焦群体利益最优化、公民则更多着眼于个体利益的实效化,引发不同利益主体间并发性矛盾;同时,现代社会是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交织的社会,全球性公共危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远非个体或少部分群体以一己之力便可抗衡的。群体性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在世界一体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其突发性和破坏性是任何单一社会主体难以独自承受和应对的。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协调多元主体间利益关系、解决群体性危机和风险,进而激发各类社会主体创新活力、共同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锦囊。一方面,“人人尽责”旨在确保社会群体和公民个体表达合理利益诉求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人人享有”则表达了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实现国家、社会与公民三者利益共享和分配正义为目标的愿望和决心,在利益表达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方面能有效解决多元主体利益不协调不公平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应对群体性公共危机方面,有着个体防御无法比拟的制度优势和治理优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面对世界性公共卫生危机及自然灾害侵害,我国数次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应对机制,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同舟共济的中国精神。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彰显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物质资料极大丰富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步性与协调性。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发展格局的不断完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总体向好的态势,但“两个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新特点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推动解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同时提升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以应对社会治理中的系统性危机。构建和实施常态化社会治理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建立以“人人有责”为基本原则、“人人尽责”为行动准则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举措和必然选择。

(三) 实用性话语工具理性价值:提供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

话语是理论、观念、方法的承载工具,由话语聚合而成的话语体系往往规定了某一特定领域具有主导地位、符合时代特征、发挥引领作用的思想理论和知识架构的表达范式^[17]。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在治国理政场域的逻辑外显,彰

显政党软实力。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治理概念引入中央文献以来,探讨如何将社会治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社情民情有机统一,一直是党治国理政中聚焦关注的主题。从党的十九大“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性创新,再到党的二十大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1]54},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话语逐渐形成并开始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现代化进程的可持续性与和谐性奠定生态基础。如何根据国情制定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社会治理制度,是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长久存在的社会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内,基于民主自由理念建立起的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及其话语在社会治理领域居于绝对地位,一度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争相效仿和鼓吹的社会治理“样板书”。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和世界性公共危机频发的冲击下,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暴露出包括地区性冲突频仍、社会各阶层脱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激化等乱象。“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出现,同虚假民主、蓄意对立、牺牲生态的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弊端形成强烈反差,折射出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平正义、协同共治、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必然性。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建立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模式,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后提出的将共同体精神与社会治理命题有机融合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及“中国话语”。它的建立,“以‘同一且多样’的有机团结机制成为培育公共性的社会土壤”^[18]。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为尚未形成完备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及新话语体系,对于打破西方社会治理模式垄断、丰富和发展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具有特殊重

要的意义。

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优质高效发展的实践逻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和手段”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治理领域应达成的基本目标^[11]。为在加速进入动态调整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切实发挥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优势和制度优势,我们必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指导,探寻建构更加完善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践效能。

(一) 统观全局:明晰新征程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轮廓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国家、社会、公民三者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科学考察当代中国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在总结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运行与治理的规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略,为新征程推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领导是全局核心。执政党及其运行模式是从战略上根本调控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运行的“主心骨”。政党不仅是政治变革的中心,也是社会治理的中心,在政治变革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关键环节发挥核心作用^[19]。社会治理共同体根本在于统筹国家、社会、公民三者共同发展,其复杂性和长期性决定了其离不开具有强大公信力和向心力的领导核心的介入。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其人民本位的利益代表性能确保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就决定了党的领导居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地位。具体而言,党的坚强领导将党的政治能力转化为政府治国理政的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树立

健康正向的社会风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动全体人民在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特别是基层群众治理中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积极性,能够进一步凝聚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空间,推动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实现党引领社会治理的政治效能^{[20]275}。

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场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确定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开展各项工作的中心议题。这不仅是作为基础的经济要求,更作为明确的政治导向。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具象实践,是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色的社会治理制度改革,是必须严格对标的首要任务;换言之,就是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当前“最大的政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加快推进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致力于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终实现。

平安中国是运行标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9]。社会治理共同体强调多元主体在社会事务中的共同参与,把民生保障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增进人民福祉。缺乏安全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社会组织及公众等主体难以有效参与公共事务,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机制将失去运行基础。建设平安中国的战略目标,旨在全社会范围内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通过构建一系列风险防控体系,确保政治安全、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长久实现,由此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夯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成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的价值接榫点。

基层治理是重点方向。基层治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方式。社区及村落等治理单位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民主协商体制机制,将不同主体的治理诉求转化为社会治理具象实践,构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

“细胞单元”,直接影响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活力和运行效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1]。“枫桥经验”是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探索解决基层治理问题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规律性认识。新征程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当代“枫桥经验”为示范引领,即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十六字方针为基本原则,通过法治的刚性约束和理性精神凝聚利益共识、价值共识、责任共识,通过德治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引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先导的“三治融合”,通过党建牵引、多元共治,推动基层治理走深走实,逐渐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

(二) 反观自省:认清新阶段发展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掣肘问题

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改革愈深入,势必触及更深层次更加复杂的矛盾,社会发展必会遇到更多的治理难题和体制障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1]27},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阶段中影响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掣肘问题。

社会组织发展总体不够健全。据2025年7月民政部公布的《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7.2万个,相较于2023年的88.2万个,同比下降1.1338%^[21]。经过政府依法审批的各具特色社会组织在丰富社会治理形式、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建设性作用,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社会力量之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独立发展程度不够。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分工不明,社会组织在经费资源、资质审核、经营权限、政治保障等方

面很大程度上仍需政府的行政领导和调配,自主性创新性受到制度约束。二是系统化专业化程度不高。相当数量的社会组织因成立时间短、成员数量少等因素,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足,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且成员本身素质有待提升。三是社会组织间合作创新不强。因各社会组织间信息不对称、存在同业竞争戒心、合作意识淡薄以及组织内部管理不当等因素,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甚至相互掣肘,造成参与程度低、治理效能差等负效应。此外,还存在有关社会组织的法规监管制度建设不到位、人才培养和培训机制欠缺、监管力度和制度规范不足以及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存在等问题。

公民主人翁意识和自治能力仍需提高。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存在的现实的人,既是社会治理的对象,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和参与者。自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型后,公民的社会参与渠道得到拓宽,良好的社会环境也为公民提供了参与社会治理的载体保障。但部分公民主人翁意识的缺失和自治能力的不足直接影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一方面,个人角色定位不明,没有形成“主人翁”意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事务常被认定为单一的“干部职责”,存在诸如村落等基层单位中“村干部干、群众看”的“旁观者心态”;另一方面,部分公民的政治素养和治理水平不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不仅是一句口号、一种理论,更需要具备相应的实际参与能力与主体意识。由于我国社会现阶段客观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特别是公民受教育程度呈现地区、年龄段等多方面的不平衡问题,导致部分公民缺乏公共参与敏感度和自治能力。

(三)整体激活:增强新时期创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效能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形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党和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等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拧成上下一股绳,以民主协商制度为依托构建社会治理共建平台,以多元主体动力激发为能量源构建

“政社民”三位一体共治局面,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推进社会福祉共享,合力打造新时期更加巩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1.善用新型政党制度打造数字化网络社会治理共建平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增效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制度举措。党建引领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根本保障^[22],党的坚强领导在社会治理环节中担当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则在社会治理环节中扮演提供质询、出谋划策的“智囊团”角色,其自身兼具国家大政方针制定的参与者和社会治理的对象双重角色。民主协商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价值共识和对话合作上、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最广大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而存在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方式,人民政协与政治协商制度的存在将多党合作、群策群力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的通力合作中寻找新征程发展方向和着力点,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和人民政协为多党派和社会进步人士合作提供有效载体与渠道。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数字媒介的存在为丰富社会治理手段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空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1]54}。应坚持人力和科技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大数据、区块链和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等信息工具建立起的网络数据库,使海量数据信息得到高效梳理、结构优化和系统处理,丰富拓展社会治理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主流媒体和自媒体有机统一形成的新时代媒体传播阵地,可为社会治理提供数字化、互动化和精准化的平台。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现代化科技,可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厚植中国特色的网络党务政务共建平台。

2.以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积极性构建“政社民”三位一体共治局面

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是多元多层面的,包括党和政府、社会组织、基层组织及基层群众等。

社会治理共同体注重多元主体的参与以实现社会问题的“共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既离不开党和政府本身充分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也需要激发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治理活力,以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三位一体共治局面形成社会治理合力。

就党和政府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建引领是消解社会治理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的根本保障。其中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实际工作和战斗力之源,是基层治理有序开展的根本组织保障,其对基层治理的能力直接影响实践效能。完善覆盖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基层党组织,通过“支部建在小区(网格)上”,依靠组织优势整合“碎片化”的资源与力量,更好构建党建引领共治格局^[23]。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注重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政府负责”:一是对党负责,关键在于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二是对社会负责,组织并管理好各类社会组织使其持续健康运转;三是对人民负责,根本在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好、发展好和实现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应不断提高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着力增强提供和保障基本制度供给、基本公共服务、基本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本领能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三者间关系,以国家治理现代化驱动政府职能现代化。

就社会组织而言,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广泛传播,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党和政府进一步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组织安全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在制度引导层面,《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和《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等官方文件的陆续颁布实施,为社会组织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规制度保障;在绩效考核和政策扶持方面,多个省、自治区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社会组织工作列入地方党委、政府绩效考核内容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机制。通过制度引导、评估政府绩效、加大政策支持等方式,培育和加强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本领。

就公民而言,基层社会治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基本方式,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应加强信访办、公民信箱等基层公民诉求表达渠道的建设以及其他公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创新,充分发挥公民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即通过帮助政府及时高效地发现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和短板,从而及早查漏补缺、提高基层治理效能;通过整合不同收入群体、职业背景、社会地位的个体诉求,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和权利使用方式;通过提高公民自我参与、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推进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的三元统一,建立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三者间多元主体参与、多元视角参与、多元方式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3.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社会福祉共享

唯物史观强调,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而进行的物质活动本身,充分肯定了个人追求生产生活利益以及更高的合理利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4]158}。对于社会治理的对象和参与者身份的每一位社会公民而言,积极主动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思想动因始终是建立在个人生存和发展需要得到满足基础上产生的更高利益诉求与愿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最终价值旨趣,同样是实现社会成员利益的普惠和共享。因此,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追求在根本上与公民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实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个体与群体利益的统筹共享,最大限度地实现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的“正义性”和“公平性”。

推动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首先要使公民基本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充分的保障和改善。既要有低收入保护等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生效所带来的“授人以鱼”,也要提供受教育机会、技能培训而解决生计问题的“授人以渔”。同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家改革发展红利共享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分配结构的明显改善,将“差异化补助”和“普遍化共享”相结合,使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此外,共享并不意味着绝对平

均。社会福祉的共享,一方面需要有相关法规政策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按社会福利共享”,促进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激励机制的突破和创新,贯彻“按社会要素贡献分配”^[24],从而激励社会成员基于自主创新能力追求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收获应有的社会回报。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胡锦涛.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N].人民日报,2010-09-30(1).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 [4] 国务院研究室编写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助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1).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9] 习近平.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把平安中国建设推向更高水平[N].人民日报 2025-03-02(1).
- [10] 郁建兴.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建设路径[J].公共管理评论,2019(3):59-65.
- [1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 [12]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邵发军,范晨.马克思政治共同体思想中的社会治理理论与当代价值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22(4):56-63.
- [16] 梅景辉,骆祥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J].江苏社会科学,2021(4):19-27+241.
- [17] 叶一鸣,王世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话语生成、结构要件及优化理路[J].江海学刊,2024(3):152-162.
- [18] 张明皓.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结构审视与行动路径[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2(5):38-46.
- [19] 张三元.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文明旨趣与建构路径[J].湖北社会科学,2025(5):5-14.
- [20] 王世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5-07-30)[2025-07-31]. <https://www.mca.gov.cn/gdnps/n2445/n2451/n2458/n2681/c1662004999980006189/attr/400985.pdf>
- [22] 王嘉瑜,何得桂.全过程互动治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与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40-51.
- [23] 刘开君.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J].红旗文稿,2024(22):39-42.
- [24] 王遐见.新时代激发人才创新动力的按社会科学要素贡献分配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9(1):128-137.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中国共产党百年科技政策思想体系的主题和逻辑*

刘 立¹ 贾宝余² 应 验¹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026;
2.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9)

[摘 要] 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是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百年历程的主线,蕴含了科学技术本质论、价值论、道路论、战略论、人才论、体系论、科普论、科学精神论、国际合作论以及党对科技全面领导论等十大主题;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体系可以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进行考察;可从党建引领、使命引领、战略引领、人才引领、文化引领五方面,为未来谋划和构建引领型科技政策思想体系的路径,以求为实现国家科技发展与安全的战略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 科技政策思想体系; 科技强国; 科技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19-11

“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1]238},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的科技现代化,始终贯穿于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党史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历史时期科技发展实际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蕴含的科技政策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2]8}。面对新时代更加严峻的科技风险挑战及发展机遇,需要更好总结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发展历程,提炼丰富史料中凸显的核心主题,从中概

括科技政策思想所呈现的主体逻辑,进而为发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深入而系统地探讨和构建引领型科技政策思想体系。

一、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百年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走出了一条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发展之路。在这一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科技发展实际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中国化、时代化。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及当代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ZD043),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教改重点项目“数智与民族精神双重赋能高校高品格新质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5ZXSK0401002)。

[收稿日期] 2025-07-18

[作者简介] 刘 立,男,湖北宜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宝余,男,甘肃通渭人,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博士。
应 验,男,浙江湖州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

(一) 科学救国: 寻觅科学解救中国的生存之道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辉煌的科技传统和科技成就,形成了农学、医学、天文学、算术等学科,取得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一批重大科技成就。然而,随着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世界科技中心与中国渐行渐远。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中国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长期的探索,但都没能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受制于他人的状况。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中,陈独秀敬告青年要用科学的思想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此后,“赛先生”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中国的大地上进一步推广和弘扬,为此后中国现当代科学事业奠定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基础。在无数前辈科学家的努力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一大批中国科学家投入到科学救国的时代大潮中。比如,以沈同为代表的科学家在营养学方面的研究,填补了世界相关领域空白和有效支撑了抗日持久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深刻时代特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科技政策对科学救国事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二) 科技报国: 为中华崛起而勇攀科学高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那个热火朝天建设新中国的岁月里,“向科学进军”“我们也要搞原子弹”等一句句豪言壮语响彻天地。数千名科学家回到祖国怀抱,中央专委统筹协调,以特殊机构执行重大任务^[3];创新要素高效配置,以点将配兵实现重大突破,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大力协同,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取得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科技事业获得突飞猛进的进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基本形成了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科技体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怀念那段岁月,尽管当时经济上一穷二白,科技上也受到西方

的封锁,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科技工作者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体系化建制化优势,攻克了一道又一道艰难险阻,攀登了一座座科学高峰,实现了一次又一次零的突破。科技报国成为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当然,发展的道路上也有错误和曲折,这一切构成了那个时代丰富的历史。

(三) 科教兴国: 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振兴中华

1978年,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拉开了“科学的春天”大幕,从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念深入人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面对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要求,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在调整和完善我国科技制度的同时,促进了科技和经济之间的互动发展。此外,随着一系列法律和规定的制定和出台,我国的科技事业进入法制化与规范化阶段。1995年,“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将科学技术放在重要位置。此后,中国的科技事业从跟踪追赶逐渐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相继提出,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创新成为21世纪中国科技事业的新主题。

(四) 科技强国: 依靠高新技术加快强国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了对科学事业的全面领导,明确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做出全面部署。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明确了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习近

平总书记 2024 年在“科技三会”讲话中发出为实现 2035 年建成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动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领导全国科学事业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里程碑,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已形成了包括思想创新、政策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创新体系。在此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包括: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民生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效,国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政策和制度体系;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科教兴国战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自主创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内涵与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围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各阶段的主要领导人虽对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有不同侧重的表述,但内在逻辑贯通,不断丰富发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升华的发展历程。

二、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重要主题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的百年历程中,革命、建设、改革等各阶段领导人对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本质、功能和发展规律,以及世界科技发展趋势进行反思和总结。可概括提炼出若干重要主题。

(一)科技本质论:明确科技的先进生产力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科学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两大主要判断等。对于

前者,马克思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幼稚行为。”^{[4]241}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思维的方式就是科学的方式,它透过现象揭示了事物背后的本质。在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提出了“科学是国力的灵魂”“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进一步深化了对科学技术本质的认识。

(二)科技价值论:明确创新为民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5]664},将科学技术视作一种先进生产力,其中“包括科学的力量”^{[6]229}。在科技价值中,马克思恩格斯凸显了人民性的本质属性,认为科学技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提供物质前提,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秉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价值观,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科学技术为抗战救国和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高举“人民科学”的旗帜,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倡导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进入新时代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创新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科技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三)科学发展道路论:运用科学理性探索科技驱动发展的路径路向

走一条什么样的科技发展道路,是科技发展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科技事业的过程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发展道路。革命战争年代,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框架下,中国共产党要求科学工作坚持

“发展生产、自力更生”,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及为人民军队建设和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科技工作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相继提出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科技发展方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重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发展方针,要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学技术自立自强。这是在马克思科学技术观指导下形成的理论创新,是一条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科技强国为根本指向的道路。

(四)科技体制改革论:以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科技生产力

战略是影响全局的策略,是决定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的“牛鼻子”。处于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倡导“科学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科技工作也由应急性向建设性过渡;新中国成立后,在“向科学进军”的征途中,党领导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创举,是新中国最早系统完整的科技战略举措,为“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的产生奠定了政策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攀登世界科学高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高度、广度、力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党针对特定阶段的重大问题,确立推进科技发展的战略思想,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制定和出台了

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紧密衔接的科技发展政策,形成了前瞻性、引领性、系统性的科技发展战略体系,成为推动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

(五)科技人才政策论:团结和用好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是科学实践的主体,是科研成果的重要创造者、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开拓者和科技知识的重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看作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通过容、化、用等政策积极吸纳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争取和团结一切科学家为人民服务,我国科技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同时,在一些政策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党重申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继承马克思主义人才价值观,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正确认识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的属性与价值,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和工作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科学实践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六)科技创新体系论:优化科技创新体系结构

创新体系是由不同创新主体有机组合而成的系统。从新型举国体制,到有组织科研,再到国家创新体系,均体现了党整合创新主体、构建创新体系、发挥创新效能的政策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科研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临时性、实用性机构向实体性、建制化机构的转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组织推进形成科学院、高等学校、国防科研机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组成的科学技术“五路大军”。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机构的定位更加明确,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得到确认,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在政策层面得以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逐渐形

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得到高度重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学技术领军企业等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在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七) 科学普及论:推进科技大众化传播

科学普及是一项链接科技创新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承担着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在全社会大力营造崇尚科学和鼓励创新风尚的重任。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党辩证处理“科学救国”与“科学为民”的关系,将科普作为关注民生、弘扬民德、启迪民智、积蓄民力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将“爱科学”作为全体公民的公德加以大力倡导,并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高度,倡导“三结合、两并举”。改革开放以来,党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科普的制度化、法制化再上新台阶,指导和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两翼论”的提出将科普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政府大力推动、社会广泛参与的科普发展道路。

(八) 科学精神论:积极倡导科学精神及科学家精神

科学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家精神是科学精神人格化、时代化、中国化的体现,其主体是科技工作者,其中包括战略科学家、一般科技人员、科技管理人员;其形成过程是长期的科学实践,以中国古代悠久的科技传统为根基,在近代以科学救国的基调萌芽,在新中国成立后科技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养成壮大;呈现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包括爱国、奉献为代表的优良传统,求实、创新为代表的科学内核,协同、育人为代表的中国风貌。“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

斗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塑造科学理性的国民精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科学技术共同体中发扬科学家精神,有助于涵养家国情怀、促进科研诚信、营造创新文化,激励科学技术工作者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

(九) 国际科技合作论:在对外开放中推进科技国际合作与交流

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到“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科技发展战略,从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到坚持科学技术扩大开放,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到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始终从唯物辩证的观点出发,在领导科学技术事业中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关系,坚持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外援,坚持自主创新但不闭门造车,坚持自立自强但不闭关锁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以合作思维推动发展,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通过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推进“一带一路”科技合作、促进绿色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等举措,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国际科技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

(十) 党对科技事业全面领导论: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把关定向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观大势、谋全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和统筹协调的科技资源配置模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加强领导推进科技工作,使科学技术发展不偏离社会革命这一中心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制定自己的科技方针政策,建立国家科技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全面加强了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大力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改革开放后,党对

科技工作的领导得到改善和加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的相继出台,充分体现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坚持和加强了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成立中央科技委员会,重组科学技术部,有效提升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门类完整齐备、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工业大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体系、国家创新体系,根本在于党的全面领导。党对科技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科技实践成败的关键,是科技事业发展的政治保证,对科技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主干逻辑

基于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百年历程和核心主题,可以梳理出科学技术推进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逻辑,增强科技主体自主性创新的实践逻辑,以及矢志坚持科技为民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导向的价值逻辑等四大主要逻辑。

(一) 历史逻辑:科学技术深刻嵌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进程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科技强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贯穿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生成发展的历程。我国科技事业在跟踪模仿中艰难起步,在引进消化吸收中发展壮大,在自主创新中加快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自主创新之路。

早在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强调“要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和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体现出我们党对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国科技“五路大军”并进,科技事业猛进发展,科技队伍不断壮大,科技体系持续完善,学科门类不断

健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后,科学技术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不断凸显,效能不断显著,科技管理体制不断创新,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科技与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不断激发新动能,科技事业进入法制化与规范化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显著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实施有组织科研项目推进,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持续提升。党的十九大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作出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目标。

(二) 理论逻辑:不断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

充分认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摆正科学在社会发展全局中的位置,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重要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以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发展,催生技术进步,实现科技现代化。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确认:科学是改造社会的巨大革命力量,也是救治中国、改造中国、发展中国的巨大法宝。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继续坚持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科学”和“民主”两大旗帜。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深刻论述了生产活动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强调“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7]282-28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号召用自然科学粉碎敌人的封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新中国立国、强国理论与实践的战略基点。1978年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此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随后,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落实

科学发展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以科技第一生产力支撑服务发展第一要务,尤其是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部署,统筹推进,释放了新质生产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决策,发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动员令”和“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号召,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从而形成了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核心,以创新驱动发展和改革驱动创新为政策实践两翼的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理论体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中国化的新境界,在指导我国创新发展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实践进程中,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和政策价值。

(三)实践逻辑:坚持科技主体性创新,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战略基点,也是保证我国科技韧性与活力的根本所在。中国式科技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传统技术发展理论,体现了自立自强基础上的对外开放。自力更生、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实践,深刻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个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根本原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其中“民族的”是首要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8]662-71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国防安全问题凸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虽然科技基础“一穷二白”,但党中央毅然决定要研发“两弹一星”。得益于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我国仅用2年8个月就成功试爆原子弹,大幅少于美国的7年多和苏联的4年多的研发时长,其成功经验就在于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基本方针,统筹各方面力量,以自主创新驱动发展。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独立自主科技发展道路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9]1-4}在2006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确定为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方针,继续将独立自主作为首要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明确提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要求。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科技三会”上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要“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0]。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加强调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但不排斥二次创新和集成创新,其关键是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科技强国建设奠定基础。

(四)价值逻辑:矢志坚持科技为民的发展方向与创新导向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技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发展方向与服务导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方针。1951年周恩来同志在《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中要求知识分子“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11]40-49}。1958年,聂荣臻同志强调在全党办好科学技术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必须面向生产,但又必须走在生产的前面,为生产开辟新的途径”^{[12]368-376}。科学既要面向生产、服务生产,也要超越生产、引领生产,这是

科学技术工作者落实“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杰出的科学家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13]96}。江泽民同志要求将“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面向市场经济发展、面向广大人民需求”作为科技攻关的方向和重点项目^[14]。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蕴含着“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等重要论述,无不体现了人民至上、科技为民的价值遵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科技政策强调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到科技创新活动之中,重视惠民利民,致力于改善民生,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四、构建引领型科技政策思想体系的思考展望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15]。为更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围绕科技强国战略规划,构建引领型科技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6]33}从而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前行指明了基本遵循。

(一) 党建引领: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统筹领导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是新时代发挥党建引领科技政策创新发展的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引领型科技政策的创新发展首先就是要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把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意图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发展脉络和体系构建的

过程中。第一,优化中央在科技领域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的制度安排,以推进国家科技协同高效管理为着力点,把国家科技管理职能调整优化同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有机统一起来,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第二,坚持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塑造创新引领发展新优势。牢固树立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推动构建以科学政策为核心,与教育、财政、产业、贸易、金融、法制等领域政策相协调的科技政策体系。坚持战略思维,从更长远的战略需求出发,用超前思维谋划科技发展的未来,加强前瞻性科技指导,面向未来发挥科技预见作用。第三,科技后发国家要赶上科技发展的时代潮流,必须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积极学习借鉴科技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体系,构建符合本国实际的科技政策。要实现从“跟跑”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亟须优化追赶型政策,加快从追赶型到引领型科技政策转变。

为更好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有效领导,需要处理好如下几组关系:一是思想引领与政策引导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能够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明确方向,擘画发展蓝图;但宏观的战略思想也需要具体务实的政策落地,确保主观见之于客观,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能够有效保障科技创新的顺利推进。二是举国体制与区域积极性的关系。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决定了科技事业的整体方向和资源配置,但区域积极性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来源,各地应根据自身资源和发展优势,结合国家战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与区域要形成合力,既要确保大局一致性,又要激发区域灵活性。三是规范有序与激发活力的关系。基层组织在科技创新中肩负着重要的组织、统筹和管理职能,有利于各项工作规范有序推进;但也要规避“一刀切”,要在制度设计上留有足够的空间,给科研人员自主创新、自主筹资、经费使用以一定的支配权,维持秩序和效率的平衡。

(二) 使命引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比较优势

发挥有组织科研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

使命驱动是引领型科技政策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家重大战略领域创新和重大科技工程突破有赖于有组织科研,需要综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多主体协同的整体效能优势,使重点科学研究更具方向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以有组织创新全面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第一,强化创新体制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打造建制化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加快国家对科研活动的体系化、组织化、建制化水平,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优化完善提供制度设计和稳定支持。第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推动创新主体之间的融合融通。强化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国家队使命和作用。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推进创新体系优化组合,加强科教融合、科产融合,实现各方优势互补,提高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第三,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坚持问题导向和使命导向相结合,部署实施一批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优化重大科技项目选题及招标机制。在重要新兴技术领域加大布局力度,在构建新兴技术体系和技术轨道中抢抓先机,形成先发优势,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

为更好发挥有组织科研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需要坚持如下原则:一是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科技研发是使命和灵感的产物,要给予科研人员宽松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激发科研人员的探索欲望和好奇心;同时,在自由探索的基础上,设定清晰的研究目标和方向,使创新活动有的放矢,提高创新的效率和成功率。二是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统筹。要在政策设计上统筹兼顾,既要有实现短期科技突破的措施,又要有面向长远的战略部署,实现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快速突破。三是教—产—学—研—用有机结合。构建教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体系,打通从学校到市场、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应用的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提供技术、资金和政策支持,通过市

场需求拉动科技创新,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应用。

(三) 战略引领: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

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战略导向是引领型科技政策创新发展的突出重点。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是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关键。当前我国科技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基础研究,通过“非对称”赶超战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第一,锚定原创性、前瞻性的科学问题,牵头组织实施战略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通过基础研究重大发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和技术集成,推出重大战略产品,开发关键共性技术,辐射带动相关产业群的成长。第二,开展系统性政策创新,注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发挥基础研究引领作用。注重合理的研发投入结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与发展经费占比结构合理。第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科技发展必须采用新理念、新战略和新思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采取“非对称”赶超战略,拥有非对称性“撒手锏”,形成代表国家水平、国际同行认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科技创新实力。要加快转变科研观念,改革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体系化建制化优势。

为更好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处理好如下关系:一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协同。要在政策上协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确保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应用研究的实效性,建立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综合平台,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向应用研究的转化,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二是引领型发展与“非对称”赶超。引领型发展要求在某些关键科技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非对称”赶超强调在部分重要领域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科技政策应支持和鼓励在这些领域的集中攻关和突破,通过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方式,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突破。三是科技进步与社会需求的匹配。科技政策不

仅要推动高新技术的发展,还应关注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包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要确保科技创新紧密结合并满足社会实际需求,推动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四)人才引领:提升人才高地网络的协同效应

加快建设人才高地与创新中心的人才支撑是引领型科技政策创新发展的整体布局关键。世界科技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竞争。人才是第一资源,科学突破、技术创新归根结底需要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科技人才队伍。第一,要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发挥重大人才工程牵引作用,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第二,优化人才发现、吸引和使用机制。要围绕重要学科领域和创新方向完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发现机制,在重大科技攻关实践中培育锻炼一批青年科技人才。建设开放的创新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汇聚全球高端人才、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物等尖端人才。落实中央“放管服”精神,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投入足够的科研时间,完善科研保障条件。第三,要加快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建设,强化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布局,搭建跨区域创新合作网络,形成梯队与雁阵格局,发挥人才中心与创新高地的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

为进一步加快建设人才高地与创新中心,需要扎实做好如下工作:一是坚持国内人才培养与国际人才引进相协调。国内人才培养是长期的战略投资,通过教育和科研机构培养出符合国家科技发展需求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在培养本土科技人才的同时,制定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吸引海外优秀科技人才,快速引进国际前沿科技成果和管理经验,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二是加强领军人才与团队合作攻关。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离不开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科技政策应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通过设立国家科技人才计划、创新人才培养基金等措施,吸引和培养一批具有国

际水平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同时,也要注重团队合作的建设,鼓励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研究,发挥集体智慧,提高科研效率和成果转化率。三是推进科学家和大国工匠的互补结合。研究人员通过理论研究和实验探索,提出创新性的科学假设和技术方案,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创新能力。技术工匠则通过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和工艺。既要顶天,也要立地,用好两类人才,形成完整的科技创新链条,实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的高效融合。

(五)文化引领:营造创新精神与创新文化的良好氛围

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是引领型科技政策落实的良好环境。创新精神可以造就创新文化,激发创新活力。为此,第一,发挥科学文化理念的引领作用。打造创新精神和国家创新文化,调动人才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营造勇于创新、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建设引领创新的生态文化,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和原创性、引领型科技攻关的创新生态。第二,明确科学严谨的创新态度。坚定创新自信,树立科学报国、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创新理念,加强科研学风及作风建设,引导科技人员摒弃浮夸,切除浮躁,坐稳冷板凳,把研究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第三,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学成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为更好优化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需要把握基本的方法论:一是坚持宽容失败与激励产出的统一。建立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允许创新过程中出现失误,同时积极鼓励产出,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推行代表性、标志性科技成就评价,确保创新绩效评价的公平和合理。二是坚持大胆创新与严守伦理的统一。通过政策保障、绩效激励和荣誉褒奖,鼓励大胆创新。严格遵循科学伦理,确保研究过程中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责任。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风险评估和管理机制,保证研究数据真实、研究对象知情以及科研成果真实。三是坚持

开放共享和产权保护的统一。开放共享是促进创新的重要途径,可以加速知识的交流和传播,推动科技进步。要建立成果公开与共享的平台和机制,同时建立透明的合作框架和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促进科技成果的共享与创新的持续发展,确保科技成果的公平使用和安全保障,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

回顾历史,人类经历了五次科技革命和三次产业革命的洗礼,正在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高潮的到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必将逐步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早日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立足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真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性力量和杠杆,走出一条从经济强、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的创新发展,将立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在格局上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在体制上发挥有组织科研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重点上加强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布局上加快建设人才高地与创新中心,在环境上,优化创新精神和创新文化,形成全面、协调、高效的科技政策思想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论科技自立自强[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2] 贾宝余,刘立,王公.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

[3] 路风,何鹏宇.举国体制与重大突破——以特殊机构执行和完成重大任务的历史经验及启示[J].管理世界,2021(7):1-18.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EB/OL].(2021-05-28)[2025-06-30].求是网.
https://www.qstheory.cn/yaowen/2021-05-28c_1127505625.htm.

[11]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上)(1949-1995)[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2] 聂荣臻.全党抓科学技术工作,实现技术革命[M]//胡维佳.中国科技政策资料选辑(上)(1949-1995).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江泽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N].人民日报,2002-05-29(1).

[15]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16]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参与本文的写作和讨论)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两个结合”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创新 及方法论启示*

孙 萌

(太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太原 030032)

[摘 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有机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和真正共同体的构想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展开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聚焦人的发展理论主题、立足人类整体的发展视野以及尊重个性差异的发展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民本思想、天下情怀以及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有共同诉求。在“两个结合”的理论视野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推进理论创新、坚持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把握历史规律、坚持系统性和协同性相统一推动人类发展。

[关键词] “两个结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30-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解决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1]。当前我国发展的重大实践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发于现代化发展实践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人类整体层面思考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困境,从“共同体”维度探索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实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充分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对人的发展问题的深度关切,形成了胸怀天下的理论视野以及协同共进的发展理念,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

民本思想、天下情怀以及和合共生的价值内涵,推进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性转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生成及其创新发展过程对深入理解其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现代化发展实践推进理论创新

实现共同体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指向。现代化兴起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否认,现代化发展打破了原始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满足了人类历史发展诉求。伴随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资本主导的人类社会使物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山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23W187),太原学院人才引进科研项目“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与人的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4TYKY202)。

[收稿日期] 2024-12-10

[作者简介] 孙 萌,男,山西临汾人,太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代替人取得了主导地位,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中人的异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以及由此建立的虚假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2]571}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剖析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及深层原因,在批判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真正共同体,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指向。立足新时代发展背景,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选项,在平等合作基础上以中国发展推动世界共同繁荣的现代化理念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要求。

(一)对虚假共同体的批判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场域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方位及实践场域标定了其对虚假共同体的理论超越。在现代化发展实践进程中人类社会共同体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转换。资本主义现代化消解了传统共同体代之以虚假共同体追捧“商品拜物教”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打破了地域性限制,扩展了人类交往活动的空间维度,马克思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积极作用,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405}。同时,马克思洞察了人类社会掩盖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图景之下的矛盾冲突。现代化生产方式彰显前所未有的力量操控着民族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36}。依附性不平等关系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构建世界体系的权力纽带,对此马克思指出:“最现代的趋向披着最中世纪的外衣。”^{[5]321} 对外“操控—依附型”关系延伸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形成的虚假共同体的内部不平等关系,造成了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矛盾冲突。在依附资本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中,物质生产成为发展目的操控着人的发展,人受物的异化统治丧失了主导自身发展的

主体权力,共同体不能真正满足普遍的人的发展需求,由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共同体的虚假性。人的社会本质决定了共同体是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共同体的消解与重构导致共同体脱离了人的发展问题本身,造成了现代化的异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人类发展现实境遇,把握现代化发展逻辑进程,以人类整体生存发展为目标考量,统筹目的与手段、当下与未来、发展与环境等多重关系,系统重塑现代化发展内在结构,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构建人类社会持续健康稳定的现代化发展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共同体视角重新审视现代化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困境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创造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回应了新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化关切。中国式现代化立足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发展逻辑,打破了资本逻辑宰制下现代化发展服务“少数人”的理论设想,将现代化发展动力有效转化为凝聚社会共同体的纽带力量,推动共同体建构与现代化发展逻辑并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生发基点,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阻止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虚假共同体中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冲突。“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同发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和价值旨归。围绕人与自然关系,资本主义现代化“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带来一系列发展问题,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中国式现代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生存高度审视生态问题,以“生命共同体”为价值导向厘清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在现代化实现途径上,中国式现代化摒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殖民掠夺的老路,贯彻“命运与共”发展理念倡导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根本立场、核心目标、发展理念、价值导向、实践方式等方面实现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超越,打

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狭隘思维,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对真正共同体的构想指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愿景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构建了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图景。现代化的兴起源自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创新探索,由生产实践领域创新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生产方式变革引起人们对现代化问题的历时态反思。从生产力角度审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资本将人类社会推向了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但同时资本驾驭了现代化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现代化发展的内在缺陷,指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2]11}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共同体与现实的个人相脱离,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向度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理想共同体形式。区别于传统社会共同体形式和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真正共同体消除了共同体对人的统治,“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571}。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构建真正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人的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向。立足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诸多领域关注现代化与人的发展,致力于构建覆盖人类整体层面、关切人类前途命运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围绕人的发展逻辑主线完成了对现代化的主体认定和目标认定,扭转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主体错位,链接了现代化与人的发展逻辑关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逻辑与远景目标指向构建真正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赋予现代化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内涵。面对资本对现代化的裹挟,如何摆脱异化力量支配、开辟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为人类整体实现现代化提供新的路径选择成为革新现代化理论的时代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资本对现代

化的统治地位,将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展开覆盖人类整体,通过恢复人的主体地位、和解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创新现代化实践方式,回应了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拷问。立足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现代化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从传统社会中衍生的现代化概念其发展导向要实现“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6]566}。遵循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逻辑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着力解决束缚人的发展的种种关系,围绕人的生产、生活、生存实践领域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为构建真正共同体使人成为“自由的人”创造条件。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科学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场于“一球多制”的现实背景,凝结了对时代化和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深刻反思和系统回答。站在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宏观层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7]475}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立足共同体视域把握现代化发展的逻辑进路和思维范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切入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情势,从现实问题出发推动现代化与人类命运的系统连接,实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人类整体利益诉求,以胸怀天下的人类情怀构建现代化新格局、新路径,以“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普遍关系,多维度拓展了现代化内涵和实践方式,为人类整体进入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遵循和实践导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聚焦人类整体的价值理念和倡导和平发展的实践方略。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现了人类整体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共生关系,勾画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存在样

态。现实社会中的个人,以各自具有的特色共处于由利益纽带塑成的共同体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个体差异性基础,构建包容合作的共同体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广泛存在的发展情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统合个人与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遵循求同存异、优势互补的理念指引,推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开展通力合作,致力于为人类整体谋福祉。区别于资本的无限制扩张,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服务于人类整体利益,要求在物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维持平衡,通过“命运与共”的价值引领最终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26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共同担负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职责,凝聚各国普遍发展共识,尊重各个国家和民族对合作共赢的要求,将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作为发展目标,通过“一带一路”等具体实践,致力于实现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传统文化价值创新理论内涵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聚焦人的发展逻辑主线,系统展开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考察,围绕共同体形态演变揭示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从整体性和多样性角度构想了人类未来发展的理想社会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意涵,突出人的发展主体地位,同时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民本思想、大同社会以及和合共生的价值内蕴及思维方式,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时代性转化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马克思共同体思想逻辑主线,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时强调:“我们

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3]152}通过共同体视域检视人的发展现实问题,马克思以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共同体发展的趋向性以及未来理想社会共同体形态系统解读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演变过程。围绕人的生存问题,马克思指出“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9]146},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赋予人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生产发展和人的社会关系丰富,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给予人更多的自由与权利,马克思洞察了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所赋予人的权利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10]437}。依照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宗旨,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构建了真正共同体理论,并指明了走向理想社会的实践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时代性理论表达。立足“现实的人”逻辑起点,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围绕“人的发展”问题域展开系统性实践布局,从人类整体高度和生存维度关切现实发展,致力于推动构建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图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创新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贯穿中华文化发展脉络。《礼记·大学》中讲“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11]1675}。对民众的关注始终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封建统治者追求“江山永固、国祚绵延”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总结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实践认知。荀子在讲王道时强调:“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12]224}儒家的民本思想指引着历代王朝统治者将国家发展与民众诉求结合起来,一方面国家要注重物质生产,保障民生基础;另一方面,统治者通过施“仁政”,给予民众良好的生活环境。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演进过程中,注重以民为本的王朝发展既有利于民众和平安宁的生活,也有利于统治者巩固政权。与封建统治者实施民本思想的目的性和手段性不

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覆盖范围、主体关系和发展目的等方面实现整体革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整体维度考量发展问题,实现了从“民”到“人类”的维度跃升,并将推动人类发展作为目的本身,超越了传统文化对“民本”的工具性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发展的目的是造福人民。”^{[13]407}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促进人类整体发展为基础遵循,在新时代背景下通过共同体视域重新审视人民发展、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的协同关系,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体系。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整体视域、秉持天下情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关照人类整体的理论视野,立足整体视域关切社会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14]马克思立足人类整体视域,探究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围绕人的社会本质属性,揭示了共同体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形式。共同体与人的发展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如何使人类摆脱异化统治、在共同体中实现主体性确认是马克思关注的理论与实践焦点,对此马克思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46}通过对人类整体存在的共同体形式进行深入考察,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中物对人的统治以及共同体的撕裂,构建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共同体形态。在“命运与共”的关系纽带下,人类社会发展历经“传统共同体”样态到“个体主义”凸显再到“共同体”复归的辩证否定过程。新的历史阶段,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人类发展前途命运,贯穿历史与现实维度,内含了对当下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关切,以及未来人类发展的现实考量,打破了传统社会以及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封闭、线性的发展视野,坚持整体视域系统推进人类社会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发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情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胸怀天下的文化品格致力于构建理想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鰥、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理想社会的价值设定,其中“公有”“均平”等思想实质表达了中国古人对理想社会的理论构思,对传统社会伦理发展及社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构建“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历史脉络,形成了具有天下情怀的文化品质和文化特色。囿于社会历史发展限制,传统理想社会只停留于思想意识层面,缺乏具体实践路径和实践条件。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天下情怀审视人类社会现实,以营造“美好生活”、构建“美好世界”为实践展开,着眼解决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以胸怀天下的世界格局推进“大同社会”的美好远景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尊重个性发展、倡导和合共生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尊重“个性”的发展理念。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致力于保障人的自由个性,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蕴含了“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为逻辑线索,马克思考察了共同体与人的发展的理论关联。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纽带,此时的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人的自由个性依附于共同体意志,个人是共同体中的个人。随着生产发展以及分工、私有财产的出现,原始的血缘、地缘纽带关系受交往、货币关系的削弱,新的共同体形态中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彰显,但同时马克思认识到,摆脱传统关系束缚下的个人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个性,而是又陷入了“物的统治”新的桎梏。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

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571}此时的共同体是摆脱异化统治、实现人的主体性复归的“真正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对人的物化统治,围绕人的“美好生活需求”构建发展模式,在统筹普遍性和特殊性发展需求的基础上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精髓。《国语·郑语》中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命题,揭示了传统文化对保障个性与共同发展的辩证态度。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5]172};老子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5]4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蕴含着尊重差别、求同存异的价值理念,倡导平等相待、包容共生、兼收并蓄、和谐发展,以保障差异性为前提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审视文化脉络的演进过程,多民族交融的发展特色塑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包容性发展理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16]434}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特色,把握不同文明在个性与共性、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致力于营造平等尊重、多元共生的新型文明体系。

三、“两个结合”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启示

(一) 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推进理论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透视人类社会发展现实,赋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以新时代内涵。在创建哲学体系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

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502}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新唯物主义科学立场,立足“现实的人”逻辑起点,从“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中提出“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区别于资本逻辑宰制下“虚假共同体”的异化统治,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的发展实践,将影响人类整体发展的各项因素纳入考察范围,实现对“物的统治”的理论超越,重新赋予人的主体性地位。对人的发展的深度关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新时代理论出场的基本前提,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的价值基点。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超越“个体主义”撕裂,探索未来发展的科学路径。基于对人类整体发展的理论关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表征了人类社会在“类”层面的应然状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解决当下发展现实问题、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空洞的抽象思维,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哲学时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06}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生成和发展的前提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致力于搭建解释世界的理论框架,而是构建解决发展问题的实践方略。通过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具体实践举措,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胸怀天下”“知行合一”等文化内涵在新时代的价值意蕴。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创新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和矛盾,倡导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以更包容、更平衡的全球治理规则取代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规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全球互联互通、促

进发展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二) 坚持整体性和阶段性相统一把握历史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整体性视域审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趋势。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人类社会历经前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最终构建理想社会“真正共同体”样态。马克思聚焦“人的发展”问题以整体性视域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揭示了人类发展整体趋势和不同阶段的社会特征。立足资本主义发展现实,马克思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传统社会变革和世界市场开辟,着重剖析了这一进程中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趋势,提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理论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宏观历史维度,从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认识历史发展规律,遵循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构建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历史发展的创新理论图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指引推进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超越了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类历史的异化进程,从人类层面重新赋予主导历史发展的主体权力,人类成为自身历史发展的自觉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视域,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维度和批判性逻辑中形成把握历史规律的方法论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立足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性实践,总结推动时代发展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异化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冲突、对立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资本主义国家外延到国际社会,如何立足现实背景解决共性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关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16]427} 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社会的现阶段实践背景为依据,遵循整体性发展规律,提出一系列解决当下发展问题的实践举措,统筹国际社会发展困境与人类社会长远需求,形成可操作性实践方略。在继

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秉持整体性理论视野,实施阶段性实践举措,直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的制度背景,明确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的目标指向,批判了资本主义狭隘的、二元对立的发展观,提供保障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理论导向。

(三) 坚持系统性和协同性相统一推动人类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系统性结构内涵,内蕴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大结构。从内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6]46}。诸多要素覆盖人的发展各个领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相关联,依靠不同子系统要素之间的影响互动,共同构建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系统结构。面对当前动荡变革的时代背景,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的生发、累计和激变影响着人类社会系统稳定的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13]447},从现实层面回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求和目标指向,成为引领人类社会系统优化的智慧方案。从系统性角度出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各国家共同体、各区域共同体、各国际组织作为子系统,都应致力于共商发展机制、共建全球市场、共享发展成果,推进人类社会系统结构稳定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维护现实世界系统稳定的理论旨趣,使得这一理念在实践进程中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共识性实践方略,彰显了中国古老文明构建“和谐世界”谋求“大同世界”的时代智慧。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实施协同性实践策略,凝聚共识性力量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协同是指事物系统之间保持集体性、有序性、协调性与合作性状态和趋势。”^[17]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具有系统性结构内涵的理论架构,其实践开展必然要求不同子系统之间协同进行。马克思指出:“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作协作。”^{[18]378}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一项协同性“复杂劳动”,其构建主体依赖于存在制度理念、发展阶段、文化底蕴、体量规模等要素差异的世界各国。不同国家之间在“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指引下,通过共同协作实现差异性互补,构建和谐发展局面,避免“个体主义”所导致的发展失序和冲突对抗。通过在人类层面倡导发展、安全等共同理念诉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充分尊重不同国家发展道路和文化特色的前提下,寻求不同发展主体的共同利益生发点,推进各方协同共进,达到共同发展目的。在动荡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性理论内涵和实践策略形成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动力,也成为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方法指引。

遵循“两个结合”方法论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新时代人类社会发 展实践,从共同体视角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指向和实践策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提供了目标参照。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彰显了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理念坚持科学性和实践性相统一透视人类社会发 展现实,推进理论创新发展;坚持整体性与阶段性相统一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坚持系统性和协同性相统一,构建实践方略,推动人类社会发 展。通过科学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理论和实践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王先谦.荀子集解: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13]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14]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17] 宋超,龚洁.人类命运共同体生产力发展特点的系统哲学解读[J].系统科学学报,2022(3):61-66.
-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光 翟)

“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体系： 价值旨趣与实践效能*

刘元欣¹ 王伟²

(1.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 102206;
2.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 “五史”教育是经管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在励志鼓舞和教育使命维度上显示精神激励—立志报国相契合的战略取向价值;在教学内容和育人目标维度上体现立德—树人相耦合的铸魂育人功效;在学科建设与专业实际维度上体现“教学—专业—社会服务”相贯通的科产教融合功效,从而用辩证思维打造和推进“五史”教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多维时空融合形塑范式。

[关键词] “五史”教育; 课程思政; 励志鼓舞; 铸魂育人; 实践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38-09

一、研究背景:“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的缘由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从而将以前“四史”增加了“中华民族史”,扩展为“五史”教育。“五史”既包括了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历史内容,还蕴含着丰沛的历史思想和民族精神,在教育中提升青年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是青年成长成才、勇担使命最好的教科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2]181}。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全面推进

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3]。课程思政以“课程”为基础,以“思政”为着力点,强调在知识传授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和价值引领^[4],实现对学生的知识传授、人格养成、能力建设、价值引领“四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5]。“五史”教育融入课程思政,为课程教学提供历史背景支撑和历史发展线索,让师生们能够在历史中找到根本依据,掌握所蕴含的人类发展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规律,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

经济管理类专业主要培养对象是未来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管理人才,是企业组织核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项目“‘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与实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VSZ122)。

[收稿日期] 2025-05-18

[作者简介] 刘元欣,女,河北永清人,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王伟,男,河南商丘人,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心决策的发出者,影响企业组织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方向。管理者的人文素养会直接关系到其战略思维及决策内容。《纲要》指出,“经济管理类专业要在课程教学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帮助学生了解相关专业和行业领域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3]经济管理类课程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国家战略方针,将个人发展与企业发展、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学习“五史”是研判世情、国情、党情,科学把握党和国家所处历史方位和战略布局的前提与基础,与经管类课程人才培养的要求趋同,是经管类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现阶段,“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缺少有效方法和路径。一方面,经管类课程往往以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管理方式为主要内容进行教学,在缺少翔实的思政框架体系条件下,不易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另一方面,相关课程的思政建设与“五史”教育联系不够紧密。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是新时代经管类专业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内在价值。

二、励志鼓舞:“五史”教育明晰经管类课程思政的价值旨趣

课程思政的本质还是思政课,课程思政具有和思政课程一样的德育价值。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重要举措,旨在使德育与智育相统一,推动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一)涵养青年学生正确价值观的现实需要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的“兴”与“强”必须基于正确的价值取向,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期,身担民族复兴之大任,塑造、培育、涵养正确的价值观极具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6]。经管类

专业学生未来或将投身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在金融机构与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运营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领域无不深刻嵌入经济利益的博弈与道德挑战的考量之中。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基石,更是确保社会经济活动健康有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

“五史”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弱小到强大的历史见证与经验总结。加强“五史”教育,以史为鉴,能够使青年学生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实现经管专业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知识与思政的协同育人效应,使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寻找理论滋养和精神支柱,增强理想信念,形成良好的价值观,提升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

(二)落实高校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举措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工作的根本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有责任引导青年学生在夯实专业基础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锤炼高尚品德,争做国之栋梁^[7]。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管理类人才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这对高校培养高素质经管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课程思政作为连接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桥梁,其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全面性与深度,将“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旨在引导学生自觉摒弃历史虚无主义,自觉用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凝聚力量、唤起使命、修炼德行,实现个人品德修养与专业能力提升双重目标,有力推动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面落实。

(三)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需求

重视并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青年作为我国发展的主力军,是否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安全观,不但关乎青年未来的发展道路,而且更关乎国家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增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造就一代又一代有为青年的根本要求和题中之义。

经管类课程体系以西方经济理论、管理理论为主体,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的反映。经管类专业学生因专业特性更易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潜在对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学科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丰富的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总结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规律,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科体系。因此,将“五史”思想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可以引导学生在深入理解国家战略及经济政策的同时,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更好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工作战略。

(四)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1]新时代青年通过加强“五史”教育,提升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准确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价值意蕴,洞悉过往的“来时路”,方能稳健迈上“脚下路”,进而照亮通往辉煌未来的“前行之路”。“五史”融合了历史的深沉、理论的深邃与现实的鲜活,它不仅是时间的记录,更是共产主义者不懈追求人类解放、中国人民福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史诗,展现了先驱们英勇牺牲、勤勉耕耘、开拓创新的精神。这种理想信念的灌输,能够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坚定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的决心。

经管类专业学生作为未来经济建设的生力军,肩负着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任。通过“五史”教育,学生能够深刻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认识到自己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参与者,更是国家繁荣富强的见证者和推动者。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将促使学生更加关注国家发展大局,积极投身到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任务中去,成为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四有”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三、铸魂育人:“五史”引领经管类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向

课程思政建设育人体系的基本理论逻辑可以定位为:基于立德树人任务,紧紧围绕“为党为国育才”目标,通过全员、全程、全方位对课程进行深层次改革,为专业课程赋“魂”,促进课程建设从教学向教育转变,让学生成为大人才,让教师成为大先生。

(一) “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教学内容具有统一性

“五史”从整体上看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发展史,涵盖了社会主义发展历程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以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文化遗产等。教育内容贯穿古今,为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例证素材和史料支撑,更提供了宽广的历史视角和开拓的战略思维。经管类课程内容通常包括管理学、经济学、财务、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规划和创业等方面的知识。这些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商业意识和技能,以及领导团队、制定市场策略、进行财务分析和决策等能力。经济管理活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从本质上来讲,经济管理活动是具体化的“五史”内容的体现和延伸,二者之间是融通互构的关系。

“五史”与管理学思想之间具有内在融通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是管理学思想的现实体现,与管理类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相连。1935

年的遵义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取消了由“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的军事“三人团”,建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此次变革破解了中国革命和长征中最深层的领导危机,是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正确应用;1953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通过“五年计划”设立了国家阶段性发展目标,牢牢把握住国家发展方向,深刻体现了制定计划的纲领性作用;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针对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方针,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形成兼容并蓄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管理学思想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体现^[8]。“五史”内容中无不体现着管理思想的正确应用,“五史”为管理学思想提供丰富的现实素材,又不断通过现实事迹印证管理学思想,“五史”与管理学思想相互融通。

“五史”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存在内在融通性。“五史”教学内容为经济学理论提供详细的历史背景和实践案例,是经济学的“源”,而经济学理论则为“五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经济史的“流”。“五史”和经济学理论之间互融互通。1935年1月,红军长征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跟随红军来到遵义,在当地开展苏区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凭借着红军的良好信用,苏维埃国家银行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的物资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是经济学思想中信用的重要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我国采取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打击投机倒把,加强市场管理,统一财政经济,全面调整工商业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稳定了国家局势,是国家调控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各民族共同的市场得以不断成熟,在这一过程中东西部的联系不断加强,经济发展既离不开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繁荣,也离不开中西部地区包括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产业,形成相互依存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8],这也是经济学资源统筹优化配置思想的体现。2005年,中国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上市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问题,实现了股权全流通,解决了非流通股和流通股之间的利益不平衡问题,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市场经济理论的真实体现。“五史”与经济学理论相互融通,“五史”素材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知识,两者在内容和思想上存在高度一致,将“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有其现实意义,更具现实基础。

(二)“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具有一致性

“五史”作为党、国家、改革开放历程、社会主义发展及中华民族进步的真实写照,其教育核心在于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全面把握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这一宏伟历史进程中的主题脉络,强化学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筑牢理想信念之基。经管类课程思政是以理论知识为依托的价值观教育,需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9],增强新时代大学生爱党、爱国的厚重情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可见,“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都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导向,教育目标具有一致性。

具体来看,“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方面具有一致性。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五史”教育不仅是对过往事件的回顾,更是将历史中的深邃哲理与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深刻对比,以史为鉴,指导现实,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在经管领域,学生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更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历史原因,更好地把握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以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现实挑战。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历史观,可将“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有机结合。例如,在讲授经济学原理时,可以引入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改革案例,让学生了解到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背后的历史背景和逻辑关系;在探讨国际经济关系时,分析不同经济制度的优劣和适应性,对比中外经济发展史、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以及中国是如何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有助于学生理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和历史必然性,从而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在塑造学生民族复兴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上具有一致性。“五史”教育使学生从党的奋斗历程、国家的沧桑巨变、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全方位、多角度地深刻认识当下党情、国情与世情,有助于其在宏阔历史视野之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自觉肩负起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成长为引领时代向前发展的先锋力量^[10]。经管类课程思政则通过结合国家形势和政策方针,将个人发展、专业特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时,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经管类课程思政通过解读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意义,引导学生认识到国家政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在其中的责任和使命。如讲解公司筹资环境时,经管类课程思政向学生揭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关键痛点难点,激发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都以塑造学生民族复兴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育人目标,共同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

“五史”教育与经管类课程思政在引导学生抵制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具有一致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歪曲、颠覆历史本来面目。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无孔不入,对青年学生极具蛊惑性、煽动性、腐蚀性。而“五史”教育为学生点亮了历史的长明灯,使他们能够穿透迷雾,追根溯源,清晰辨识各类错误思潮的

实质。经管类课程思政同样在引导学生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经济学课程中,讲解经济全球化过程时,结合跨国公司在营销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文化产品的输出等具体案例,分析这些活动背后的意识形态意图,引导学生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中国应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自觉抵制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在管理学课程中,通过跨国企业的案例分析,讲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实践和文化冲突,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和多样性,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文化自觉意识,从而在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时保持清醒头脑。

“五史”教育是真实的历史,沉淀着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智慧,经管类课程思政则是具体又生动的教学实践,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活性养分,后者为前者增添了方法借鉴,二者的目标都是实现铸魂育人、立德树人。

四、融会贯通:“五史”教育深化经管类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

“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是一项多元素、多层次和多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点—线—面”模型将专业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划分为三个层面: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点”指的是在课堂教学中根据思政映射点设置具体的价值目标,并通过适当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实现课堂育人目标,即课堂思政建设;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线”指的是围绕一门课程的特点和目标,构建该门课程的思政育人链条,即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建设“面”指的是所有不同的专业课程思政合力形成的教育核心素养,构建专业育人体系,即专业思政建设。要实现“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应跟随“专业—课程—课堂”逻辑主线,“自上而下”明确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自下而上”构筑“五史”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思政模式,形成“上下交互”的“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路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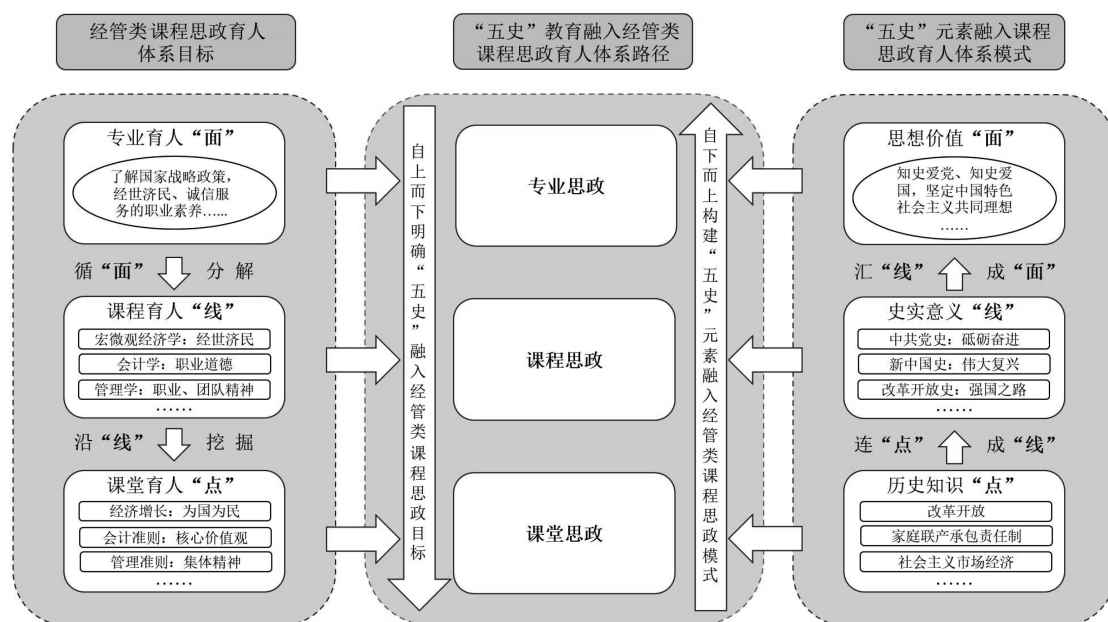


图1 “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构路径

(一)“自上而下”明确“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与思政课程不同,课程思政具有鲜明的专业学科特征,不同专业学科对于人才培养侧重有所差异,需提炼专业育人所要求的核心价值,并将其分解成思政元素,融入不同课程及其课堂的专业知识传授中,实现专业育人的价值目标^[11]。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有其独特的价值内涵,需“自上而下”将其价值和目标逐级分解,形成课程思政、课堂思政目标。

首先,明晰经管类专业思政育人“面”。专业思政育人“面”指的是具有鲜明专业育人导向的核心素养和价值。经管类专业承担着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建需要、具有较强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管理问题能力的专门人才任务。其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学生了解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的国家战略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的职业素养。

其次,具体分解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线”。课程思政育人“线”指的是经深度凝练可以体现课程育人精髓的课程思政逻辑主线^[12]。循着专业思政育人“面”分解到课程思政育人“线”,是自上而下的引导过程。通过

专业思政构建的专业核心素养为各门课程的思政育人提供重点目标指引,形成重点目标清晰、教学体系完善、思政元素挖掘到位的专业课程群,避免课程思政目标构建的盲目性和碎片性^[13],实现课程思政体系和专业思政育人目标的无缝连接。

最后,沿线挖掘经管类课堂思政育人“点”。课堂思政育人“点”指的是沿着课程思政主线统合、挖掘,并有机融入课堂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课堂思政是课程思政的具体实践,沿课程思政育人“线”落实到课堂思政元素“点”,通过思政元素融入课堂内容,在每一堂课中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统筹结合,形成课堂思政目标。

(二)“自下而上”构筑“五史”元素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模式

“五史”元素融入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并非一蹴而就的简单任务,而是一个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遵循着“自下而上”的构筑逻辑,从课堂思政的历史知识“点”出发,逐步向上延伸至课程思政的史实意义“线”,并最终在专业思政层面诠释出思想价值“面”。通过精心设计的层次递进策略,逐步深化学生对“五史”的理解与认同,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能够深刻领悟历史的

真谛,形成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首先,课堂思政融入历史知识“点”。历史知识“点”指的是“五史”中涵盖的事实性内容,包括“五史”具体事件和人物事迹等要素。“五史”融入课程思政首先是历史知识“点”的融入。课堂教学包含许多专业知识点,而部分知识点具有思政属性,找到潜在可融入“五史”知识点的课堂内容,在专业知识教学的同时融入“五史”的人物、事件、会议、文件等“五史”知识点。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取关于“五史”的描述性信息,构建起“五史是什么”层面的知识网络,对于严谨且宏阔的历史事实形成较为宽广而深刻的认识。

其次,课程思政体现史实意义“线”。史实意义“线”指的是在认识“五史”事实性内容的基础上关联人物、事件等知识“点”,连“点”成线,形成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内涵、意义与价值的体会。课程教学由课堂教学组成,课程教学体现的是课堂知识点的整合,形成课程知识体系。与此同时,课程思政将课堂思政中的“五史”知识点进行关联,促使学生理解历史人物、事件的内涵、意义,更深层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

最后,专业思政诠释思想价值“面”。思想价值“面”指的是在历史事实意义“线”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诠释思想价值“面”是“五史”融入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最后一步。专业教学由多门专业课程组成,学生在收获专业知识的同时,将各个课程中领悟到的史实内涵和意义汇聚到一起,形成整体感悟和价值判断,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在坚定信念中将历史观念转换为行为,达成观念与行为上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五、学以致用:“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的案例教学

应深入探讨“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实践路径。可以经管类专业的核心课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为主线,梳理“五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的逻辑图谱。

(一)“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目标解析

首先,明确经管类专业思政育人目标,以《纲要》要求“帮助学生了解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的国家战略和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现实问题,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的职业素养”^[3]作为指引。

其次,分解专业育人目标至具体课程。经管类专业通常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课程。“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以经济学基础理论为基本教学内容,其思政育人重点目标为引导学生树立“经世济民”理念;“会计学”主要传授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其思政育人逻辑应以“职业道德”为主线;“管理学原理”的主要教学内容是管理理论,其课程思政核心价值更加丰富,如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精诚合作的团队精神以及兼容并包的人文情怀等。

最后,结合课程的知识点形成课堂思政目标。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为例,其具体内容包括供求均衡价格理论、政府干预、激励机制、内生增长理论、IS-LM 模型、AD-AS 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知识点。结合该课程思政育人方向,对应课程内容及课程特点设计,分解形成课堂思政育人元素。例如在供求均衡价格理论教学中,帮助学生认识我国市场经济规律,把握中国国情;在 IS-LM 模型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坚定道路自信等。

(二)“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模式构建

首先,识别可融入经管类课程的“五史”元素。如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的市场机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历史事件,与教学内容相匹配,将“五史”知识点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原理等相结合,形成跨学科的知识网络,使学生在在学习经济学的同时,对“五史”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其次,深化“五史”融入经管类课程的意义与价值。通过每一堂课将“五史”融入宏观

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由课堂思政转向课程思政,使学生理解经济学理论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特定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紧密相连,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提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经邦济世”“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五史”融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课程思政主线如表 1 所示。

最后,将“五史”教育拓展至其他经管类

专业课程思政,实现“五史”教育融入经管类课程思政育人体系。通过“五史”教育丰富滋养、塑造学生全面而深刻的历史认知,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与价值观,学会以客观理性的视角审视历史变迁与经济现象,深刻理解国家战略背后的深远意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独特魅力和显著优势,激励学生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与坚定的信念追求,将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国家的发展蓝图紧密相连,成为勇于担当的新时代经管人才。

表 1 “五史”教育融入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课程思政主线

教学内容 “五史”元素		课堂思政要点	课程思政主线
		课堂思政设计	
供给、需求与市场均衡	中国价格改革历程	课堂内容:在供需曲线与市场均衡教学中融入中国价格改革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40 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价格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 思政元素:通过学习中国价格改革历程,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市场经济规律,深刻把握中国国情	“经邦济世” “经世济民” 的家国情怀
	“看不见的手”	课堂内容:市场经济强调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和资源配置。“看不见的手”理论体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放权让利”“自负盈亏”中,市场机制引入促进了经济效率提高和创新发展 思政元素:通过学习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从历史视角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现实经济现象,培养正确的市场经济观念和理性决策思维	
激励机制原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课堂内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中国农村改革重要里程碑,其成功得益于激励机制原理的有效运用。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赋予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思政元素:引导学生们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进一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优越性	
凯恩斯主义效应	“一五”时期的“三大改造”	课堂内容:“三大改造”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大规模投资和政府支出推动经济复苏,寻求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从凯恩斯主义来看,这一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政府通过调控经济、管理总需求、进行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投资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实践 思政元素:引导学生领会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促进经济腾飞,彰显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内生增长理论	2021 年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课堂内容:小康社会的实现是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社会公平的综合体现。通过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促进消费及投资、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符合宏观经济学中的“内生增长理论” 思政元素:认识到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和政府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增强学生在继续深化改革进程中加强自身创新驱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课堂思政要点		课程思政主线
教学内容	“五史”元素	课堂思政设计
IS - LM 模型	1984 年后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p>课堂内容:中国政府开始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IS-LM 模型可提供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通过聚焦宏观政策,强调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宏观政策体系中的主体地位</p> <p>思政元素: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制度自信,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p>
AD - AS 模型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中国经济应对措施	<p>课堂内容:通过总供求模型,可以理解政府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的影响</p> <p>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灵活性和有效性的认同</p>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转变	<p>课堂内容:通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彰显我国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转变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使汇率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促进经济的内外均衡</p> <p>思政元素:引导学生领悟国家经济决策背后的战略考量与长远眼光,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市场观念以及全球视野</p>
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	“一带一路”	<p>课堂内容:这一倡议可以通过国际贸易理论来理解,强调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协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增强各国间的互联互通</p> <p>思政元素:引导学生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治理问题,培养其全球视野和国际合作精神。理解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责任和担当,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p>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 [2]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3]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Z].教高[2020]3号.
- [4] 毛卫华,汤晓建.价值塑造导向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J].江苏高教,2023(12):126-130.
- [5] 张博.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22.
- [6] 李庆朋.“四史”教育融入日常思政的背景、逻辑与路径[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23):84-86.
- [7] 韩丽丽.经济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探索[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5):126-131.

- [8] 杨霖雨,潘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维向度阐释[J].毛泽东研究,2023(4):27-38.
- [9] 王建胜,尚亚澜.“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机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97-102.
- [10] 闫文革,杨学嘉.“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内在逻辑与深化路径[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22(5):24-29.
- [11] 李春旺,范宝祥,田沛哲.“专业思政”的内涵、体系构建与实践[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6.
- [12] 鞠成晓,李红岩.财会类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的演进逻辑与建构路径[J].会计之友,2024(7):156-161.
- [13] 楚国清,王勇.“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的四重逻辑[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18-23.

(责任编辑 王遐见)

课程思政与文献学课程教学新业态的探索性研究*

——以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为例

朱仙林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作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学科基础课,文献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应得到高度重视。可以将文献学的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同时避免出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两张皮”的现象。基于文献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实际,以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为例提出三条融入路径:充分挖掘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丰富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创新文献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思政元素运用效率;提高文献学教师对江苏区域文化的认识水平,保障思政元素有效融入。同时强调文献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增强学生的使命担当,指出在教学中应注意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提高学生实践探索能力、重视学生学习效果评价等教学要点。

[关键词] 课程思政; 江苏区域文化; 文献学; 课程育人

[中图分类号] G641;G25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47-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学校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关键是切实加强课程建设。在持续强化思想政治课程(即思政课程)建设的同时,深入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即课程思政)尤为重要。但在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结合的同时,应该避免出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两张皮”的现象^[1]。

作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学科基础课,文献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应得到高度重视。文献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所涉及的人物和史料又以古代为主,因此部分学生在学习文献学课程时,往往表现出兴趣不浓、效率低下等问题。面对如此局面,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完美融合,且避免出现专业知识与

思政元素“两张皮”的现象,这取决于在教学过程中能否引入一种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能够切身感知的具有丰富内涵和持久研究价值的对象,而区域文化资源的挖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下文即以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的挖掘为例,来分析文献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新方式。

一、挖掘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思政元素的必要性

江苏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吴、金陵、淮扬、中原四大多元文化及地域特征,有明孝陵、苏州园林、中国大运河等世界文化遗产和昆曲、雕版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丰富而多元的文化,不仅包含了政治、经济思想,也包含了社会、文化制度,同时也以文学、艺术以及民间礼仪的形式来展现^[3]。区域内历代名人辈

*[基金项目]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思政与文献学课程教学新业态的探索性研究”(项目编号:JSSNUJXGG2023YB04)。

[收稿日期] 2025-03-14

[作者简介] 朱仙林,男,四川荣县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出,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最新出版的增订本《江苏艺文志》中共著录江苏籍作家29 617人,著作85 309种^①。如此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典籍,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深具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与实践性的资源。

江苏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的先行者,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需要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学生群体既是江苏高质量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书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接班人。因此,如何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既是江苏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对江苏地区高校而言,充分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课程思政中,是增强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4],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能够激活学生的学习热情,让文献学课程从“死”的学问变为“活”的学问。地方文化典籍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地方文化遗产则是地方文化的活的媒介。地方文化典籍与文化遗产融入文献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为新时代课程思政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实施路径。这种教学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天然的在地性特征,能够有效激活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认知动能,让传统文献学课程从纸本文献的静态研究转向文化遗产的动态实践。本土文化资源所承载的时空记忆与地方经验,恰似思想的触媒,将抽象的文化理论转化为可触摸、可感知的具象存在。当学生查阅泛黄的地方志书时,那些记录乡贤事迹的墨迹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勾连家族记忆的引线;当他们在古村落踏勘碑刻时,镌刻在石壁上的义庄章程不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社区互助传统的鲜活见证。

第二,它能够全面展现江苏地方特色,凸显地域文化的魅力,展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建立文化自信。首先,江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蕴含着鲜明的家国情怀与道德追求。苏州园林的“咫尺之内再造乾坤”体现了天人合一的

哲学智慧,南京夫子庙的科举文化传承着崇文重教的价值理念,扬州盐商文化中“贾而好儒”的精神展现了经济与文化的交融共生。其次,江苏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为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了生动范本。雨花台烈士陵园见证着革命志士的铮铮铁骨,周恩来纪念馆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沙家浜革命故事谱写着军民鱼水情深的壮丽篇章。再次,现代发展成就彰显着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从“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到“苏州工业园区经验”,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凝结着敢为人先的开拓意识。这些文化符号可通过课程实践、研学路线等方式,转化为培养学生民族认同感的鲜活教材。

第三,它能构筑起文化的纽带,为区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江苏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立体化载体。以南京中山陵、苏州古典园林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彰显着中华文明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家国同构”的建筑哲学;以扬州玉雕、宜兴紫砂为代表的传统技艺,蕴含着“匠心独运”的职业精神;而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为代表的场馆等,则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因此,充分挖掘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入文献学课程思政的建设,既能培养本土学生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感,激发传承、保护本土文化的自觉性,更能让外省学生全面了解江苏、融入江苏、宣传江苏,持续扩大江苏的影响力。

二、基于江苏区域文化资源的文献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文献学课程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是课程人文性质的要求,更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江苏区域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为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利用提供了可能性。然而,要想真正在文献学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要充分挖掘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丰富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当下首

^① 见《〈江苏艺文志〉(增订本)说明》,见江庆柏主编《江苏艺文志·南京卷》(增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要任务在于寻找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能与文献学课程知识点相结合的点,以此实现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与文献学课程的有效融合。

一方面,可以教研室为单位,鼓励教研室成员形成思政育人共同体,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研究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促进其转化为思政教育素材。如“两古”专业(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教研室成员可以围绕“古籍活化+思政阐释”的创新路径,形成“文献考辨—价值解码—教学转化”的育人模式,也可以通过对《江苏艺文志》《吴郡文编》等地方文献展开专题研究,发掘出蕴藏其中的思政教育资源。这种基于文献实证的课程思政模式,既增强了学术研究的育人效能,又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创新范式。

另一方面,专业教师应以所上课程的教材为依据,选择与之契合的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以文献学课程教学中使用的《中国古典文献学》^[5]教材为例,教师在讲授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第四节“古代目录书的类别”中的史志目录时,除可以带领学生了解史志目录的内涵及代表性作者及著作外,还可以引导学生关注明代学者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焦竑生于江宁(今南京),师从耿定向、罗汝芳,深谙阳明心学的精髓。作为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状元,他一生著述宏富,著有《澹园集》《焦氏笔乘》《焦氏类林》《国朝献徵录》《国史经籍志》《老子翼》《庄子翼》等,其中《国史经籍志》虽因国史修撰计划中辍而未被纳入正史体系,却在分类学建构上展现出重要价值。因此,在教授此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前往焦竑年轻时读书讲学的地方——清凉山畔的崇正书院开展研学活动,构建“文本细读—空间体验—学术对话”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从文化遗产中提炼学脉传承的

精神密码。这种沉浸式教学实践从三个维度实现了教育目标的价值提升:其一,在认知维度上,通过接触原始文献(线装古籍),学生得以建立版本目录学的具象认知,体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传统;其二,在情感维度上,通过现存历史遗迹的在场体验,有效激发年轻学子的学术使命感,使其自觉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责任;其三,在方法论层面,这种基于历史场域的教学实践,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献学派提供了独特的实践路径,实现了传统学术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而从更宏大的学术史视野来看,此类教学实践实质上呼应了“两个结合”的时代命题。教师通过带领学生重访焦竑等“大先生”的读书治学现场,不仅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解码与传承,更在当代知识生产的语境下,为构建中国自主文献学知识体系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案例。这种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学术人才培养相结合的教育创新,正是高校落实“新文科”建设要求的积极探索,对推动传统人文学科在数字时代的范式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讲授第三章“古典文献的版本”时,教师可以先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给学生讲授南京刻书业在明清时期的繁荣景象^①。明清时期南京作为全国刻书中心之一,其刻书事业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即明初国子监“南监本”的官刻体系,晚明坊刻技术的突破性创新,晚清金陵书局的学术转型。据史料记载,三山街一带书坊林立,形成了集编纂、校勘、刊刻、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②。教师可采用“文献学理论+出版史实”的双轨教学法,在讲授版本特征、刊刻形制等理论知识时,重点结合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十竹斋彩色套印技术等典型案例,阐释版本学中的“金陵本”特色。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韩建新《明清时期江苏私家刻书初探》,《新世纪图书馆》1987年第3期;黄镇伟,伍巧《“诗书并驰可终古,岂止唐世论不刊”——明清以来江苏私家与坊间刻书的发展》,《图书情报研究》2022年第3期。

② 胡应麟《经籍会通四》记载南京三山街及太学前书肆林立。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据张献忠统计,明中后期南京书坊达152家。见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5-108页。

另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前往金陵刻经处等开展研学活动,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学生自行前往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等地,进一步了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历程,在切身感受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事业的巨大贡献。这种“理论—实证—实践”的教学理念,通过地域出版史的特殊视角,为学生构建起版本学知识体系与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路径。

第二,要创新文献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思政元素运用效率。教学方法作为连接教师、知识与学生的重要桥梁,直接关系到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在文献学课程教学中的融入效果。因此,任课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融入给教学实践带来的真切变化与创新需求,进而以教学方法为切入点,创新建构多种教学活动形式,以优化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融入效果。

一方面,以学生为主体,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融入文献学课程,绝不是生拉硬扯,也不只是在“量”上增加几个知识点,而是要切实体现在“润物细无声”的“质”上的内化于心。具体而言,针对当下高校文献学课程普遍存在的认知固化与学习动力不足问题,在教学中设计课前认知建构、课中协作共振、课后反思升华的教学闭环,有效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潜能。首先是前置性区域文化调研任务的认知建构。如在《导论》第三节“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概况”单元教学实施前,教师可以基于文化地理学原理设计差异化预习方案。运用GIS文化圈层划分法,将全国划分为吴越、齐鲁等文献学核心区域,要求学生通过籍贯归属进行自主认领。针对未被认领区域(如燕赵、陇右等),采取“文化大使”激励机制进行任务分配。在此过程中,学生需完成三项认知建构任务:(1)运用目录学方法梳理区域文献学家的著述谱系;(2)借助年谱编纂法整理学者的生平经历;(3)通过学术史视角评价其文献成就的历史定位。该阶段强调史料辨伪与文献考据能力的培养,要求形成具有学术规范的研究综述。

其次是课堂多维互动中的协作共振机制。以江苏籍学生示范教学为例,由学生进行10—15分钟的多媒体学术汇报,运用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展示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的学术网络;继而在教师的辅助下,开展“文献学家成就排序”互动环节,引导学生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林清话》等原始文献展开学术讨论。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现代教育理念,通过课堂的多维互动机制实现学生知识的动态生成。最后是后设认知层面的评价与升华。该课程采用综合评价方式:一方面通过结构化分析评估学习成果,另一方面结合学习日志的质性分析。教师在研讨中重点纠正认知误区,围绕三大主题展开探讨:(1)经典文献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应用;(2)学术传统与创新方法的结合;(3)数字技术时代文献研究的转型发展。通过系统化训练,帮助学生实现从知识积累到文化认同的提升,培养其具备符合国家传统文化传承要求的专业能力。

另一方面,以实践为渠道,拓宽区域文化资源中思政元素融入文献学课程教学的范围。通过构建“课堂讲授—实地考察—价值内化”的教学模式,将地域文献资源的思政元素转化为课程育人的实践载体,有效破解传统文献学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以第二章“古典文献的目录”章节教学为例,在讲授清代私人藏书家时,教师可以引入区域文献学的教学理念,重点剖析清末四大藏书家(瞿镛铁琴铜剑楼、杨以增海源阁、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的文化遗产轨迹。其中,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历经清末民初的动荡仍完整保存于南京图书馆,与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于1907年流失东瀛形成鲜明对比。通过这一历史现象的对比分析,启发学生思考文献传承与社会变迁的内在关联。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南京图书馆实地考察,实施情境教学法,让学生观摩丁氏藏书中的批校题跋、递藏印记,在物质性文本的接触中感悟藏书家“读书种子”不绝于世的文化担当。从比较文献学视角切入,引导学生建立多维分析框架:首先,运用文献

计量学方法统计两处藏书版本存佚情况;其次,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及原始史料,还原陆氏藏书流散的历史语境;最后,引入新文化史研究方法,探讨典籍流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文化博弈。这种多维度的学术训练,既能深化学生的专业认知,又可自然引出“典籍存亡与国运兴衰”的思政主题。教学实践表明,依托区域文化资源构建文献学课程思政体系,能够有效实现三重育人目标:在知识维度上,强化学生对文献演进规律的专业认知;在能力维度上,培养其运用多学科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学术素养;在价值维度上,塑造其传承中华文脉的使命意识。这种教学改革既符合文献学注重实证的学科特性,又响应了新时代文科教育“价值引领、能力本位、知识融合”的改革导向,为传统文化类课程的思政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范式。

第三,提高文献学教师对江苏区域文化的认识水平,保障思政元素有效融入。从教育生态学视域考察,区域文化资源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实质上是知识再生产的过程,其中教师作为文化转译者与价值引导者的双重角色具有关键作用。然而,并非所有文献学任课教师都是本土籍,即便是本土籍教师群体也存在区域文化认知的系统性缺失问题,这种结构性矛盾制约着课程思政的深层融合。因此,有必要通过提升任课教师对江苏区域文化的认识水平,为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政元素融入文献学课程提供有效保障。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建议实施“三阶递进”式提升策略:首先,建立分阶段文献梳理机制。可以依照《江苏文库》编纂体例,组织学科团队对地域文化典籍进行三级分类——基础文献(方志、谱牒)、衍生文献(文人别集、书院讲录)、活化文献(非遗档案、口述史料),通过集体研读与主题工作坊形式,系统培育教师的文化解码能力。其次,构建校地知识迁移网络。依托《江苏文化建设工程实施办法》,建立常态化的双向智库对话机制,采用“双导师制”(高校教师+地方文化馆员)开展田野工作坊,重点破解吴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等亚文化圈层的

价值转化难题。最后,实施浸润式教研改革。设计包含文化认知诊断、教学案例开发、效果评估反馈的三维能力框架,将地域文化研修纳入教师发展学分体系,并通过定期组织与江苏区域文化相关的专题培训、教研活动、微课比赛等,促进教学策略的迭代升级。

三、江苏区域文化在文献学课程思政中的教学要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发布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高等教育阶段的思政课程建设应聚焦“增强使命担当”的核心目标。这一政策导向为高校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遵循和实践指南。在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框架下,本研究聚焦江苏区域文化资源的思政价值挖掘,探讨其在文献学课程中的创新转化路径,重点围绕使命担当意识的培养构建教学体系。江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其文化谱系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吴文化的崇文重教传统、金陵文化的家国情怀底蕴、淮扬文化的创新求变特质、楚汉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构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价值体系。文献学课程作为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载体,应充分发挥其在文化解码和价值重构方面的学科优势,通过系统梳理江苏古籍文献、地方志书、口述史料等文化载体,提炼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创新意识、社会责任观念等思政元素。具体而言,要注意以下要点:

第一,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岳麓书院时强调:“当代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又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江苏作为“吴韵汉风”的文化沃土,拥有大运河文化带、江南文脉等独特资源,应当在新时代文化自信培育中彰显地域担当。我们要通过深入挖掘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发挥好课堂教学主

渠道作用,持续培养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坚定文化自信,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坚力量。

第二,提高学生实践探索能力。当前思政教育面临显性知识传授与隐性价值内化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学生认为传统教学方式存在“抽象化”“悬浮化”倾向,导致认知图式与实践场域难以有效衔接。江苏区域文化资源具有三重在场性特征:地理空间的实体在场(如南京城墙、扬州运河)、文化符号的意象在场(金陵文脉、吴韵汉风)、价值体系的逻辑在场(雨花英烈精神、张謇实业精神),形成独特的文化认知图谱。对学生而言,这些文化资源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可感知力,教师在教学中可借此引导学生通过亲身感知、亲自调研、亲自体验等方式,深入挖掘那些看似熟悉而又从未深究的内容,进而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生活有机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既提高了实践探索能力,又能将所学知识内化于心。

第三,重视学生学习效果评价。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其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直接关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程度。在文献学专业领域,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学习效果评价机制,已成为推进课程思政内涵式发展的关键命题。传统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局限:单一标准化测试难以全面衡量思政育人成效,量化指标与质性评价失衡导致价值引导功能弱化,终结性评价为主的模式缺乏对学习过程的动态监测。这种评价范式无法适应文献学课程思政建设对“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育人目标的要求。因此,亟须构建符合人文学科特质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实现个性化培养与标准化考核的辩证统一。具体而言,除期末闭卷

测试外,教师可创新设计“先贤精神传承”主题演讲、“经典文献中的价值观”读书报告会等实践活动。同时,为提升评价的专业性和规范性,教师可编制《文献学课程思政小组合作评价量表》,设定文献解读深度(30%)、思政元素融入度(25%)、团队协作效度(25%)、创新思维展现度(20%)四项二级指标。通过组间竞争性展示、跨组互评答辩等机制,既激发学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活力,又能培养合作竞争意识。这种多维评价体系的建构,将认知领域的知识维度与情感领域的价值维度有机整合,突破传统文献学考核的文本中心主义,建立了专业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评价标准;破解人文学科评价的量化困境,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质性评价范式;通过评价反哺教学,形成“评价—改进—提升”的质量闭环。这对于推动文献学课程思政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良.课程思政如何破解“两张皮”难题——知识与社会联系的认识论视角[J].教育研究,2023(6):59-66.
- [2] 胡小海,黄震方.江苏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特征及其作用机制[J].江苏社会科学,2017(1):254-259.
- [3] 薛志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区域化践行探索——以江苏区域文化精神为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4):58-62.
- [4] 李敏,李红梅.激活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N].新华日报,2024-07-12(20).
- [5]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三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定位·结点·融合

——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双螺旋”模式构建策略

王雅琴

(安徽艺术学院美育与高等艺术教育研究所, 安徽合肥 230011)

[摘要] 中学语文教育对于青少年身心发育和思想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塑造中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中学语文篇目的选择与课程思政之间关系密切。中学语文篇目是中学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虽然两者在属性定位、目标追求、呈现状态、变化形式等方面有区别,但在目标与价值、情感与审美、方法与路径上却有着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成为两者融合的结点。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可以围绕结点,通过自我与自我关系的认知、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等教学途径,实现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双螺旋”模式构建,实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关键词] 中学语文篇目; 课程思政; “双螺旋”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33.33;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53-08

中学是青少年身心发育和思想健康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重要阶段。中学教育合理选择语文教材和教材中的篇目对于青少年教育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学语文教材版本多,内容差异大。1950年由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编辑出版供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的教材。但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由于地域差异、教育水平不同、学生特点等原因出现了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如北师大版、苏教版、湘教版、鄂教版、西师版等。这些版本的语文教材在内容、形式、风格上各有不同。2017年,全国开始使用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语文教材。语文课程不仅是认识现实、认知社会的知识能力传授工具,还是塑造青少年精神世界的引导工具。《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明确指出语文课程要致力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语文课程在建立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1],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实现途径。

中学语文篇目和课程思政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生物学中DNA分子双螺旋结构。双螺旋概念源自生物学。1953年J. D. Watson等学者提出双链DNA结构模型,即双螺旋模型。该结构由两条主链和连接链条主链的酯键组成,主链相互补充、相互促进^[2]。DNA分子的双螺旋链如同两条既相互独立,具有各自发展规律,又有交集和融合,最终相互影响并呈上升趋势的曲线。双螺旋理论后来被引入教育

* **[基金项目]** 2023年安徽省质量工程重点教研项目“《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三重维度”(项目编号:2023jyxm0939),2024年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AI+教育”(项目编号:2024aijy508)。

[收稿日期] 2025-01-19

[作者简介] 王雅琴,女,安徽六安人,安徽艺术学院美育与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

领域,强调教学管理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中学语文篇目和课程思政之间也如同双链DNA结构模型^[3],它们定位不同,属性不同,却在本质上有着相同的目标与价值追求、情感与审美诉求,并在不同基础上实现方法与路径,以“双螺旋”模式实现两者的融合。

一、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属性定位

中学语文篇目(以2017年开始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即部编版为例)与课程思政是双螺旋的两条主链,两者在属性定位、目标追求、呈现方式、变化形式等方面都有区别,如同DNA分子两条独立延伸的双螺旋链。

(一)属性界定:理念与载体

从本质上来说,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有着较大的差异,具有不同的属性。课程思政要素是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其本质是一种精神观念和价值追求,它需要以各类课程为载体并根据不同的课程特点体现思政理念。中学语文篇目则是中学语文课程的主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选择的具体呈现。语文篇目在形式上丰富多样,在表达上具体可感,在内容上指向鲜明,是蕴含了课程思政理念的载体。

(二)目标追求:立德树人与三重能力塑造

坚持“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要求和基本遵循。思政内容在不同课程中的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呈现方式也并不一致,但价值旨归是相同的,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其目标更加丰富,包含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三重目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它需要传授知识,包括学生表达、交流、语言文字运用的知识;需要培养能力,通过作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扩散思维、发展个性、增强意志等诸多方面的能力;需要提升素质、健全人格,形成良好个性品质,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比如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对于古代典籍案牍常备、现代诗歌学

会欣赏、名家散文懂得借鉴、小说戏剧能够评价。对于具体语文篇目,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表情达意,对文章中的字、词、句、段、篇等语文知识基础不断深化,小到语音、字词、语句、标点符号,大到文化文学常识、文体特征、手法赏析等都需要逐一掌握,对各类文体阅读和表达需要进行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在高中阶段还需要具备借助篇目学习阅读理解、信息处理、应用写作、语言表达、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等六大关键能力,拓展阅读宽度、表达厚度和思维深度。

(三)呈现方式:隐性与显性

课程思政教育是中学语文课程教育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属性不同、目标有区别,因此在呈现方式上也有着显著区别。课程思政不是思政课程,它是一种教育理念,要求在课程教学中不能简单以思政说教和观念灌输来实现,而是要力图将含有思政元素的教育因子“不动声色”地融入各类课程中,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同时课程思政还是一种情感教育,要力图让学生在情感上自觉接受,将思政教育的思想和观点潜移默化地融入学生的情感世界中,对学生产生深远影响,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领悟与接受,并以此为指引,实现“内省外化”和“知行统一”。比如在对“文化自信”进行解读时,不应仅用概念性的语言和说教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是文化自信,而应通过对不同文学作品的阅读,感受中国语言的魅力、诗词意蕴的悠远、人格魅力的塑造、经典诵读的意义,潜移默化地让学生认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深刻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

中学语文篇目在呈现方式上则是以具体可感的显性方式出现,鲜明表现主题,比如《黄河颂》中“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白杨礼赞》中“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谁是最可爱的人》中“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最苦与最乐》中“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有些篇目以文章的题目直接表达文章主旨,比如《再塑生命的人》《回忆我的母亲》《纪念刘和珍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等。即使在一些没有明显体现主旨的篇目中,教师也会通过教学手段如中心思想提炼、内容摘要总结、问题解答训练等教学设计来彰显和强化文章主题,引导学生交流表达、讨论探究^[4],让学生在学文的过程中领悟思政要素。另外中学语文教学中还力图通过教材所选篇目塑造学生的人格和品质,引导学生在做人、处事和对待生活上具备积极态度等,因此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比如对谦虚、善良、宽容、自强等个人品格的塑造。这些都要在呈现方式上表达清晰、指向明确、教育效果显著。

(四)变化形式:稳定与调整

思政要素是思政教育的构成内容。思政教育的具体实践路径可以多样化,但其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相对稳定性。

语文篇目是语文教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思政要素体现的载体之一,它的选择除了经典性也往往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并会随着教学对象的变化而变化。某种程度上语文课本篇目的选择与变化往往体现了时代烙印和地域特色。语文教材最初作为文化知识的启蒙书,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承担了宣传抗日救国、民族解放思想的重任,世纪之交又成为追求现代文明的窗口^[5]。进入新时代语文教学成为

“建立文化自信、培育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可以说语文教材篇目的选择成为一定程度上历史和时代变迁的“体温计”。例如,2005年,鲁迅先生的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删减曾引发广泛争论,其焦点就是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否适合时代发展,是否还应在语文教材篇目中占据重要位置。在部编版的语文教材中,篇目的选择也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调整,大到板块设置变化,小到篇目选择的变动。如2024年秋七年级上册语文就新增了《我的白鸽》等6篇文章,删减4篇文章;八年级上册新增了包括《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天上有颗南仁东星》等具有时代性的3篇文章,删减3篇文章;九年级上册新增《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9篇文章,删减7篇文章。新增的文章多是时代发展的体现和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融合结点

“双螺旋”发展不是平行发展的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影响与融合,两者之间有相同的关键点,只有把握好两者的结合点,才能有效实现融合(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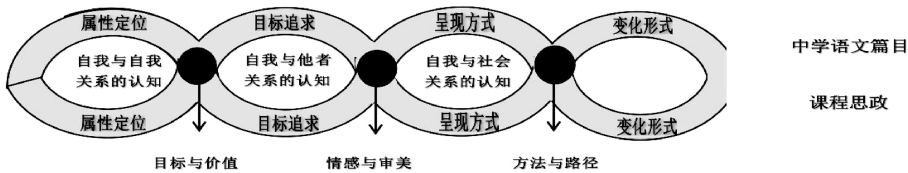


图1 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双螺旋”模式构建

(一)目标与价值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不同,它是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融入不同的课程中,并借助不同课程的特殊性采用不同的思政传授方式,从而实现影响深远的思政教育目标。中学语文作为中学课程中最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最有助于学生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课程,也是最易实现思政目标的课程,与课程思政具有天然的协同性。

中学语文借助不同类型的篇目教学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辨别是非、判断对

错,沟通他人、与人友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热爱人民、报效祖国。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中学语文篇目包含的内容丰富,不仅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还蕴含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中华儿女独特的价值体系。比如学生可以从《春》《济南的冬天》《天净沙·秋思》中感受大自然生生不息、多姿多彩的四时美景,从而激发对生活的热爱;从《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树立正确对待人生挫折和困难的态度等。这些都有助

于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感悟生命等人文精神,让学生逐渐感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处世之道、“正心笃志、崇德弘毅”的理想追求。还有助于将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工匠精神、爱国情感与民族精神等贯彻课程始终,最终培养学生成为具备知书达理、讲礼知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知荣辱、守诚信、能吃苦、敢创新的新时代中学生。

(二)情感与审美

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课程思政要求各类课程在教学中利用不同的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同时“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造创新活力”^[6],而这也是中学语文教学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学语文常选用一些能让学生在作品中感受丰富情感、体悟中华美学精神的作品。经典作品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能够涵养情性、启迪人生,从而帮助学生形成健全人格,陶冶良好道德情操^[7],从而成长为一个情感丰富、富有生活情趣、热爱生活的人。

比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借助杜甫在人生不同时期的诗词作品来引导学生感受爱国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爱国之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时的真情流露。年轻时杜甫深受儒家思想“仁者爱人”和“济世安民”的影响,充满热血与激情,拥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经过安史之乱后,作者目睹繁华壮丽的京都变成废墟,心生感慨,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直抒诗人凄苦哀思、忧国忧民的悲切之情;战后诗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诗人笔下的生活正是老百姓困顿与凄苦的真实写照,百姓“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但诗人心中的爱国之情未曾消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当听到战乱结束,叛乱已平的捷报时,作者的喜悦之情喷涌而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然而,战乱虽已结束,但各地军阀又乘势而起,

争夺地盘,国家依旧满目疮痍,百姓依旧贫困潦倒,诗人面对民不聊生的现实社会,独自登上夔州白帝城外的高台,在萧瑟的秋景中,将老病孤愁的悲哀融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抑郁不得志的感慨之中。从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个人的悲苦凄凉还是国家的满目疮痍,无论是年轻时的豪情壮志还是年老时的老病孤愁,无论是喜悦时的“白日放歌”还是忧伤时的“长夜沾湿”,其情感主线一直是浓浓的爱国之情,爱国这一思政主题就在诗人的诗词中体现得丰富多样,立体感人。而学生也可以在诗人直抒胸臆、畅快淋漓中感受沉郁顿挫的悲壮、雄浑婉约的气势、老健苍劲的风格,思政教育也借助语文篇目实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

(三)方法与路径

课程思政与中学语文篇目在实现教学目标上往往采用相似的方法和路径,教师通常设置鲜明的主题,利用模块进行强化,并根据时代背景和教育对象,结合热点进行熏陶与浸润,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立德树人。

如,2020年7月教育部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教材[2020]4号)中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课程思政的目标也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对待劳动,尤其是在物质生活丰富的新时代如何看待劳动的内涵和价值是中学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高中语文必修一上册第二单元选取了《喜看稻菽千重浪——记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袁隆平》《心有一团火,温暖众心人》《“探界者”钟扬》等几篇中心突出的文章来记叙优秀劳动者的杰出事迹、倡导践行工匠精神、歌咏劳动的美好与欢乐,从不同角度彰显劳动的伟大意义,体现劳动精神的传承与发展,让学生深入体会“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思想,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8]34}。同时通过对袁隆平、张秉贵、钟扬等人的介绍,让学生在学习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的基本知识基础上,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

对劳动精神进行深入探讨。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拓宽人生视野和思考深度,以独立思考和哲学思辨的方式理解新时代的劳动。

三、中学语文篇目与课程思政要素的“双螺旋”模式构建策略

中学语文篇目作为课程思政实现的重要载体,两者既有区别又相互影响,它们以目标与价值、情感与审美、方法与路径三个重要结点相联结,在自我与自我关系、自我与他者关系、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中实现两者的“双螺旋”融合,共同实现中学语文的教学目标。

(一)自我与自我关系的认知

1.对内锻造个人素养品格,养成优良品质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出“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中学阶段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注重学生个人品德养成的经典篇目,尤其在初中语文教材篇目中比例较高。这些内容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教育学生养成友善、诚实、感恩、真诚、坚持、忠诚、宽容、勤奋、乐观、热情、明辨、谨慎、勇敢、守信、节俭等优良品质。其中主要包括道德品质和人格品质。

道德品质主要包括诚实、善良、勇敢、正直、同情、真诚等。《致云雀》中歌颂了乐观、自信和对自由、光明的向往;《我为什么而活着》中提到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感情:“爱情和知识,尽其可能地把我引向云霄,但是同情心总把我带回尘世”;卢梭在《怜悯是人的天性》中把怜悯心视为先于理性思考而存在的一种纯自然的人类天性和情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中提出人性本善,也就是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善的因子,都有与人为善的本性,等等。

人格品质主要包括独立、自信、坚韧、乐观、奉献、责任/担当、勤学、守时、感恩、友善等。《红烛》中突出“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奉献精神,将“红烛”“烧蜡成灰”凝练成点亮世界奉献精神的象征;《植树的牧羊人》中对牧羊人无私奉献、坚强毅力的美好品行进行礼赞;《峨日朵雪峰之侧》中展现了“雪峰”“太

阳”“蜘蛛”蕴含的谦卑而强劲的生命力量;《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将那个“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时代楷模形象印刻在人的心中;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阐释了什么是“责任心”,提出对待劳动的态度“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味”;《老人与海》中描述了一个孤单的老人在面临比自己强大很多的大海面前,如何与接踵而至的困难勇敢搏斗,展现出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除此之外,在很多古诗文篇目中也有很多精辟总结:“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不怨天,不尤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等,都体现了不同环境、不同状态下人应具备自强不息和坚韧不拔的品质,不遗余力地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想。

2.对外理解人生与生命的价值,培养坚毅积极的人生态度

中学语文教材篇目中有很多内容是帮助学生从自我转向外部世界,理解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冰心的《谈生命》、勃兰兑斯的《人生》、林觉民的《与妻书》等篇目都在引导学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理想的意义: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而活,如何看待不同的人生理想?这些问题可以在不同语文篇目找到答案:《兰亭集序》从良辰美景、曲水流觞中展开对暂与久、悲与欢、生与死的思考,“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殤为妄作”;哈姆雷特发出“生存还是毁灭”的呐喊;同为孔子的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追求不同的人生目标;林觉民在“巾短情长”和“今日之中国”中选择了后者;罗素在《我为什么而活着》中提出活着的理由“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给出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礼赞白杨》中歌颂了北方的白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到，如同北方的农民，“在北方风雪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等等。

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当人生遭遇挫折或困境时“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如何正确对待并积极面对——“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可以从外界事物寻求力量源泉。当一个人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经历甚至是美好的食物，都会拥有战胜困境和面对挫折的勇气。苏轼在人生的三起三落中，在人生的“雨袭”中，虽有狼狈，但却积极应对——“山头斜照却相迎”。他不仅欣赏“山色空蒙雨亦奇”“岭南万户皆春色”的美景，还“手红冰碗藕”“日啖荔枝三百颗”“且将新火试新茶”，只有正确看待困难与挫折才能理解“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从而用乐观和豁达的态度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学语文教材中有很多描摹山水风光、吟咏人文胜迹的篇目，如《壶口瀑布》《登勃朗峰》《一滴水经过丽江》等。这些篇目中有描写四时美景的“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有展现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风烟俱净，天山共色”；有对话自然、与天地精神之往来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有饱含情感、与自然本真相交流的“那一片辉煌的淡紫色”（《紫藤萝瀑布》），“会孕出一个桃儿来”（《一棵小桃树》）。一切景语皆情语，对山川河流、花草树木的描绘就是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表露，也是我们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法。

可以从内心世界塑造精神支柱。在关注外界环境时，还要关注内心世界，自我克服、自我调适、自我奋进。《走一步，再走一步》中鼓励学生从胆怯、恐惧到克服心理障碍，从而收获自信；《精神的三间小屋》修筑了精神的空间“盛着我们的爱和恨”“盛放着我们的事业”“安放我们自身”，让自己成为自己人生、命

运、情绪的主人。困难与挫折是人生中的一段历程，正视它、战胜它，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如严文井在《永久的生命》中所说，“卑微柔弱的小草在严寒的冬天之后欢乐地迎着春天的风”。

（二）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认知

1. 以情感为基调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

作为社会的人，从出生开始就处于各种关系之中，情感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基调。儒家基本价值观教育人要“爱亲”，只有在实现了“爱亲”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大爱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爱亲”就是要爱身边的人，父母、兄弟、朋友，这也是课程思政中的一个基本要点：处理好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学语文篇目中有大量这样的内容为学生构筑了一个亲情之网，让学生感知到亲情的内涵、价值、意义和力量。

同样是表现对父母的爱，泰戈尔的《金色花》中的稚气、纯真和温馨；朱德的《回忆我的母亲》中的朴素、真挚和深情；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中的神圣、无私和坚强。朱自清的《背影》中“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色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的父亲形象让人潸然泪下；冰心的《荷叶·母亲》中一句“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让人感同身受。还有的篇目表现浓厚的兄弟之情，如汉末三国时期诗人刘桢的《赠从弟》，文字平实、言简意明、风格古朴，不仅表现了手足情深，还勉励其堂弟坚贞自守，不因外力压迫而改变本性。除此之外还有友人之情，如“君子之交淡如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思乡之情，如“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等。

2. 以认知为桥梁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与他者的关系是指看待人类所生存的世界，认识世界、认识宇宙。要科学、唯物、辩证地认识社会和历史，引导学生在《社会历史的

决定性基础》中学习经济因素与历史发展、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学习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人类在不断探索与发现中推动文明的进步,认识世界需要想象力、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和科学态度。要“先要会疑”、有怀疑精神,经过怀疑、思索和辨别三步(《怀疑与学问》)、要“培养创造性思维,成为富有创造力的人”(《谈创造性思维》)、要“继续创造”,用自己的汗、血、热情去创造(《创造宣言》)、要有“格物致知精神”去探求世界上的未知领域(《应有格物致知精神》)、要“驱遣我们的想象”去欣赏文学作品(《驱遣我们的想象》)、要以“不求甚解”的方法去读书(《不求甚解》)、要以“敬业与乐业”的态度去对待工作(《敬业与乐业》)。

(三)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认知

1.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学阶段是学生从少年走向青年的重要时期,也是培养爱国主义的重要阶段。中学语文教材中很多篇目都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首先,爱国之情以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表现出来。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巨大的奉献和牺牲换来了国家的解放、民族的新生。理解中国革命和革命文化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把握当下,树立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高中选修(上)中就以单元模块的形式展现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长征胜利万岁》《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篇目表现了长征胜利结束的欣喜和激动之情,抒发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在民族复兴的历史丰碑上——2020 中国抗疫记》等具有时代性的作品中则展现了对新时代中国人民高尚品格的歌颂,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的坚定信念。

其次,爱国之情还呈现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在儒家思想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深远影响下,中国文人始终抱有一颗爱国忧民的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在很多篇目中都有所体现。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抒发了建功立业的宏愿和“天下归心”的渴望;在《龟虽寿》中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当益壮、自强不息的意志。苏轼以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展现了其报效祖国的壮志雄心;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展示了矢志不渝的报国情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体现了古人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再次,爱国之情还展现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国奉献的决心中。如李贺在《雁门太守行》中一句“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引用典故写出将士誓死报效国家的决心,全诗意境苍凉,格调悲壮,将这种决心烘托得很具震撼力;辛弃疾在《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以“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想替君主完成收复国家失地的大业;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借用传寄亲人、吐露心声的书信,在表达对妻子的至爱中晓以国家大义,以“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的勇决战胜“吾至爱汝”的深情,展示了作者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

最后,爱国之情体现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舍我其谁的责任中。古往今来,众多仁人志士自觉承担匡世济民的责任,积极建言献策,勇于变法图强。他们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坚守道义、勇于担当。如《过秦论》《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对秦朝和后唐灭亡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力图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的奏章,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为国家治理建言献策;《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给司马光的回信,表明作者坚持改革,推动变法的决心,这些篇目都体现了作者对国家大事的担当精神。

2.培养学生爱民情怀

培养学生爱国的同时还要引导学生爱民,

拥有一颗关心百姓的爱民之心。这种爱民情怀一方面体现在面临国破家亡时,设身处地感受着百姓的痛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文天祥在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时以“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唱出心中的忧伤;夏完淳面对山河沦丧在极度悲愤中以“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慷慨赴死。《燕歌行并序》通过对边关战事的描述——出师、失利、被围、死斗,战士拼死力战,后方思妇断肠,展现了作者对百姓、战士的同情之心。选修(下)第一单元的《望海潮》和《扬州慢》一个写承平盛世,一个写劫后孤城。其中《扬州慢》还通过对扬州今昔盛衰的对比,想象杜牧重游故地的震惊和悲哀,强化了兵火劫后的沉痛心情,让人感受到战争对百姓的摧残 and 伤害。

这种爱民情怀还体现在直接表现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手法展示了爱民之情。“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梁甫行》中控诉了统治者的霸行导致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的惨痛景象“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中“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表现了诗人对饱经战争忧患的人民的同情和对和平的渴望;杜甫的《石壕吏》中描绘了官吏的残暴和兵役制度的黑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卖炭翁》中再现了底层百姓的艰难的生活处境,等等。

中学语文篇目是中学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虽然两者在属性定位、目标追求、呈现状态、变化形式等方面有着不同,但在目标与价值、情感与审美、方法与路径上却有着共同点,

这些共同点成为两者融合的联结点。中学语文篇目和课程思政要素就如 DNA 分子的双螺旋链,既相互独立,具有各自发展规律,又有相互影响和融合,最终共同呈现上升趋势,实现两者的“双螺旋”模式构建,共同完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2] WATSON D, CRICK F.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J]. Nature, 1953(171): 737-739.
- [3] 胡守敏, 杨正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案例教学“双螺旋”模式的构建策略——基于重庆文理学院的实践案例[J].大学, 2024(9): 1-2.
- [4] 田恬.小学语文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 2022(4): 42-45.
- [5] 冯辉.百年中学教材中的鲁迅作品选编与形象建构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 2023.
- [6]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D/OL]. (2020-06-06) [2024-12-17].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 [7] 王宇澄.课程思政背景下运用语文教学理论进行“立德树人”研究[J].汉字文化, 2024(7): 28-30.
- [8] 高中语文必修一(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责任编辑 晨 晓)

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路径与展望

——基于深层生态学的探讨

廖 莉^{1,2}

(1.华南师范大学教育集团, 广东广州 510000;
2.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新疆喀什 844000)

[摘 要] 基于阿恩·纳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理论,建构“生态系统—生态智慧—生态位”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分别对应整体主义的体系建构、生态智慧的方法创新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的工具研制,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智能评价技术架构。研究指出技术—教育融合仍面临三重张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脆弱性,算法公平性的理论—实践鸿沟,数据可解释性的认知壁垒。未来研究需着力构建“法律—技术—伦理”协同防护体系,重点突破公平性校正算法,建立跨文化校正路径,同时,构建双通道解释模型,缩小理解鸿沟。生态化智能幼儿学习评价框架将开启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的新路径,有效解决目前学前教育领域在评价方面的短板,为各级政府部门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 深层生态学; 幼儿学习评价; 教育公平; 技术伦理

[中图分类号] G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61-09

一、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教育评价体系。2023 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1],这一战略部署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评价开辟了新方向。当前研究呈现显著的学段失衡现象——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研究多聚焦中小学及大学生,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尚未形成成熟的实践框架,其技术路线及应用展望也不清晰。这种研究断层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开展学生各年级学习情况全过程纵向评价、全要素横向评价”^[2]的要求

形成较大的反差,因此,亟待构建具有学前教育特质的智能评价体系。

当前幼儿学习评价实践面临三重困境:其一,方法上过度依赖观察记录法,导致评价维度碎片化,难以捕捉幼儿发展的非线性特征;其二,数据采集技术有局限,过程性评价缺乏持续性,难以实现对幼儿学习的连续追踪;其三,评价主体间存在认知差异,教师、家长、幼儿的多元数据难以达成解释一致性。阿恩·纳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学为此提供了理论解答,强调生命体与环境的整体关联性,与幼儿学习评价的个性化、过程性、情境性等特点形成理论共鸣。

本研究基于当前幼儿园实施幼儿学习评

[收稿日期] 2025-04-15

[作者简介] 廖 莉,女,湖南醴陵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集团副研究员,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价的实证数据,依托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整体主义、生态智慧、生态中心主义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体系建构、方法创新、工具研制 3 个方面的实施路径,以此推动教育评价研究范式的生态转向,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前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幼儿学习评价的现实局限与突破

(一) 幼儿学习评价的现实局限

为了解当前幼儿园幼儿学习评价的现状及其需求,本研究设计了《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现状》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信息,共设计了包括教师教龄、学历、职务等在内的 10 项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是幼儿发展评价现状与需求的调查,共 6 个维度,分别是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内容、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来源、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实施、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主体、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工具及评价方法、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反馈,共计 26 题。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884 份,涵盖广东省 13 个地级市的 37 个区镇幼儿园,取样地市包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参考经济发展指标来划分),办园体制兼顾公办园和民办园,调查对象涵盖托班到大班 4 个年级的教师群体。

1. 可靠性分析

这里主要对问卷中的量表部分(29-32 题)进行可靠性分析。克隆巴赫的 Alpha 系数(Cronbach's Alpha)是衡量量表内部一致性可靠性的常用统计指标。计算结果显示 Alpha 系数为 0.737,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值为 0.738,这个值与未标准化的 Alpha 值非常接近,说明量表项目在标准化处理后,其内部一致性并没有显著变化。这表明原始量表和标准化处理后的量表在可靠性方面表现相似。

表 1 问卷量表部分信度分析检验结果(N=884)

	总体
题项数	4
克隆巴赫 Alpha	0.737
基于标准化项的克隆巴赫 Alpha	0.738

2. 效度分析

表 2 问卷量表部分效度分析检验结果(N=884)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736
	近似卡方	753.180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	自由度	6
	显著性	<0.001

由表 2 可以看出,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统计量值为 753.180,相应的概率 p 值为 0.000,小于 0.001,在显著性水平下,应拒绝原假设,认为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存在显著相关性。同时, KMO 值为 0.736,说明量表效度较好。

通过问卷统计分析发现,现有的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现实局限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评价内容的偏差

本调查中总样本为 884 份,有效样本量为 884 份,后续以 884 份有效样本结果分析。在多重响应频率结果中,因同样本可能选择多项,各选项总选择的次数为 8 169 人次。其中,对幼儿进行评价时,选择“考虑幼儿身心状况”的有 852 人次,普及率为 96.38%(普及率指选择幼儿身心状况的人次占总人次比例, $852/884=96.38\%$,下列计算公式相同)。由此可知,将“幼儿身心状况”作为评价的主要考虑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是选择“幼儿的生活习惯与生活能力”的人次,普及率为 95.81%。在所列选项中,“幼儿对艺术的表现与创造”“幼儿对艺术的感受与欣赏”以及“幼儿数学认知”的普及率相对较少,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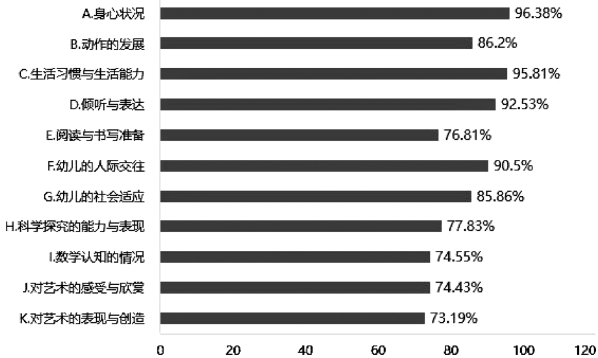


图 1 幼儿学习评价的内容

从调查中发现,评价内容对幼儿发展的各要素虽均有涉及,但是相互之间缺乏非线性交互作用。Maya Bialik(2018)提出,学习专注于为未来的学习奠定基础,既包括知识,也包括能力。基础知识包括核心概念和基本内容;基础能力包括技能(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沟通、合作等)、品格(好奇心、勇气等)和元学习(元认知、成长型心态)^[3]。各评价内容的要素之中,忽视了幼儿的非智力发展因素,如情感态度、学习品质、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导致评价内容产生偏差。

2.评价主体的认知障碍

在评价的具体实施中,幼儿园虽然广泛采取了多主体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带班教师作为评价主体,以 95.14% 的普及率占据主导地位,带班教师的评价方法因其能够全面观察幼儿的日常表现和实时反馈而受到重视,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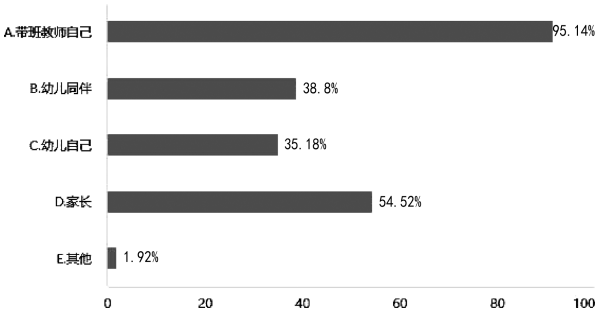


图 2 幼儿学习评价主体情况

幼儿教师成为事实上的单一评价主体,导致实践当中教师对评价的解释与家长对评价结果的理解产生认知上的不一致,未能形成评价共识。评价结果虽能反馈到幼儿园的教学当中,但园方很难与家长形成协同共育,有效支持幼儿的个性化学习,导致评价结果的应用大打折扣。除了幼儿教师和家长,其他的评价主体如幼儿、同伴等的评价,由于评价分析工具的欠缺,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使得评价结果缺乏多视角的验证和补充。

3.评价标准缺乏科学性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幼儿学习评价实践当中,幼儿教师集中反映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从而导致评价中的结构性困境,详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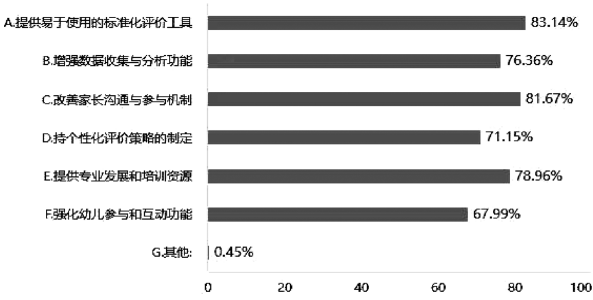


图 3 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平台需求分析

由于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教师、家长各持对幼儿评价的标准参照,造成双方对评价结果的理解难以达成一致。评价实践中科学性不足,也使得幼儿学习评价陷入碎片化的数据收集过程,无法对幼儿学习进行持续的跟踪,更无从对幼儿学习提供后续个性化的支持。评价标准的缺乏,导致园方无法客观地向家长反馈幼儿学习的情况,家园协作共育难以达成一致,有可能引发教育政策干预的方向性错误。

4.评价反馈的碎片化

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学习与发展评价频率以月度评价为主,一个月评价一次的评价频率以33.37%的比例位列第一,一周评价一次的以 27.04% 的比例紧随其后,一学期评价一次的占比 25%,一学期评价两次的评价频率占比 11.65%,一学年评价一次的评价频率比例最低,占比1.13%,其他评价频率比例占比 1.81%。

由于数据技术应用的局限性,导致幼儿评价的反馈缺乏整体性,加之分析工具的缺乏,难以对幼儿学习进行持续的跟踪反馈。当前实践中的幼儿学习评价反馈较为单一,与幼儿发展的多样性产生冲突。其结果存在家长理解差异、评价难以适应幼儿个性化需求等问题。

评价反馈的碎片化,使得幼儿教师和家长无法全面即时了解幼儿学习的发展和需求,无法为幼儿后续的学习提供有效的支持。幼儿教师也无法根据评价结果有效改进教学,导致评价的导向功能和促进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另外,现有的幼儿学习评价仅限于幼儿园内的评价反馈,未能进一步拓展教育评价的鉴

定和调控功能,在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教育质量的客观鉴定上未能起到相应作用。

(二)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范式革新

传统的幼儿学习评价受限于以观察评价为主的片面性、以经验判断为主的主观性、评价过程碎片化的局限性,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重构幼儿学习的评价,呈现出4个方面的优势:

1.评价主体的认知理解:从经验判断到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可以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幼儿的学习表现数据,通过分析、处理幼儿在园的生活和教育活动,为幼儿教师、家长提供关于幼儿如何学习的详细报告。人工智能还可以提供幼儿学习全过程的场景数据,支持幼儿教师、家长理解幼儿学习表现背后的原因及其个性特征^[4]。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幼儿学习评价,可通过算法分析和大数据,提供多维的可视化评价反馈,从而打破传统文字评价的平面化反馈,能够有效促进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的理解达成一致。

2.学习过程的多维再现:从碎片化观察到多模态建模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过程伴随式数据采集、多模态数据诊断分析、实时反馈与调控^[4],能够支持通过收集、整理、分析幼儿的文本材料、教师 and 家长的反馈、幼儿的日常生活和学习视频来评价幼儿持续的动态学习过程。打破传统依靠教师为主体的碎片化观察,通过建构多模态的数据分析模型,再现幼儿持续的、个性化的学习过程。

3.评价反馈的重构:从普适性到个性化

人工智能技术拥有强大的文字识别、图像识别、场景识别、声音识别等功能,可通过识别功能来判断幼儿的学习特点^[4]。人工智能技术支持的全过程伴随式数据采集、多模态数据诊断分析,能够通过大数据的采集,通过标准化的分析模型,对幼儿的学习进行即时的、个性化的评价反馈,从而突破传统的幼儿评价的

普适性反馈。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的幼儿学习评价,通过实时监测与反馈,能够动态调整评价标准和内容,以适应幼儿不断发展变化的学习状态。

4.教育公平的重塑:从技术壁垒到资源共享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更广泛地传播和共享。偏远地区或资源匮乏的幼儿园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和评价工具。标准化的评价体系能够让教师迅速掌握评价工具的使用,技术的应用能够即时反馈幼儿的学习,帮助偏远地区或资源匮乏地区的教师和家长共享资源,更好地支持幼儿的学习。这将有助于缩小学前教育的资源差距,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使每个幼儿都能获得公平的学习和发展机会。

三、深层生态学视域下的幼儿学习评价实施路径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是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aess)创立的生态哲学,他以“关系实在论”(Relational Ontology)为核心,其主张的“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概念颠覆传统主客二元对立认知范式。新时代教育评价的实施路径提出要从体系建构、方法创新和工具研制3个方面入手,基于深层生态理论的三重哲学命题——整体主义(Holism)、生态智慧(Ecosophy)与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c Egalitarianism),本研究构建出“生态系统—生态智慧—生态位”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分别对应整体主义的体系建构、生态智慧的方法创新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的工具研制,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智能评价技术架构。

(一)整体主义导向的体系建构:从机械割裂到关系协同

深层生态学强调实体之间的关系,既包括了内部的关系,也包括了外部的关系^{[5]54}。这一本体论立场要求评价体系突破传统的线性协作模式,转向多中心协作网络。幼儿学习评价的外部关系涉及高校、政府、学校(幼儿园)、企业(UGSE)的资源整合和协同发展的

工作机制。幼儿学习评价的内部关系由企业技术人员与幼儿、教师、家长等构成一个整体的协同评价共同体。基于整体主义构建的幼儿学习评价协同机制具有以下特征:

1.外部协同评价机制的生态位互补

“UGSE”(University-Government-School-Entertainment)是指高校、政府、学校(幼儿园)、企业通过资源整合协同发展的工作机制。人工智能赋能的幼儿学习评价通过建立“UGSE”协同评价机制,推进评价体系的重建。在这个协同工作机制中,高校承担“生产者”角色(评价标准研发),政府作为“分解者”(政策能量转化),幼儿园履行“消费者”功能(评价实践),企业则构成“共生体”(技术平台供给),呈现出生态位的互补性,如图4所示。高校的专业研究与企业的技术平台产学研结合,幼儿园的评价实践与反馈,通过政府的政策能量转化,构建有效的评价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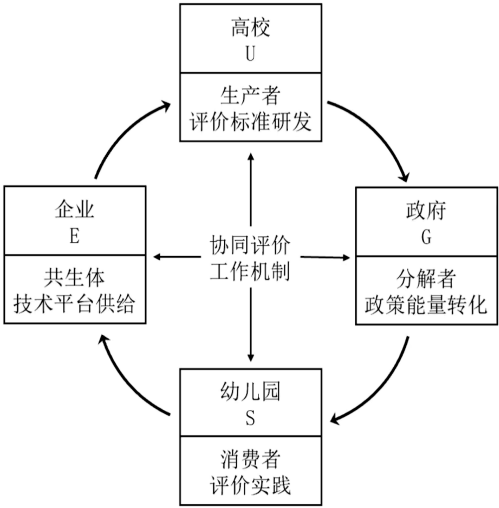


图4 协同评价工作机制

2.内部协同评价共同体的能量流动优化

企业技术人员、幼儿教师、家长、幼儿共同构成协同评价共同体。幼儿教师通过观察、记录和反馈,了解幼儿的学习过程,为人工智能平台提供数据资源。家长在家庭中观察幼儿的行为和兴趣,与教师交流反馈,并通过技术平台提供数据资源,共同促进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技术平台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分析,实现跨主体数据确权,能够有效提高评价反馈的应用

性,指导幼儿教师和家长即时调整和制定支持幼儿学习的教育计划和评价标准。政府也将根据评价反馈报告,积极进行政策响应,协同评价共同体之间实现能量流动的动态优化,详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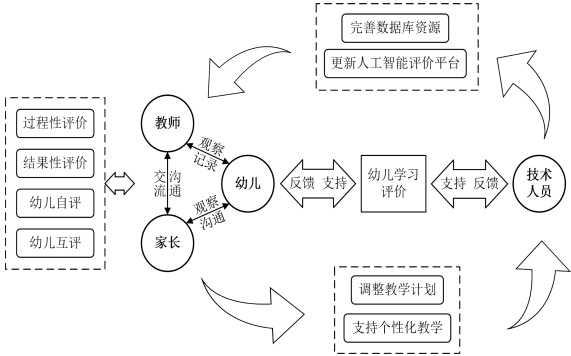


图5 内部协同评价共同体

深层生态学提出“万物内在皆联系”,指出了在每个决策中把原则上有关联的每一件事物都联系起来的必要性^{[5]107}。在外部的协同评价机制和内部的协同评价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幼儿学习评价的反馈支持分析模型的即时更新,确保个体之间的学习差异保持动态的平衡。

(二)生态智慧驱动的方法创新:从个体涌现到系统共生

纳斯提出的“生态智慧”(Ecosophy T)强调“生命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创造性适应”,深层生态学在系统阐释生态智慧中,其终极规范“自我实现”更强调“大我实现”,该词包括个人和共同体的自我实现,但也被认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现实”的拓展^{[5]125}。本研究将这一哲学命题转化为“大我实现”(Cosmic Self-realization)的技术实践框架,一是幼儿学习的生态位涌现,二是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共生进化。

1.幼儿学习的生态位涌现:从数据捕捉到潜能释放

幼儿园通过在具体教育情境中捕捉幼儿学习的数据,提交给企业的技术平台。高校通过建构幼儿学习分析模型,提供幼儿学习评价标准体系。企业的人工智能技术平台通过算法和数据分析,识别幼儿学习的特点,了解幼

儿的学习过程。平台通过幼儿学习资源库、在线学习平台,创设线上学习环境,构建幼儿学习的可能性空间,激发幼儿的学习潜能。政府根据区域的幼儿学习评价反馈,动态调整教育政策和教育资源,构建幼儿学习均衡发展支持体系,从而形成幼儿学习“生态位—技术”协同模型,详见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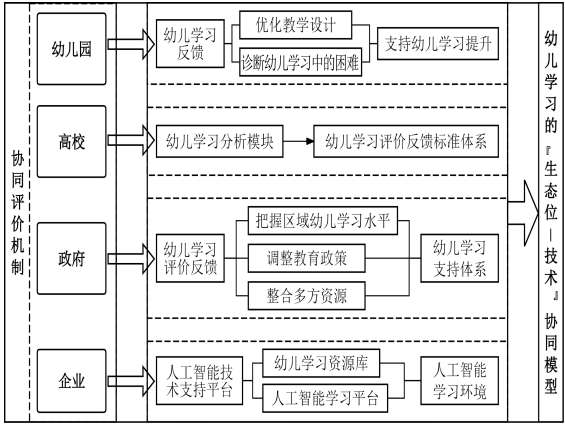


图6 幼儿学习：“生态位—技术”协同模型

2. 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共生进化：从技术赋能到生态融合

幼儿园、企业、高校、政府建立的协同评价机制,将全方位、立体化地建构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共生进化模式。高校从专业领域建构幼儿教师评价能力认知体系,协同评价机制通过“教学研训一体化”模式支持幼儿教师提升评价能力。企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平台的建立,为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平台需要建构幼儿评价资源库、人工智能评价分析系统、在线教研系统。通过“教学研训一体化”的专业发展模式,促使幼儿教师建立评价意识、内化评价知识、迁移评价能力、形成评价智慧。在这个共生进化的过程中,实现幼儿教师评价能力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整合,详见图7。

深层生态学中自我实现的思维过程是“为了一切生物的大我实现”,系统推导出“多样性”“复杂性”,因此,我们就“必须认识整个自然及其所有部分”^{[5]17}。通过对幼儿学习的潜能释放和幼儿教师评价能力的生态融合,通过局部优化最终达到全局涌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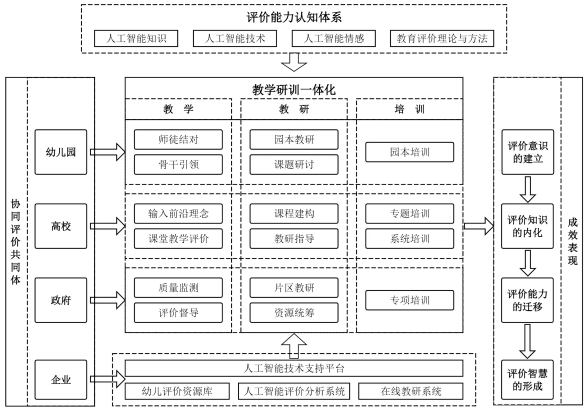


图7 幼儿教师评价能力共生进化模式

（三）生态中心主义的工具研制：从人类中心到算法正义

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以“生命平等”为基础,同时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认为技术发展是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它与一整套因素之间都发生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技术遵从规范系统中的评价^{[5]141}。这一论断解构了传统技术工具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在工具的研制中,我们既要考虑技术的规范性,同时兼顾其他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构建具有生态效度的智能评价系统。

1. 独特性识别的分析模式

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主张尊重每个生命形式的独特性和价值。《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中,幼儿学习被定义为“幼儿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周围环境互动的过程,是幼儿主动地探索周围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物质世界的过程”。评价幼儿的学习时要“重视幼儿的学习品质。幼儿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良好行为倾向是终身学习与发展所必需的宝贵品质”^[6]。跳出学习内容本身关注学习品质,是评价幼儿是否具有终身学习和发展潜能的重要指标。霍力岩、谷虹等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建构了学前儿童学习品质指标体系,涵盖“学习动机”与“学习行为”2项基本维度,包括“好奇心”“产生兴趣”“主动体验”“深度探究”“分享合作”“联想创意”6项核心要素及其18项细化指标与内涵描述^[7],本研究将该指标体系作为数据分析的模块分类,详见表3。

表3 学前儿童学习品质指标系统的理论构想

维度(2个)	要素(6个)	指标(18个)	指标的内涵描述(18个)
学习动机	好奇心	兴致	幼儿对新奇事物敏感,做出兴奋、惊喜的表情且伴有一定的语言与动作
		好问	幼儿喜欢刨根问底,并大胆猜测问题的答案
		渴望学习	幼儿对周围事物持续充满好奇,迫切想要进一步探索与认识周围事物
	产生兴趣	尝试操作	幼儿愿意趋近新事物与未知事物,尝试通过触摸、摆弄等动作进行初步感知
		自主计划	幼儿在成人引导下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制订计划,并按照计划采取相应的行动
	主动体验	独立决策	幼儿根据自己的活动计划做出决策,并按照自我意志展开探索
学习行为	深度探究	感知体验	幼儿积极调动多重感官,通过观察、操作等方式感知事物的属性
		有序操作	幼儿探索材料的用途与玩法,并能在引导下按照步骤有序地对材料展开操作
		保持专注	幼儿在探究中表现出凝视、倾听等专注行为,并能排除干扰、集中注意力投入当前活动中
	坚持完成挑战	解决问题	幼儿尝试使用多种问题解决策略,即使是在面对困难、问题时,也能保持乐观
		坚持完成挑战	幼儿相信自己能够胜任有一定挑战性的活动任务,并敢于亲身体验,不轻易放弃探究,直至完成活动任务
		观察同伴	幼儿认真倾听、观看与感知同伴的语言与动作,并尝试理解与内化他人的探究成果
学习品质	分享合作	交流讨论	幼儿愿意主动与同伴交流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清楚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想法并尝试接受同伴不同的感受
		寻求帮助	幼儿遇到自己无法独立解决的问题时会主动寻求同伴的帮助,支持自己克服困难,完成活动
		团体协作	幼儿愿意主动邀请同伴或加入同伴组成团队,并通过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联想创意	联系经验	幼儿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进行回忆和复述,并将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联系起来
		重组再造	幼儿把对人员、事物、材料等的当下经验与以往经验整合在一起,获得新认识或探索新玩法
		创意表征	幼儿用假装游戏和戏剧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创意、发明和想象

2.革新性评价的双环演化

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人工智能赋能的幼

儿学习评价通过“分析—反馈—支持”的外部反馈环和幼儿、教师、人工智能形成的“分

析—反馈—优化”内部反馈环助力幼儿学习,实现对当前幼儿学习评价从线性反馈到涌现迭代。通过构建“双环演化”的评价构架,实现技术路线的生态化革新;外部反馈环主要进行支持幼儿学习生态的系统调节,内部反馈环主要支持幼儿个体学习的适应性发展,详见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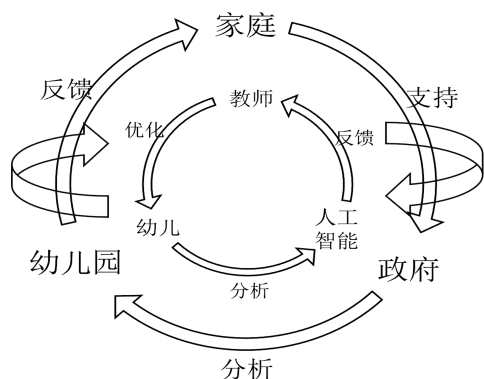


图8 “双环演化”的评价路径图

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幼儿学习分析建模,精准识别幼儿的个体差异,定制个性化的学习评价方案;即时反馈评价,持续跟踪幼儿的学习过程,实现对幼儿学习的动态评价;丰富的数据采集和多维度的综合评价能够全面评价幼儿的学习表现;人工智能助力的幼儿学习评价能辅助幼儿教师调整教学策略,给教学工作带来便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计算机或移动设备提供的便捷、高效的评价手段,能够实时记录和分析幼儿的学习数据。

人工智能赋能的幼儿学习评价,以幼儿学习为核心,依托内环与外环的双环反馈,革新原评价受制于评价主体、评价标准等多方制约因素,实现幼儿学习评价的个性化、过程性、智能性的反馈。

3. 共生性反馈的算法正义

深层生态学提出,评价一种技术的生态智慧基础是看它是否满足了各式各样地方共同体的需要^{[5]150}。为实现纳斯倡导的“技术谦卑”(Technological Humility),人工智能赋能的幼儿学习评价需要在系统中嵌入多重保护机制,尽可能地降低算法的误差,确保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将幼儿园机构、家庭背景等环境因素作为生态指数嵌入系统中,用以识别环境因素带来的预警信息。在评价体系更新的过程中,要采用基于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更新机

制,确保作为评价主体的幼儿教师、家长有充分的意见表达权。在技术应用的推广过程中,逐步通过资源的共享与共联,促进学前教育公平。

四、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伦理与技术张力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为幼儿学习评价带来范式革新,但其技术不成熟性引发的三重挑战亟待破解。这些挑战本质上反映了技术理性与教育伦理的深层张力。

(一)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脆弱性

人工智能对幼儿学习评价的助力,需要大量的幼儿数据进行预训练或人工强化反馈。由于幼儿数据的敏感性,会诱发人们对数据隐私和安全的担忧。Golda A 等人提出可以添加噪声以保护隐私,但这可能会影响生成数据的质量^[8]。Martin K D 等人探讨了 AI 技术与数据隐私的交集,提供了一个涵盖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 AI 技术的连续体^[9]。Feretzakis G 等人概述了隐私保护技术的关键特点,包括差分隐私、联邦学习、同态加密、安全多方计算、对抗性防御机制、合成数据生成和隐私增强技术^[10]。破解之道在于构建“法律—技术—伦理”协同防护体系。法律层面需建立幼儿数据特殊保护条款,技术层面要开发数据加密的计算架构,伦理层面要实施数据生命周期审计制度。

(二) 算法公平性的理论—实践鸿沟

国内外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依靠算法建立模型,其技术输出的评价结果可能存在偏见或错误,比如存在“幻觉”或编造的问题,生成看似连贯但没有依据的答案,产生诸如多模态数据、大型多模态模型(LMMs)和大型语言模型(LLMs)中公平性和偏见的概念等问题^[11]。现有的算法难以规避影响群体公平的区域文化资本差异,对幼儿个体难以量化其发展潜能的异质性,有可能陷入对个体发展“设限”的成长规划。因此,需要开发基于反事实数据增强(CDA)的公平性校正算法,同时,建立跨文化校正路径。

(三) 数据可解释性的认知壁垒

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的幼儿学习评价,数据

分析模型最终能否应对复杂的幼儿学习行为和学习场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可解释性成为教育人工智能的重要问题,人类分析与决策依赖自身背景知识,如何跨越人类可理解的语义空间与数据特征空间的鸿沟至关重要^[12]。幼儿学习评价需要构建双通道解释模型:一是基于技术通道的技术开发,将数据特征空间转化为可理解的教育语义空间;二是基于情境认知理论的教育通道的开发,通过数字化评估工具的可视化、图文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增强评价主体对评价反馈的理解,并不断缩小人机之间的理解鸿沟。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深层生态学的理论透镜,揭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幼儿学习评价的范式转换机制:从机械主义的数据驱动转向生态主义的价值共生。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传统教育评价的认知框架,基于阿恩·纳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理论,提出了“生态系统—生态智慧—生态位”三位一体的实施路径,分别对应整体主义的体系建构、生态智慧的方法创新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的工具研制,其创新性在于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智能评价技术架构。

然而,技术—教育融合仍面临三重张力: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脆弱性,算法公平性的理论—实践鸿沟,教育可解释性的认知壁垒。未来研究需着力构建“法律—技术—伦理”协同防护体系,重点突破公平性校正算法和跨文化校正路径的建立,同时,构建双通道解释模型,缩小理解鸿沟。

在全球教育数字化转型浪潮中,教育评价的国际化趋势不仅体现在评估体系的扩展和多样化,更强调对教育标准和测量技术的国际化接轨。本研究提出的生态化智能幼儿学习评价框架将开启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的新路径,有效解决目前学前教育领域在评价方面的短板,为各级政府部门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习近平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

话[EB/OL]. (2023-05-29)[2025-03-2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83632.ht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EB/OL]. (2020-10-13)[2025-03-
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20/content_5554488.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54488.htm).

[3] Maya Bialik. 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学生应该
学什么?[EB/OL]. (2024-12-29)[2025-
03-03]. [https://mp.weixin.qq.com/s/
ZZ9xTGzg9xUcZEVKxcZPJA](https://mp.weixin.qq.com/s/ZZ9xTGzg9xUcZEVKxcZPJA).

[4] 白雪梅, 郭日发. 生成式人工智能何以赋能
学习、能力与评价?[J]. 现代教育技术,
2024(1): 55-63.

[5] 阿恩·纳斯. 生态、社区与生活方式:生态智
慧纲要[M]. 曹荣湘, 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2021.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3-
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通知[EB/
OL]. (2012-10-09)[2025-03-03]. [http://
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210/
t20121009_143254.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210/t20121009_143254.html).

[7] 霍力岩, 谷虹, 黄双, 等. 学前儿童学习品
质指标系统的理论构想[J]. 中国教育学刊,
2024(11): 35-40.

[8] GOLDA A, MEKONEN K, PANDEY A, et al.
Privacy and security concerns in generative AI:
A comprehensive survey [J]. IEEE Access,
2024, 12: 48126-48144.

[9] MARTIN K D, ZIMMERMANN J.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data privacy
[J].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024,
58: 101829.

[10] FERETZAKIS G, PAPASPYRIDIS K,
GKOULALAS-DIVANIS A, et al. Privacy-pre-
serving techniques in generative AI and large
language models: A narrative review[J]. Infor-
mation, 2024(11): 697.

[11] 卢国庆, 杨沁, 贺相春.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
能高等教育形成性评价的价值、挑战及路径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11): 84-91.

[12] 祁彬斌, 包昊罡, 郑娅峰, 等. 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智联学习环境:内涵、框架与实施路径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10): 72-78.

(责任编辑 师 语)

“从无地方到地方”:地方教育学视域下 幼儿园园本课程的重构进路*

滕 艳 张 莉

(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摘 要]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教育领域的今天,幼儿园园本课程面临同质化危机与地方性消解的双重困境。基于“地方教育学”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当前幼儿园园本课程构建存在的迷思,阐释构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理论基础,提出幼儿园园本课程重构进路:“地方感”应为幼儿园园本课程理念与目标定位之根,幼儿园园本课程资源应在地化多维勾连,以“附近”为锚点统整幼儿园园本课程内容,幼儿园园本课程实施路向应为儿童在地方时空中的实践行动。

[关键词] 地方教育学; 地方; 园本课程重构

[中图分类号] G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70-10

儿童自出生就与身边的人、事、物发生密切的互动并在潜移默化中深受其影响。“教师和孩子必须经常花时间与熟悉的、日常的地方建立长期的关系。”^[1]《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也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素质教育。”^[2]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构建与实施过程需要密切结合本园的实际情况,凸显园本课程的地方特色。以“地方”为根系统构思园本课程,使儿童的学习与当下的真实生活产生密切的勾连,一方面,可生发出儿童真正的意义学习,助力其实现全面的成长与发展;另一方面,在“地方”的滋养之下,儿童能形成强烈的地方认同感,成长为一个具有厚重文化根基的生命个体。

一、地方教育学视域下幼儿园园本课程构建迷思

幼儿园在园本课程与“地方”融合的进程中往往局限于对地方资源的表面化运用,缺少与地方意义的深度勾连,导致园本课程建设的“无地方”现象存在。当前“地方教育有三个重要的危机——第一个就是地方意涵被窄化了,第二个则是地方经验过于缺乏,第三个则是缺乏地方感使得地方教育不容易落实”^[3]。

(一)“无地方性的地方”:幼儿园“园本”课程理念与目标脱域地方性

课程理念与目标是决定幼儿园课程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人的指针,课程理念与目标脱域会导致园本课程与儿童、地方之间无法联结,失去儿童在地化成长的本然逻辑。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 年度一般项目“幼儿园‘物’的教育研究”(项目编号:GD24CJY14)。

[收稿日期] 2025-05-26

[作者简介] 滕 艳,女,安徽宿州人,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

张 莉,女,江西赣州人,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部分城市幼儿园在现实操作中出现课程理念同质化现象,因其较多移植来自观摩的示范园或其他幼儿园的理念,追求所谓的“国际化”和“现代化”。不少幼儿园在参观了“蒙氏园”之后,争先恐后开设“蒙氏”班,引入蒙氏课程,大量购买“蒙氏教具”,如感官教具、串珠等,并将其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没能真正理解、消化、把握蒙特梭利教育理念的精髓,也并未结合本园儿童的实际情况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进行本土化,只简单地模仿其活动形式,使得儿童在这种课程中往往只是机械操作教具,被动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而缺乏对其真正的理解,无法深入体验自己所在地方的文化。

受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当前,乡村幼儿园竞相模仿城市幼儿园的办园理念、活动设计,逐渐丧失了乡村幼教的独特性与根本,这严重影响着乡村幼儿园课程的生成”^[4],“诸多乡村幼儿园简单照搬外来课程模式,通过引入城市话语体系中盛行的教育指导用书、教育教学体系来复刻想象中的标准,忽略了基于乡土的在地情境”^[5]。城市幼儿园中流行的科学实验、艺术创作等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宽儿童的视野,但在乡村地区,由于资源的限制和儿童生活经验的差异,这些活动往往难以有效实施。乡村儿童更为熟悉的是田间地头的自然景象、乡土民风民俗和传统节庆活动等,这些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和情感依托。幼儿园这种“拿来主义”的方式看似高效,实则忽视了自身所处地方的独特环境资源与儿童丰富的生活经验,使得幼儿园的园本课程与儿童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儿童难以在课程中达成与日常生活的链接和情感共鸣。

(二)“乏真性的地方”:幼儿园园本课程资源利用的离土

“课程资源并不是指一般的社会资源、自然资源,也不是现有课程的内容或运作条件,而仅仅是一种潜在形态,只有通过课程实施者主动地认定、开发、利用和管理,它才能具备课程潜能,进而转化为课程或课程实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6]课程资源非外在于儿童的环境或事物,应该与儿童产生互动,才能具备课程潜能,进而转化为课程资源。部分幼儿园虽然善于挖掘地方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尤其是名人古迹、传统节日等,但是在这一历史文化资源挖掘的过程中,更多呈现出一种“博物馆化”^[7]¹⁵⁶的地方样态,强调表面的历史感和文化符号,而忽视了真实的生活和社会互动,缺乏与儿童生活经验的勾连。对地方的历史属性挖掘不能仅仅流于表面,需要进一步引领儿童感知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脉络,在深刻理解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形成身份归属、文化认同。此外,课程资源没有考虑到当前因城市化、现代化诱发的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便与某些地方产生了紧密的联系,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出生与生长的地方,可能是我们当前生活与居住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的祖辈生活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我们有着特殊经历的地方,这些地方给予个体的是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需要有机渗透进课程资源的规划中,因为“地域文化资源是构建文化在地课程体系的基础,不同的区域、地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只不过这种文化差异有的明显、有的隐晦”^[8]。

“地方即有意义的区位(meaningful location)”^[9]¹,地方的意义不仅仅是物理的功能性,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地方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待在一个地方很多年可能只给我们留下少许能够或者愿意回忆的记忆痕迹,但短暂停留所获得的强烈感受却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这是一个需要牢记的事实。”^[10]¹⁵³园本课程资源的选取应当立足儿童的生活,以儿童实际所处的地方为原点,依托儿童的切身经验,引发儿童真正参与真实的学习。

(三)“静态的物质实体”:幼儿园园本课程环境与课程内容的时空退场

许多幼儿园构建课程时将环境视为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重视环境布局、陈列、装饰,也热衷展现一些文化符号,但教育者关注的大多是物质实体层面的空间,而非儿童生活体验的精神空间和意义空间。环境创设与幼

儿园课程内容联动出现了为打造“特色”而存在的环境和课程内容。例如,地理位置离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内陆幼儿园将自己定位为海洋幼儿园,围绕海洋选择如何保护海洋、为海洋大扫除等学习主题,开展海洋文化节。幼儿园也由此变成“海洋式”环境,墙面变成蓝色,墙面画上海浪和各种海洋生物,其他空间摆放着买来的贝壳、海星等与海洋有关的物品。显然,课程内容剥离儿童的真实生活经验,环境以成人的认知逻辑创设,环境中的“物”与儿童并无联系而沦为“静态的展品”。海洋自然是儿童感兴趣的话题,但“兴趣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能激发起积极的情感动力,还在于将主体鼓动起来从事某种行为的活动,并达到一定目的”^[11]。由于身处内陆,儿童无法经常去看海、听海、观察海边的生物、在海边游戏,很难将与海洋有关的人、事、物转化成内源的学习动机,进而主动展开行动和思考。教育者远离儿童生活经验选择课程内容、创设环境,折射出其持有的假设:知识是外在于个体且静态的客观实在,环境是悬浮于“人”的物质空间。因此,环境是信息传递者,“学什么”是由“特色”而定,而非倾听儿童的现有需求。然而,环境应理解为教育者与儿童共生的教育生活空间,是居于其中的“我们”体悟教育意蕴的一种路径。而儿童居于其所在的“地方”经验,是连接课程内容与儿童的桥梁。

(四)“主体无场”:幼儿园园本课程实施中儿童经验的疏离

古德莱德提出了课程实施的五个层级,即理想课程、正式课程、理解课程、运作课程和经验课程。其中,经验课程指向的是学生在学校中实际经历和体验的课程,核心是学生的个体体验。幼儿园课程的具体实施应以儿童的生活经验为原点和起点,与儿童的生活世界发生真实的互动交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呈现出与生活经验疏离的状态。例如,科学室内配备的放大镜等观察工具,虽承载着探索功能,却因使用场景的局限(通常需要户外环境),幼儿无法运用这些工具去探究与思考。

“一般而言,对于每一个尚处于幼年的新

人而言,滋养其成长的地方是作为生命个体的原初行动域而存在的,如离家不远的小河或者山坳,抑或是小区里的花坛、有着不同种类植物、花卉的公园等,个体在不同场景中的感受集合不仅仅是一段儿时美好的回忆,更是一种意义联结。”^[12]园本课程的实施需要关注儿童所处地域的现实条件,让儿童可以在与课程的真切互动中实现对地方的体验、感受和理解。

二、地方与地方感:地方教育学理论的核心阐释

人类学家格尔茨从文化阐释学路径提出“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意指教育中地方的重要意义。随后,地方本位教育、地方教育学等逐渐进入教育研究领域,成为重点关注话题。史密斯指出地方本位教育旨在“将学习根基于在地现象与学生的生活经验”^[13]。“地方教育学可视为一个具积极模糊性(positive ambiguity)而以‘地方’概念为核心的多重领域交会之学术范畴。”^[14]鉴于此,地方性、情境性、实践性、文化性成为地方教育学的主要特征。而“地方”和“地方感”是地方教育学的两个关键概念,主张教育根植于在地文化生态、历史文脉、社会结构及自然地理系统之中,通过教育目标定位、课程内容选择及教学方法设计,实现与地方发展需求的适配耦合,彰显地方特色,以促进教育的内生性增长与地方基因的觉醒传承。

(一)地方概念的阐释

“地方”的概念最早由学者怀特(Wright J K)提出,他认为“地方是承载主观性的区域”。地方的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延伸和扩展,地方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更加关注人的经验与地方的互动,关注人与周围环境的勾连。正如段义孚所言,当对一个空间赋予了意义,这个空间就成了地方。阿格纽指出“地方”概念涵盖三个侧面,即场所(locale)、位置(location)和地方感(sense of place),其中的“地方感”指的是“生活在某地之后产生的主观感受”^{[15]5-6}。“地方”成为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超越了单纯的地理坐标或物理空间范畴,不仅是一种自然和文化要素的融合体,更

是个体记忆、情感归属以及社会认同的基石。

1. 地方具有意向性

地方作为一种特殊的物体、作为一种价值聚集的载体,寄托着人们的记忆、思想和情感。“我们对于地方的爱或是对大自然的爱恋,引发我们有做白日梦的想象,而不是只缱绻在地图中。”^[16]同一物理环境因不同主体的记忆、想象与价值取向而呈现差异化意义,因此,地方并非单纯的物理容器,而是承载着意识活动与存在意义的动态结构。“地方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不自觉的意向性,不自觉的意向性将地方界定为人类存在的重要核心。”^[7]⁷⁰格林伍德(Greenwood, 2010)认为“地方”正是一个既可容纳特殊性、又可分享群体性的概念,因为我们可从不同层面去探讨、理解与掌握“地方”,从知觉层面去掌握“地方”对个人的独特意义,并探讨“地方”所涵摄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生态面向,在各种关系网络中与其他个体和群体发生联系,因此,“地方”是一个可连接多样性与社群的关键^[17]¹³⁷⁻¹⁵⁴。“地方是通过对一系列因素的感知而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因素包括环境设施、自然景色、风俗礼仪、日常习惯,对家庭的关注以及对其他地方的了解。”^[18]

2. 地方是一种关系结构

“古斯塔夫森(Gustafson, 2001)分析多位学者(Agnew, 1987; Canter, 1997; Relph, 1976; Tuan, 1977)的观点,指出地方的意义是在自我、环境、他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自我、环境、他人、自我与他人、他人与环境、环境与自我、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之间,显示出地方的意义涵摄个体与群体心理、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等层面的生活经验。”^[19]地方的含义超出了地方客观物体本身,代表了一种关系的建立和意义的生成,共同构成了地方的意义框架。当个体与自身所处的地方产生互动关联时,当然这种关联不再局限于物理层面的渗透,更涉及记忆、情感、价值等更深层次的心理层面,进而形成更深层次的意义关系,构建出一个充满生命力和动态变化的关系网络。在国内,学者提出地方是“社会—个体—地方”

复杂多重互动关系的一部分^[20],“是由地方内部和地方外部的多元主体建构而成”^[21]^[22]。这一观点是以“关系型”(relational)视角或思维来思考或认识地方^[23]^[24],即地方被认为是“关系型地方”^[23],强调其所承载的复杂多重的关系结构和意义生成过程。可见,地方并非静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是多方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地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3. 地方中的时空是相互作用的

地方,作为一个有着特定地理位置和明确边界的区域,在时空的交互作用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客观物质实体,而且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历史内涵。在此,地方成为一个融合了时间、空间、方位维度的复杂概念,时空相互作用共同酝酿,形成了地方的独特魅力,凸显了“此地”与“彼地”的不同。时间见证和记录了地方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朝向未来的变迁轨迹,还深刻地塑造着地方的文化脉络和社会结构。当我们想要了解一个地方也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没有时间的沉淀对地方的感受和理解是表面和肤浅的。“空间是无形且不能接触的,它不像实体那样可以被直接描述与分析。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认识并理解空间。同时,我们总是具有关于地方的知觉与概念。总的来讲,空间为地方提供了一个背景,又从特定的地方那里获得了自身的意义。”^[7]¹²当然,时空在地方中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时间维度的变迁与空间形态的演变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关系。“‘地方’成为人们自我的一部分,当人们的自我在时空中不断更新改进、不断与地方互动之时,也会将地方环境的各种因素融入自我。”^[25]在幼儿教育场域中,时空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儿童对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过程中。儿童通过历时性的空间实践与共时性的空间体验,逐步形成对地方的认知。这种认知不仅包含对地方物质特征的感知,更涵盖了对其文化意义系统的理解,以及对地方历史脉络的把握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在这一认知建构过程中,时间维度赋予了空间以历史深度,空间维度则为时间提供了

具体的物质载体,二者共同构成了儿童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基础框架。

4.地方是主客体互构而生成的

“当行动者在社会系统中互动的时候,能再生产规则和资源(通过方式),或者能够进行转化。这样,社会互动和社会结构就交互地嵌套。因此,结构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中规则和资源被用来形容互动,在互动中使这些规则和资源得到了再生产或者转化。”^{[26]454}可以说,主客体互构强调打破主体和客体之间二元对立的状态,主张构建相互联系、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需要突破将地方视为静态、客观容器的传统认知,转而强调地方是主体与客体持续互动、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它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生成式的存在。地方并非预先给定的物理空间,它通过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被不断建构,成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幼儿园的各个区域不是单纯的存在,而是教师立足本园实际情况、基于儿童兴趣与教育目标等,通过主体(教师)对客体(地理环境)的逐步建构(区域规划、图纸设计、材料投放等),使地方成为承载教育意义的“第三空间”。而且,地方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空间,它作为主客体互构的产物,承载着主体的情感记忆与文化认同。

(二)地方感的概念阐释

“在不自觉的经验里,本真的地方感类似于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958)所说的‘我’—‘汝(Thou)’关系。”^{[7]106}它强调个体与地方之间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的关系,只有当个体与地方之间发生真实的、深刻的互动,产生一定的意义之后,这个地方才具有了特殊的感情——地方感。最早明确“地方感”概念的便是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他认为“地方是具有意义的有序世界,它意味着人们可以产生安全、熟悉、舒适、亲切、依恋的主观感受。”^{[10]148}其地方感内含双层含义:一指地方自身本有的特性,二指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对于个体而言,当一处地方让个体产生深厚感动——归属感、安全感、依附感、参与交融、或情

感——这个地方对个体而言就具有‘地方感’(sense of place)。”^[27]地方感源于个体对空间的主观解读,同一物理空间因不同主体的生命史而产生完全不同的意义。“斯蒂尔(F. Steele)与杰克逊(J.B.Jackson)进一步指出地方感是一种归属感,是基于时间感一起构建起来的。”^{[28]83,[29]57}因此,地方感是个体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的满足与认同,是经过文化浸润和社会洗礼后的一种人地关系状态;是个体在与地方、社会、文化的不断互动中建构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不能脱离人与地方孤立存在。学者们对地方感的理解从关注环境的客观存在到主观感受的具身体验进而关注身份认同的情感链接,呈现出人地关系研究的复杂化、多维化、动态化。

“身体处于社会世界之中,而社会世界又处于身体之中。”^{[30]71}身体作为感知地方的媒介,个体通过身体运动感知空间存在,通过触觉、嗅觉、听觉等感官记忆锚定场所特征。这种具身性体验使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生命叙事的“存在之地”。儿童在与园所环境、社区环境等的互动中感受着地方的客观存在,在无意识中建构对地方的身体图式,这正是地方感生成的生理基础,其本质是个体将情感、记忆、期待等意向性活动投射于地方的过程。当园本课程根植于儿童的身体与情感体验时,抽象的地理概念将转化为可触摸的扎根教育。

三、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地方教育学理解

地方教育学以教育情境为核心,教育实践需基于具体场域中的环境要素(含自然地理场域、社区资源网络、文化传统积淀)为动态参照系,构建具有生成性特征的育人场景,教育者需依据场域特征进行策略性调适,以达成教育过程与在地环境的共生互构。倡导“做中学”,强调教育实践与地方生活深度融合;通过系统挖掘地方知识体系中内蕴的语言符号、民俗传统、价值信仰等,构建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机制。总的来说,地方教育学主要强调学生实际生活经验的获取与真实互动及其所处地方的自然、生态、文化等资源与教育的融入和利用,在此过程中形成切实的、密不

可分的实际关系,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教育整体。

(一)儿童居于其中的所在:幼儿园园本课程场域中的地方本体

“人与地方的本质关系在于栖居(dwelling),也通过该关系进入了空间里……该关系是人存在的本质属性。”^{[7]45}“栖居”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方式,人在特定的环境中依托“亲切经验”筑起“家”的港湾,初步构建起人与地方的亲密关系。原本只是客观存在的地方,因为个体的主观性活动而焕发出生活的气息,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这些地点不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空间,而且承载了一定的情感与记忆,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之地。

幼儿园作为儿童生命成长的微观生态系统,其本体论价值并非源自建筑实体本身的空间属性,而是根植于园所与在地环境的本体性关联之中,依托身体感知、情感投射与文化认同,将物理空间转化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地方”。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本质功能在于将地方意义转化为儿童的经验,使儿童在触摸土地纹理、聆听方言叙事、参与社区节庆的过程中,形成对“我来自何处”的存在论应答。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场域建构应当突破将教育机构视为封闭容器的工具理性,强调指向场所精神与存在体验的深层关联,确立“地域本体—教育场域”的互构逻辑,唯有将园本课程锚定于区域地方性,才能避免城市化进程中“无地方性(Placelessness)”对童年经验的侵蚀,真正守护儿童作为“地方之子”的文化身份与存在根基。

(二)“地方人”: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儿童观

“地方、人物、时间与事件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人想要成为某种人,就需要一个地点,并在特定的时间做出特定的事情。”^{[7]71}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或多或少受他所处地方的影响,深深烙上他所处地方的痕迹。这种影响从空间归属的物理维度,经过文化认同的符号编码,最终沉淀为社会网络的情感记忆。地方之于个体,绝非单纯的物理空间的客观存

在,而是承载着集体记忆库、情感联结网、文化基因链的多维意义场。

个体不仅是地理空间的居住者,更是地方社会结构的构建者、地方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他们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形成了对地方的深厚情感和强烈认同,为地方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当儿童感知方言表达、体会传统歌谣节奏韵律、参与传统习俗活动、欣赏传统建筑时,其身体经验与地方基因共同形成认知上的同频共振,逐步建构起“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深层认同,最终通过身体实践将物理空间的“地方”转化为具有存在论意义的“地方”。园本课程的深层使命在于构建系统化的地方经验图谱,通过沉浸式文化实践,使儿童完成“身体—地方”的双向驯化,在主客互动中确立栖居者身份,在文化浸润中形成地方性知识,最终让教育回归生命原初的栖居状态。

(三)儿童与地方的互嵌:幼儿园园本课程构建的知识观

知识是在个体与其所处环境(主要指个体所处的地方)的实时相互作用和耦合过程中产生的。“然而无论是从知识的生成秩序还是叙事结构来看,地方均不失为一方发现知识创新生长空间、充满创造灵感的土地,推动现代知识的进步不仅不应该悬置‘地方’的多样化存在,反而应该在尊重‘地方’多样性的基础上校验知识、发现新知。”^[12]地方并非被动加工的物理容器,而是通过知觉—行动系统为儿童提供意义生成的“行动可能性”的意义场域,使儿童在与地方的动态交互中实现双向建构。

“地方性为个人与社会群体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并使之成为定位身份认同的基点。”^[31]地方不仅作为认知发展的“物质中介”,更是通过文化符号系统充当情感链接的“精神媒介”。如儿童所处地方的公园,既是自然景观的客观存在,也是承载着代际叙事(祖辈们童年时的嬉戏之地)、社区认同(节日庆典的聚集之处)与生态知识的文化纽带。一方面,地方资源作为认知支

架,通过多模态符号系统(如景观空间布局、植被季节变化、民俗活动)激活儿童的前认知图式;另一方面,儿童基于身体感知、运动经验、社交互动形成的实践智慧,又在重构地方的意义维度。这种双向互动过程证明,知识并非外在于儿童的客观存在,而是儿童在地方场域中通过具身实践主动建构的意义网络。地方场域为儿童认知发展提供符号资源库与实践情境场,儿童则通过身体在场、情感共鸣与文化参与,将外显的地方特征转化为内化的认知图式,从而实现“地方资源反哺儿童发展”与“儿童实践重构地方意义”的协同互动。

(四)具身性关切:以亲近实践为基的在地化学习观

具身性关切强调,唯有通过身体的实际参与和实践,那些表象化的空间才能被转化为人们切身可感的“身体—空间”互动关系,而地方的意义也在互动建构中凸显。“如果我们仅是通过符号去认识一个地方,或仅是通过外部的视角(如游客的眼睛或阅读指南里的呈现)去知道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缺乏真实性的。”^{[32]186}因此,在与地方的互动中,需要多感官的参与性、内外部通道的联动以及身体体验的完整性。

儿童的学习产生于个体与地方的真实互动及其持续性的实践对话。如广州某幼儿园开设“二十四节气”课程,通过测量日影长度感知时间流转,采集幼儿园特色植被观察季节更迭,根据节气播种植物理解节气特点,使抽象的时间概念具象化为可触摸的生活经验。儿童不仅能通过亲身体验和实践操作获取到相关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探索、发现和创造,从而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全面发展。

四、基于地方教育学重构幼儿园园本课程的进路

(一)“地方感”:幼儿园园本课程理念与目标定位之根

就教育而言,丰富生命的意义应当是教育的重要目标(Hung, 2010; Stables, 2005)。雷尔夫将这种意义联结称为“我们在地方的

根”,“扎根于地方意味着拥有一个面向世界的坚固的基点,就是把握一个人在事物秩序中自己所处的位置,就是对特定地方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深深依恋”^[33]。这种精神和心理上的依恋是我们对地方的依恋感、附属感和安全感,归根结底是形成深深的地方感。将地方文化视为儿童认知发展的活性文本,地方环境作为情感培育的立体场域,地方实践作为行为养成的动态课堂,帮助儿童完成“在地化知识建构”与“身份认同形成”的双重使命,构建起“我一地”相融共生的关系。

幼儿园园本课程以地方感培育为核心旨归,通过“认知地图绘制—文化基因解码—情感认同建构—地方归属与依恋”四维目标体系,形成螺旋式互嵌的发展结构,系统构建儿童与地方的深层互动机制。依托“家庭、幼儿园—社区—社会”三级逐层相连的生活土壤,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地方性生长”。从儿童最熟悉的家庭、幼儿园开始,慢慢扩展到整个小区,再到附近的公园和田野。教师可以带着孩子们画地图、讲故事,去实地探索,让他们亲手摸一摸家乡的土地,闻一闻花草的香气,引导儿童完成从微观生活空间到中观社区环境再到宏观社会场域的认知过渡,建立“身体—空间”的知觉联结,形成对家乡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认知图式。将方言韵律、节庆仪式、地域性建筑元素等文化符号转化为教育性资源载体,使其成为可操作的教育符号,引导儿童在角色扮演、积木建构、传统游戏等互动中完成文化符码的解读与重构,发展儿童对文化的认知、理解、传承与创新能力;遵循“场所依恋—空间认同—文化归属”的情感发展梯度,通过参与式实践建立人地情感联结,依托园所区角、社区实践基地等促进儿童形成对家乡的积极情感体验。

(二)在地化生长:幼儿园园本课程资源多维勾连

“教育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种。作为社会行为,它们具有反思性,植根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并嵌入特定的知识和社会环境之中。因此,关于教育的知识必须根据历史情境、地方

背景以及教育互动中不同参与者的理解而变化。显而易见,这种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将基于当地的历史和社会背景。”^{[34]47} 儿童是嵌入家庭、社区、社会环境之中的个体,幼儿园园本课程资源的开发需要以儿童为中心,实现家庭资源、园所资源、社区资源等的多维勾连,助力儿童的在地化生长。

段义孚(2017)认为,家是最稳定的,是最完整、具有最小尺度特征的地方,家对我们而言是最亲切最真实也是最永久的地方。个体由家庭出发向外延伸到其他无限可能的场域,如幼儿园、街道、社区、城市等,并与其产生互动与意义勾连。以“家”为核心,将家庭作为课程资源的起点以夯实园本课程的根基;幼儿园作为家庭资源的延伸,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元化的学习与成长环境,还促进了儿童从家庭自我向社会自我的逐步过渡。幼儿园成为架构家庭与社会的桥梁,它吸纳并融合家庭教育的温暖与亲密、开放与多元,初步构建了一个幼儿既熟悉又充满挑战的成长空间。园本课程需超越单纯感知家庭和幼儿园的经历体验的范畴,伸向社区、城市等更加广阔的空间,主动与周遭世界发生关联,使幼儿能够阐释并完整应对当下正在发生意义的生活场域,唯有如此,园本课程资源才充实而丰盈。

(三)以“附近”为锚点:幼儿园园本课程内容的统整

人是多种社会关系的交织体,个体以“附近”为枢纽构建与周遭世界的情感链接,并以“附近”为锚点将自我的认知、情感等投射、延展至外部世界。何为“附近”?人类学者项飙认为“‘附近’是一个不同立场和背景的人们在生活常态下频繁相遇的生活空间(a lived space),可以不断地增加人们看到多维世界的能力(capacities of seeing)”^[35]。“‘附近’是以个体为原点并实际参与创造的生活范围。”^{[36]982-983} 附近不仅仅指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更涵盖了儿童生活环境中的事、物,包括家庭、社区、幼儿园及其周边的一切^[37]。园本课程重视“附近”意味着要关注儿童与周遭

环境的互动,促进儿童与周围人、事、物的真实联结,回归儿童的生活世界,通过重构儿童与“附近”的互动关系,实现教育生态的重建。

“‘附近’呈现了社区(在乡村地区则是“村落”)日常生活中人、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与差异性,蕴含了丰富的结构层次关系,对个体获得认同感、归属感、安全感具有重要价值,是个体认识他者、走向整体世界的起点。”^[37] 幼儿园园本课程统整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并将日常生活、物理环境和地方性知识转化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可通过“我的小天地”项目,引导儿童规划个人物品收纳系统,在整理书包、布置储物柜的实践中发展空间管理能力,关注儿童对自我世界的认知与管理;开展“菜场探秘”活动,儿童跟随家长参与食材采购,在真实交易场景中理解日常生活,拓展儿童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与参与。再如,可通过充分挖掘社区特色资源,开发出“探早茶”“晒陈皮”等系列主题活动,巧妙地将儿童的日常经验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生活与学习的有机融合。当幼儿园课程内容真正根植于“附近”的地方土壤,教育便不再是抽象的知识传递,而成为儿童与生活世界的教育对话实践。

(四)儿童在时空中的实践行动:幼儿园园本课程实施路向

全球化浪潮席卷教育领域的今天,幼儿园园本课程面临同质化危机与地方性消解的双重困境。当标准化课程模板取代了地域文化浸润,当虚拟空间体验遮蔽了真实场所感知,儿童与生活世界的时空联结则面临断裂的风险。儿童是天生的行动者,他们通过双眼观察万物,借助双手触摸世界,依托双脚丈量大地,在具身实践的行动体验中,儿童的学习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幼儿园园本课程的实施应让幼儿的学习回归生活本源,深深根植于幼儿所处的地方土壤之中,通过引导幼儿在实践中实现其与周围世界的真实对话与互动。地方场域具有独特的时空密码,比如不同个体的记忆体验、地方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些不同的“时间流”会在多维空间相互交织影

响,形成不断变化的动态结构。儿童的学习则应深深扎根于由具体时间脉络与空间场景相互交织、共同构建的动态关系网络之中。

儿童在特定时空中的实践行动深嵌于地方脉络之中,其具身性的、情境化的探索与互动构成了儿童与时空环境的持续对话。儿童对时间的体验从基于生理节律与具体事件的模糊认知,逐步向理解抽象时间概念的结构化演进。在胜产荔枝、常举办龙舟赛的地区,教师可将“荔枝节”“龙舟赛”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时序活动巧妙地融入日常教学中,让儿童在参与荔枝采摘的过程中理解季节与植物生长变化的关系;组织儿童参观龙舟制作,感悟龙舟制作严格的工序流程与时间的合理搭配,观看龙舟比赛,体验运动赛事,久而久之,儿童能从大自然、工艺制作、运动、赛事等不同维度全方位理解时间的特性,能在潜移默化中内化“顺应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与地方文化的精髓。儿童与地方互动是一个动态且多元的过程,材料的陈列方式、空间的布局与特色等在无声地影响儿童的实践活动,并使其在与地方的互动中赋予地方意义、生发深厚的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如在盛行喝茶的地区,教师在布置儿童活动区域时可添加茶楼,使儿童重温他们熟悉的地方生活场景与地方文化特色。只有扎根儿童生活世界的课程实施路径,才能有效修复儿童与地方的时空联结,走出一条园本课程“地方性”道路。

[参 考 文 献]

- [1] GRUENEWALD D A.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A critical pedagogy of place[J].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8(3): 308-324.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3] 陈佳萍, 洪如玉. Jeff Malpas 地方哲学对地方教育的启示: 以《走读嘉义》课程方案为例[J]. 嘉大教育研究学刊, 2016(37): 33-56.
- [4] 雷雨菡, 郑国. 乡村幼儿教育在地化发展的困境与路径探析[J]. 郑州师范教育, 2024(3): 19-22.

- [5] 王欲晓, 王海英. 乡村幼儿教育在地化发展困境与突破路径[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3(4): 22-28.
- [6] 黄晓玲. 课程资源: 界定特点状态类型[J]. 中国教育学刊, 2004(4): 38-41.
- [7] 爱德华·劳尔夫. 地方与无地方[M]. 刘苏, 相欣奕,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8] 陈婷. 论地域文化的教育价值[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81-85.
- [9] 蒂姆·科瑞斯威尔. 地方: 记忆、想象与认同[M]. 王志弘, 徐苔玲, 译. 台北: 群学出版社, 2006.
- [10]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 经验的视角[M]. 王志刚,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 [11] 郭戈. 关于兴趣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J]. 中国教育科学, 2025(2): 155-217.
- [12] 王红. 乡村教育在地化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9.
- [13] SMITH G A. Place-based education: Learning to be where we are[J]. Phi delta kappan, 2002(8): 584-594.
- [14] 洪如玉. 地方教育学探究: Sobel、Theobald 与 Smith 的观点评析[J]. 课程与教学季刊, 2013(1): 115-138.
- [15] AGNEW, JOHN A. Place and politics: The geographical mediation of state and society[M]. Boston: Allen & Unwin, 1987.
- [16] TUAN Y F. Topophilia - Or, Sudden Encounter with Landscape[J]. Landscape, 1961(1): 29-32.
- [17] GREENWOOD D. Place - based education: Grounding culturally responsive teaching in geographical diversity[C]// SMITH G A, SOBEL D. Place and community - based education in school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10.
- [18] 徐汉晖. 空间、地方感与恋地情结的文学抒写[J]. 湖北社会科学, 2017(11): 119-125.
- [19] 洪如玉. 全球化时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另类思考: 地方本位教育[J]. 幼儿教保研究期刊, 2010(5): 73-82.
- [20] 郎朗, 林森. 结构化理论在“地方”研究中的应用: 以北京三里屯的演变为例[J]. 地理研究, 2017(6): 1065-1080.

(下转第 103 页)

高校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 路径探究

祁 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国资处, 江苏南京 211200)

[摘 要] 随着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逐步推进,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面临许多新的任务和挑战,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刻不容缓。目前高校内部审计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审计工作站位不高;审计体制机制及制度建设不完善;审计项目实施不充分和不深入;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审计整改落实不到位,审计价值体现不充分;审计人员队伍建设存在短板。如何促进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其一,提高审计站位,切实履行审计职责使命;其二,科学制定审计计划,强化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其三,强化质量意识,全面提升审计质效;其四,落实“科技强审”要求,有序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其五,注重审计结果的运用,持续推进审计整改工作;其六,贯彻“三立”要求,不断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关键词] 高校治理现代化; 内部审计;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G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79-0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2],《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明确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实施路径^[3]。为推动高校管理与国家整体治理现代化进程协同发展,大学治理机制的构建与优化已成为关键议题。大学治理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开展高质量教学活动与实施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实现教育价值,这一过程需要在清晰明确的监管与指导原则下有序推进,同时大学治理体系需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监督,持续提升治理效能,增强自身的适应性,以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与社会需求。对此,应发挥审计在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以有力有效的审计监督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审计的制度优势,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是伟大时代的要求和召唤。

一、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一)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高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大学作为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的关键平台、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成为提升教育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因素,内部治理尤

[收稿日期] 2025-02-15

[作者简介] 祁 麟,女,河南商丘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国资处副处长,高级审计师。

其是内部审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当前大学“放管服”改革背景下,权责并重的理念愈发凸显,如何在政策约束、拨款问效和监督检查的框架内实现有效治理,已成为时代赋予高校的重要使命^[5]。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其价值在于以高质量和专业化的经济监督,为现代大学有效治理提供风险防范、权力制约、独立评价和协同问责的功能保障^[6]。可以说,审计是大学治理体系的必然要素,审计是大学治理体系的权力约束机制,审计是大学治理体系的免疫系统。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高校内部审计不仅承担着传统的财务监督职能,还逐渐向绩效审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方面扩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审计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等新要求^[4],围绕加强审计工作、完善审计制度、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出应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和加强自身建设,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指示精神,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准则规范审计工作,审计署、教育部对内部审计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教育部修订《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提出新时代教育内部审计的定位,对审计机构、审计人员、职责权限、审计结果运用等进行规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围绕完善领导体制、健全审计工作报告机制、拓宽审计监督范围、优化审计职责权限范围、强化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保障规范审计行为等六个方面优化,提出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2023年审计署提请中央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推进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推进

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思路举措和保障措施。以上文件的颁布与实施,均体现了国家对审计工作的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背景下,高校审计工作正处于既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又直面崭新而严峻的挑战时期。随着教育经费的增加、财务透明度要求的提升以及内部管理复杂性的增长,审计工作不仅需要深化其专业职能,确保资源的有效利用,还必须应对新兴风险,如数据安全、远程工作环境下的合规性问题以及第三方合作带来的潜在财务风险,从而保障高校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高校资金规模的扩大及所属机构企业的增多,内部审计的必要性显著增强,审计职责日益繁重;同时,来自政治巡视、国家审计等的压力,正倒逼高校内部审计机制革新与进步,以适应更严格的监督要求。

高校内部审计工作是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推进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应紧扣法律、法规、文件精神,把握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内涵,提高站位,找准定位,立足学校实际,充分利用审计资源,有力开展各项审计工作,为领导决策服务,充分发挥服务大局作用,提高学校防范风险能力,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立足高校内部审计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构建适应现代大学发展的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框架,深化对高校内部审计功能和角色的理解,探讨如何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优化审计流程、聚焦审计成果等提升高校内部审计的工作质量和效率,方能以有力的审计监督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校内部审计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独立性,即审计工作应当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之外,确保审计结果的客观公正;二是专业性,要求审计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胜任复杂的审计任务;三是服务性,高校内部审计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促进学校管理水平的提升;四是动态性,随着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类型的多样化,内部审计的内容和方法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些特征决定了高校内部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为其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8]。

新时代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指的是内部审计所需人力、技术、资金等相关要素投入产出比率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内部审计成效显著,能够更好满足组织治理需要,推动所在组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的可持续发展方式^[9]。对于高校而言,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主要指高校内部审计机构在学校党委行政领导下,依法独立履行内部审计监督职责,充分运用并优化配置人力、资金、技术、设备等审计资源,实现内部审计成效最大化,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对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保障作用。高校内部审计应树立并努力实现“五个更加”的目标,即内部审计领导体制更加健全、内部审计工作机制更加高效、内部审计制度更加完备、内部审计管理更加规范、内部审计成果更加丰富^[10]。

二、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大学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背景下,高校内部审计面临新的使命,亟须强化领导架构与工作机制的整合,深化审计机制的现代化建设^[11]。这不仅要求全面提升审计项目质量管理,还呼唤审计管理效能显著提升,以实现审计覆盖的广度与深度,确保“审计全生命周期”的有效实施。通过规范程序及提升质量,内部审计应充当高等教育的“经济健康守护者”,充分发挥其作为内部“免疫系统”的功能,确保相关环节的透明与高效。然而,审视当前实践,高校内部审计领域尚存差距,未能完全适应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在体制完善、机制创新、制度执行及质量控制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 审计工作站位不高

高校审计工作大部分集中于经济责任审计、财务收支审计、工程项目结算审计等审计

项目。经济责任审计、预决算审计等财务审计项目局限于财务查账等微观层面的查错纠弊,如查找财务报销流程是否违规,会计凭证报销附件是否齐全,招待费、差旅费等“三公”费用是否超标,资产管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等;工程项目结算审计集中于对项目结算的核价核量及流程审批的审核。在开展审计项目中,未重点关注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评价、信息系统运行有效性等宏观层面,未做到通过开展相关审计项目深控制度、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及缺陷,审计工作站位还不够高,不能真正做到“为学校领导决策服务、为完善管理服务、为学校建设发展服务”。

高校审计机构年度审计项目规划集中体现在年度审计计划中,在审计项目计划制定方面,有如下问题需要关注:一是计划制定不够科学合理。部分高校计划制定笼统宽泛,缺乏深入思考,没有与学校改革发展实际深入结合,且计划中一般只列示下一年度工作内容,对于审计项目具体数目及规定完成时间未在计划中体现,计划缺乏指导性和科学性。二是计划执行不严格,在审计计划与实际工作不一致时,大部分高校未履行审计计划变更的流程,未体现计划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甚至有的高校审计计划制定流于形式,没有能够有效结合实际审计工作,为了提交计划而写计划,并未做到用计划真正指导审计工作。

(二) 审计体制机制及制度建设不完善

2018年,中央审计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审计工作从此进入新阶段、新征程。此后,各省市、各高校陆续成立审计委员会,在审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审计工作。目前大部分高校建立审计委员会制度,但未真正切实发挥审计委员会作用^[12]。在实际工作中,部分高校审计委员会每年只召开一次或两次年度会议,主要内容为审议上一年审计工作,对下一年度工作进行布置等,对于重大经济事项决策上会汇报等专题研究会议较少。

在制度建设方面,根据《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的有关要求,高等学校当依照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内部审计职业规范,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13]。针对以上要求,部分高校审计相关制度未及时做出跟进调整,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国家及省市已出台《内部审计工作规定》,部分高校的《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未及时跟进做出修订;在国家对科研经费大力进行改革,深入推进“放管服”的基础上,部分高校《科研项目财务决算审计办法》未及时跟进做出调整;2021年《民法典》颁布实施,同时《合同法》废止,部分高校相关制度未及时跟进修订。这也反映部分高校内部审计机构人员对审计业务相关的规章制度不够熟悉、学习还不够。

(三) 审计项目实施不充分和不深入

审计项目质量犹如大厦之基石,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成效,并影响后续审计整改、“回头看”等一系列工作。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审计环境下,高质量的审计项目对于保障经济活动的合规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维护高校利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4]。以经济责任审计项目为例,在资源分配多样化的背景下,高校在开展此类审计工作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外部专业审计资源,利用其丰富的行业经验和专业技术开展工作;二是依靠自身实力雄厚的审计队伍,发挥其对校内情况熟悉的优势。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审计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审计重点执行不到位的情况较为突出。如在对某二级单位的审计中发现,单位领导对于“三重一大”制度的建设与落实情况缺乏深入关注,审计工作仅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挖掘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和问题,导致审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严重不足。审计开展的程序也存在问题,未能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和规范要求执行,使得审计证据的收集不全面、不充分,影响了审计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审计项目实施不够深入,没有对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进行细致审查,未能发现可能存在的重大违规行为和经济风险。

此外,审计报告的质量控制也存在明显漏洞。一方面,审计报告中提出的建议缺乏针对

性和可操作性,往往泛泛而谈,未能结合具体法规和实际情况给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另一方面,审核流程过于形式化,仅仅注重表面的批准程序,而忽视了对报告内容的实质性审查^[15]。这种形式主义的审核方式无法有效发现报告中的错误和不足,使得审计报告的质量大打折扣。

(四) 内部审计信息化建设进展缓慢

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金审工程”三期建设的推进与持续优化,标志着国家审计领域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金审工程”三期整合了先进的信息技术,构建了更为完善的审计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审计数据的高效采集、传输与分析,提升了国家审计的效率与精准度,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社会运行的监督能力^[16]。

社会审计领域同样积极投身于信息化建设浪潮之中。以审友软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专业审计软件的广泛应用,推动社会审计信息化建设不断迈向成熟^[17]。这些软件通过智能化的数据处理、风险评估以及审计流程管理,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审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使得社会审计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投资者利益等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高校层面,信息化建设成果显著。智慧校园建设涵盖了教学、科研、管理等多个领域,实现了校园信息的互联互通与资源共享。招标采购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增强了采购流程的透明度与规范性,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与廉政风险。财务系统的信息化则提高了财务管理的效率与准确性,为高校的经济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18]。

然而,相对而言,高校的内部的审计信息化建设则明显滞后。目前,大部分高校内部审计工作主要依赖于日常办公软件,这些软件虽能满足基本的数据处理需求,但面对日益增长的审计数据量与复杂的审计业务,其局限性愈发凸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高校审计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完善的审计信息系统尚未建立,信息化建设的缺失严重制

约了高校审计工作的发展^[19]。这种滞后的审计信息化现状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在数据处理方面,由于缺乏专业的审计软件与大数据分析工具,审计人员需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数据的手工整理与汇总,工作效率低下。在审计重点的把握上,难以运用数据分析技术精准定位高风险领域,导致审计重点不突出。同时,由于各业务系统之间的数据无法有效联动,形成了一个个“数据孤岛”,审计人员难以从全局视角对高校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审计,严重影响了审计质量与效果。

(五) 审计整改落实不到位,审计价值体现不充分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明确指出“单位应当将内部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相关决策、预算安排、干部考核、人事任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同时强调“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制度”^[20]。此规定旨在强化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与影响力,推动单位内部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然而,在具体的审计实践中,被审计单位在面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时,整改回复往往流于形式,常见表述为“该事项今后按规定执行”,但实际行动却滞后。以招待费、劳务费等费用发放超标问题为例,许多单位并未真正落实清退处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认识层面,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红红脸,出出汗”的浅层次整改显然不是内部审计工作的预期目标。

在审计结果的运用方面也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主要表现在审计结果不能在规定范围内有效通报,导致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部分高校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存在时间安排不合理的现象,在干部任免后一年左右才开展审计,这使得审计结果无法及时、准确地为“干部考核、人事任免和奖惩”提供有力支撑,严重削弱了审计工作在干部管理中的关键作用。此外,审计结果的通报范围过于狭窄,仅局限于审计人员、被审计对象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分管领导。这种有限的传播范围极大地限制了审计结果的警示及震慑作用,无法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对违规行为的约束

和规范,审计工作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六) 审计人员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审计工作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活动,这要求审计人员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技术能力,还需具有认真踏实、高度负责的职业精神。然而,当前高校审计工作队伍存在明显的短板。

一方面,在人员配置方面,普遍存在人员不足。随着高校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审计业务量呈急剧增长态势。从日常财务收支审计,到大型基建项目审计,再到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范围不断拓展,业务量持续攀升。但与此同时,审计人员的配备却未能跟上业务发展的步伐^[21]。许多高校的审计人员数量有限,现有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致使审计人员难以对每一项审计任务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分析,严重影响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和审计质量的提高。

另一方面,从专业结构看,高校内部审计工作事务繁杂,不仅涉及财务数据的审查,还包括对工程项目合规性的评估、合同合法性的审查以及信息系统安全性的考量等,需要审计人员具备多元化的专业背景。严格而言,审计团队的组成应包括会计、审计、工程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等多个领域的专业人才。然而,目前大部分高校的审计工作人员多是会计、审计相关专业背景,严重缺乏法律、工程管理、信息工程等领域的人才。这种专业结构的失衡,使得审计工作在面对复杂业务时,难以全面、深入地开展,难以实现审计“全覆盖”的目标。

三、服务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

(一) 提高审计站位,切实履行审计职责使命

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审计机构欲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关键在于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监督理念,坚决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为学校党政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为学校建设服务,以高质量的审计工作助力学校的改革发展。

在日常工作中,高校审计人员应认真学习

相关法律法规、文件,特别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把党对审计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贯彻到审计工作全过程、各环节,将审计工作新形势、新坐标、新方位融入日常审计工作计划制定、项目实施、报告出具等全过程,统筹谋划推进本校内部审计工作。应进一步发挥审计领导体制作用,积极发挥审计委员会职能,紧扣学校中心工作,把握重点领域,推动开展绩效审计、重大政策贯彻落实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等,更好地发挥内部审计在规范管理、防控风险、源头监管、完善治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真正有效发挥审计监督“前哨”“利剑”作用。

(二) 科学制定审计计划,强化审计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审计计划在审计项目安排实施中起到指导性作用,科学性是制定审计计划的重要前提。一是要统筹科学安排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制定年度项目计划应与上级主管部门如审计厅、教育厅的要求相衔接,与学校“十四五”规划、年度发展规划相结合,做到在现有审计资源约束下,年度审计计划制定科学合理,且审计机构应将年度计划每年报审计委员会审批通过,在年度计划指导下有序开展审计工作,如实际工作中项目安排与计划不一致,应对计划及时进行调整变更。二是要科学合理编制项目审计计划。在编制项目审计计划时,应结合审计项目的实际情况,前期充分开展调研,集思广益,做到计划的原则性及灵活性相结合,有效发挥计划的主动性、科学性,提升审计工作的规范性。

内部审计制度建设是规范审计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规范内审行为、过程,提高内审质量、把握内审重点、防范内审风险的前提和保障。在内部审计工作中,规章制度建设应走在前面,要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使各项工作都能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遵,从而更好地规范学校内部各类经济活动,防范经济风险,提高工作效率。

在内部审计制度构建中,应结合国家出台

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同时做到与本校内部治理体系相匹配,及时梳理、完善内部审计制度,增强内部审计制度规范性、时效性,推动学校内部审计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在内部审计制度制定与修订中,还应结合学校发展实际,着眼学校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推出的新举措,确保内部审计制度能够适应学校发展改革的新要求,服务学校的发展大局。

(三) 强化质量意识,全面提升审计质效

审计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在审计全过程中应做到把控重点及关键环节,同时兼顾全过程,不断提高审计质量。

一是注重审计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审计实施方案在审计项目实施中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因而审计实施方案应内容全面、防止漏项;同时做到重点突出,时间安排合理,操作性强。在编制实施方案时,应在对被审计单位或人员充分调查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及学校相关制度文件要求编制,明确审计范围、所需资料、审计人员分工、审计时间节点等事项,做到有的放矢,重点明确,有章可循。

二是注重审计证据的充分性、适当性。审计取证是审计实施过程的关键环节,应注重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防止收集证据不完整、收集证据不充分;同时注重证据的适当性及有效性,保障审计证据质量。

三是注重审计报告的全面规范性。审计报告是审计项目的“灵魂”和审计项目成果的集中体现,应严格按照审计规范要求撰写审计报告;同时注重审计报告的质量,注意审计问题与审计建议不交叉,明确出具审计问题所引用规定的依据条款,细化审计建议,做到具备针对性及可操作性。

四是注重审计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性及科学性。审计机构应制定修订审计档案管理相关制度,注重推动档案管理的制度化、科学化。应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档案管理,审计档案应在符合审计档案管理要求的基础上做到全面、完整、规范,并及时送交档案。

(四) 落实“科技强审”要求,有序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赋能审计是提升审计质量的“加速器”,高校内部审计信息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科技强审”的要求,也是审计思维方式及技术手段的创新,在转变内部审计方式、提升内部审计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

大数据时代,只有抓住信息流、数据流,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抓取审计重点,提升审计质量。高校应有序推进审计信息化建设,做到对接本校资产管理、招标采购、财务系统等平台,避免“信息孤岛”,能够抓取本校资产数据、财务数据等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搭建大数据分析处理平台,做到数据实时监控、预警,以此全方位、多角度抓取审计重点,从而提升审计质效,进一步发挥审计服务学校管理职能,推动审计工作高质量开展。

(五) 注重审计结果的运用,持续推进审计整改工作

对审计项目中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审计机构应及时分析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挖掘审计发现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提出审计发现问题的意见建议,必要时应提请主要领导研究批示。

高校及审计机构应注重并强化审计结果的运用,如应有序推进经济责任审计等,同时用好用审计结果通报机制,真正发挥审计的警示、震慑作用。在审计项目中,应探索开展融合式、嵌入式、综合审计,推进一次进点多项审计,减少被审计对象多次接待,强化一审多果,一果多用,以提升审计工作效率及效用。

在审计工作中,不仅要注重发现问题,更要强化对问题整改的督查及跟踪,建立长效机制,扎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应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举一反三,在机制、制度层面查找原因,健全内部管理机制,完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不属于内部体制、制度方面

的问题的,应注重单位考核机制建设,将审计整改切实纳入学校整体考核内容,防止被审计单位“边改边犯”“屡改屡犯”。应注重完善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台账,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并进行整改“回头看”等的追踪管理,确保审计发现问题对账销号,以整改落实的实际成效提升审计效能。

(六) 贯彻“三立”要求,不断加强审计队伍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审计机关需强化自身建设,秉持审计精神立身、以创新规范立业、以自身建立信^[22]。这一重要指示为审计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而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且人员充足的审计队伍,正是落实“三立”要求的关键所在,也是顺应审计工作新形势、新发展的必然需求。随着高校内部审计业务在各方面的深入开展,涉及审计、会计、信息技术、工程管理等多学科、多领域,这就要求不断扩大审计工作队伍的专业背景,以满足审计业务多元化的需求。专业结构合理的内部审计队伍,能够从不同视角审视高校各项经济活动,确保审计工作的全面性与准确性,进而保障学校在复杂的发展环境中稳健前行。

一方面,在人员配备上,要根据自身审计业务的实际需求,引入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才,优化审计队伍的专业结构。例如,对于大型基建项目的审计,配备工程管理专业人才,能够更精准地把控项目成本、质量等关键环节;在数字化审计趋势下,吸纳信息技术专业人才,有助于提升审计效率与数据安全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审计人员的培训提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政策法规的不断更新,审计人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政策敏感性。定期组织培训,不仅能让审计人员掌握最新的审计技术和方法,还能增强他们对政策法规的理解与运用能力,从而提高工作中的学习主动性和业务水平。

另外,对于那些由于实际困难而难以在短期内配齐所有相关专业人员的高校,可以通过采购社会服务,借助专业审计机构的力量,弥补校内审计人员在某些专业领域的不足,或通

过借调其他单位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技能的人员,实现人才资源的共享与优化配置。通过这些措施,推动内部审计资源的提升,使审计工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改革发展,在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高校审计队伍建设是一项长期且系统的工程,需要高校在人才配备、培训提升以及资源整合等方面持续发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审计工作需求,为学校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审计保障。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3-6.
- [2] 赵旻.治理理论视角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内部结构的路径探析[J].北京教育(德育),2016(1):12-14.
- [3] 杨九诠.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基本框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9-11.
- [4]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2023-10-31)[2025-01-20].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10/31/c_1129947183.htm.
- [5] 魏妮,司晓宏.高质量审计助力大学治理现代化:逻辑必然与功能优化[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172-182.
- [6] 周箭.国家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审计与会计,2024(12):8-10.
- [7] 习近平对审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自身建设 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J].中国审计,2025(2):4.
- [8] 黄旻杨,何建梅.以调查研究推动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以某高校预算执行与决算审计为例[J].财务管理研究,2024(4):31-37.
- [9] 李凤雏.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屆四中全会精神 实现新时代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J].

中国内部审计,2020(10):4-24.

- [10] 李凤雏.深入研究探索 推动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J].中国内部审计,2021(12):4-9.
- [11] 郑文瑾,曹逸航.现代大学治理视角下内部经济责任审计整改问题研究[J].中国总会计师,2022(11):165-167.
- [12] 王松.新时代高校内部审计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J].审计月刊,2023(6):42-45.
- [13] 张键琦,夏午宁.高校内部审计创新研究——基于新《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视角[J].会计之友,2021(20):116-121.
- [14] 倪春来.高校内部审计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湖北省高校为例[J].财政监督,2023(15):100-104.
- [15] 张玉娟.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高校内部审计流程优化[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23(16):101-103.
- [16] 周德铭.国家审计信息化的系统定位、业务效能和发展展望[J].电子政务,2013(7):2-24.
- [17] 夏先锋.社会审计的信息化研究与应用[D].南京:南京大学,2016.
- [18] 陈晟.加强高校财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基于复翼财务系统的使用[J].中国农业会计,2022(7):51-52.
- [19] 张丽.高校内部审计的制约“瓶颈”分析与对策研究[J].财会学习,2022(32):130-132.
- [20]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规定[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20):32-36.
- [21] 魏璐.审计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改善建议[J].质量与市场,2021(18):176-178.
- [22] 《求是》杂志编辑部.新时代新征程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EB/OL].(2023-10-31)[2025-01-20].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10/31/c_1129947171.htm.

(责任编辑 光 翟)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以“1345”培养模式为例

张少杰 孟令豪 肖铁桥

(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 安徽合肥 230601)

[摘 要] 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对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针对建筑类院校人才培养与乡村需求脱节的现实问题,构建“党建引领、扎根乡村、多方协同”的人才培养体系。研究提出“1345”培养模式:以培养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为一个目标,通过“理论+设计+实践”“三层递进”教学方法,构建学院—地方(企业)—团队—导师“四体联动”管理机制,依托校所、校企、校地、校校、校会“五方协同”育人平台,从而有效破解了“重工程轻思政、重城市轻乡村、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等难题,学生专业能力与乡土情怀显著提升,为建筑类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为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理论、推动高等教育与乡村发展深度融合提供参考。

[关键词] 建筑类院校; 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 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 TU-4;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87-08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7年6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发布了《共同推进乡村规划人才培养行动倡议书》^[1];2022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2];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3],积极推动培养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目前研究表明乡村规划大部分的设计、建设仍未脱离城市规划思

维^[4],缺少完全适合乡村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建筑类院校如何应对学科专业发展需求、培养出与乡村振兴需求相匹配的城乡规划人才显得尤为重要。科学构建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并开展实践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学校与地方的合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落地,而且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栾峰分析相关竞赛对于乡村规划教学发展的影响,发现参与竞赛对调动师生切实参与乡村振兴战略项目有重要意义^[5];彭华分析了政府相关文件以及乡村振兴政策对农

*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安徽建筑大学安徽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实践教育基地”(项目编号:2021xqhszsjd023),“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导向下的乡村规划课程及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1jy17),“建筑类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2jygyj316),“建筑专业学位《绿色建筑理论与方法》教学案例库”(项目编号:2023zyxwjw106)。

[收稿日期] 2025-06-22

[作者简介] 张少杰,女,安徽界首人,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副教授。
孟令豪,男,河南项城人,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铁桥,男,云南德宏人,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

村的实际影响,并提出了多元化教育、系统化实践与科学化对接的人才培养方式^[6]。蔡进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人才培养现状和新要求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从强化实践教学、完善教学体系、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基层意识四个方面提出具有创新性的建议^[7]。李致春以高校基于“产教”深度融合探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8];朱光以工程教育为导向探讨人才培养模式^[9]。

现有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过程中大部分城乡规划专业位于建筑类院校内,大多院校仅注重了对相关人才职业能力的培养,课程教学脱离了思政理念^[10]。同时多聚焦单一环节(如课程或实践),缺乏系统化培养体系设计;未深入探讨党建引领与专业教育的融合机制,对建筑类专业“城市中心主义”教学惯性的突破不足,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懂技术、通政策、有情怀”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本文以此问题为切入点,旨在构建并实践“党建引领、扎根乡村、多方协同”的“一个目标、三层递进、四体联动、五方协同”的“1345”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创新性体现在:提出“红色基因+专业能力+乡土情怀”的三维素质模型;“三层递进、四体联动、五方协同”的运行框架,系统性解决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从方法论层面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党建引领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引领—资源整合—质量保障”三重作用机制。研究成果不仅为建筑类院校提供可复制的人才培养方案,更探索了高等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新型组织范式。

一、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现状

(一)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要求

乡村振兴需要复合型人才,学生须具备建筑设计、规划、农村经济管理、社会治理等学科知识和技能,可以综合运用这些能力进行乡村振兴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实施。乡村振兴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学生需要通过实践项目、实习实训等方式,锻炼自己的实践操作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and 创新能力;同时需要有创新的精神和意识,具备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实施创新项目的能力;最后还需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乡村振兴工作中,为农村地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当前建筑类院校相关课程教学体系以基础课程、乡村规划振兴理论与政策、乡村规划与设计、农村建筑设计与施工、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为主,并根据不同学校和专业侧重点结合实践教学、跨界合作、创新创业教育以及教师指导来开展。以期在为学生打下坚实建筑学基础的同时还能使学生亲身体验和解决乡村的实际问题,以适应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需求。

(三)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和方法

目前,建筑类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从分析能力的培养到实际项目的实践。通过对全国24所建筑类高校的课程调研发现,当前大部分建筑类院校均开设了乡村规划课程,但缺少完善的乡村规划教学体系,仅少数通过评估的建筑类院校具备乡村规划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其主要的教学方式如表1所示。

二、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课程体系结构性矛盾

现有课程与乡村实际需求严重脱节;知识体系沿袭城市范式,如基础设施设计忽视乡村分散式布局需求;乡村专题研究浅表化,缺少对传统村落保护、乡土建造技术的系统教学;跨学科整合不足,社会学、农学等乡村治理关键内容未纳入课程体系,学生难以应对乡村复杂系统问题。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主要围绕建筑类专业来开展,乡村相关课程已初步形成“基础—学科—专业”三级架构,但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如表2所示)。

表 1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主要教学模式

协同双方	教学模式与方法
校地联合	组织学生到乡村实地考察和调研,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问题,培养学生的观察和分析能力
	组织学生参与乡村振兴实践项目,让学生亲身参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鼓励学生主动参与乡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与当地居民合作,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建立乡村振兴实验室,提供实践平台和设备,让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和创新实践
校企联合	安排学生到乡村建筑设计事务所、规划院所、施工现场等进行实习实训,接触真实的工作环境和项目
校校联合	组织跨学科的团队合作,让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促进学科交叉和创新
	为学生配备专业导师,指导学生的实践项目和研究,提供专业指导和实践机会
	开设创新创业培训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意识,提供创新创业支持和资源

表 2 建筑类院校乡村规划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

课程类别	典型课程名称	存在的问题
基础课程	美术、画法几何与阴影透视、测量学、建筑结构、建筑构造、建筑概论、乡村概论、工程经济学	乡村内容仅占课时 15%,且多为城市知识的简化移植
学科基础课程	建筑设计基础、建筑设计原理、建筑史、建筑力学、区域经济与区域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学	乡村视角缺失,如“建筑史”中乡土建筑占比不足 8%
专业特色课程	乡村建筑与村落保护、乡村产业发展与创新、乡村规划原理、城乡规划技术科学、工程系统规划、乡村设计概论、乡村规划设计、城乡历史遗产保护规划、地理信息系统	62% 院校仅设 1—2 门选修课,缺乏系统性衔接
实践课程	乡村调研、毕业设计	78% 选题集中于物质空间设计,忽视社会治理维度

当前课程体系在知识供给层面存在“城市中心主义”倾向,如“城市经济学”课程鲜少涉及乡村经济特殊性;技术课程与人文课程割裂,建筑材料课程未融入乡土建造技艺;实践环节存在“景观化倾向”,学生作业常将乡村简化为形式构图对象等。

(二)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

长期以来,多数建筑类院校的学生培养面

临着“供需”不对应的困境,如表 3 所示。高校培养与乡村用人需求存在断层:实践教学虚化,超 70% 的论文选题脱离实地调研(某校数据);能力结构单一,侧重技术训练而忽视沟通协调、资源整合等软技能;评价标准错位,设计作业过度追求图纸表现,忽略村民参与、造价约束等落地性指标。

表 3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面临的问题

对象	主要方面	存在问题
高校供给端	思想领域	培养计划和课程体系往往与社会需求、行业需求脱节,导致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能力培养与社会、行业需求不符
		人才流失问题更加突出,乡村振兴人才匮乏
		科学研究缺乏“真枪实干”,表现为选题空泛不落地,或通篇“八股”
	乡村实践	建筑类人才培养考核重论文,对工程实践考核不足,实践动力不足及设计缺乏思想成了教学顽疾
社会需求端	教学模式	传统建筑类学生一直沿用的“学生—导师”师徒制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当前乡村振兴的人才需求

基于对 12 所建筑类院校培养方案的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存在“四重四轻”的结构性矛盾(见表 4),其根源在于高等教育与乡村社会的“双重脱嵌”。

具体表现为:知识脱节困境,部分院校的乡村规划课程仍沿用《城市规划原理》框架,

仅简单替换案例;部分院校《乡村设计概论》教材中,城市住区理论占比很高,而与乡村发展有关的内容占比较少,从而导致学生能力培养断层。跟踪调查显示,毕业生在乡村工作中面临三大能力短板:跨部门协调能力缺失、乡土材料应用能力缺失、群众工作能力缺失。

表 4 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供需矛盾矩阵分析

矛盾维度	高校供给特征	乡村实际需求	偏差指数*
价值导向	强调技术理性(87%)	需要复合领导力(含治理能力)	0.68
知识结构	标准化知识模块(92%)	要求在地化问题解决能力	0.72
实践模式	虚拟课题为主(65%)	期待真实项目全过程参与	0.81
评价体系	图纸成果导向(79%)	重视持续服务成效	0.85

*注:偏差指数=1-(供给匹配度/需求强度),数据来源于 2023 年住建部专项调研。

三、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

以“党建引领,扎根乡村、多方协同”为引领,围绕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建立“一个目标、三层递进、四体联动、五方协同”的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1345”培养模式。

(一)“一个目标”

坚持“党建引领,思专同行”的育人理念与方法,以培养农业农村科技领军人才为一个目标,结合建筑类学科专业特点,不断改革和完善乡村课程体系,建立专业“链群交互、纵向贯通、横向扩展”的“课程思政链”和“专业课程集群”,实现思政育人从通识教育到专业教育的拓展。同时结合乡村人才培养特点,探索乡村课程思政特色,以探索成果为基础建立乡村课程群思政元素数据库,深入构建乡村课程思政链。

学校需充分利用挂职教师资源,采取融合学科专业优势与育人育才本职的创新举措,鼓励硕士生导师在地方挂职,担任干部并与地方行业主管部门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的同时,参与专业学位学生培养新机制,推进学校各学科专业的融合,为高等院校服务地方发展和乡村振兴开辟新路径。

育人“大课堂”以多种支部共建的形式为抓手,突破传统育人模式,协同科研平台和教学团队,整合形成“教室+平台+社会”一体化

的“大课堂”特色育人空间,培育学生正确的专业价值取向,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号召学生知农、爱农、懂农,并引导学生到革命老区的乡村去工作,真正把论文写在革命老区的大地上,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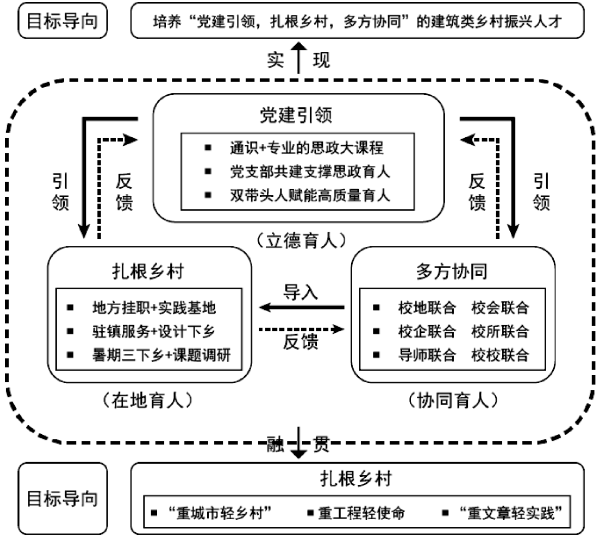


图 1 人才培养模式框架

(二)“三层递进”教学法

采用理论+设计+实践“三层递进”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以实践内容丰富理论学习、以理论学习指导专业设计、以实践经验提升理论水平,培养学生的综合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如图 2 所示。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要求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探索并建构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价值认知、理论基础、设计实践逐步递进的课程

体系:校内理论课程学习阶段,以实践内容丰富理论学习;校内设计课程学习阶段,以理论指导专业实践;校内外专业实践阶段,以实践经验提升理论水平的目的,促进人才培养与时代需求相契合^[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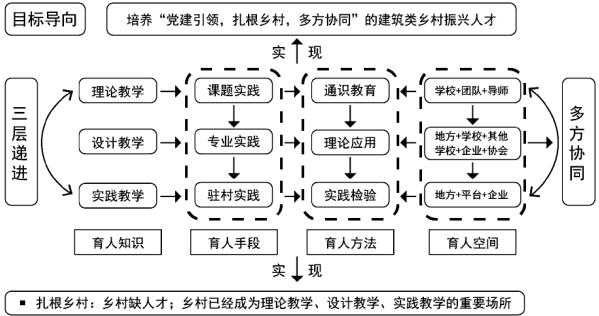


图 2“三层递进”教学方法

通过构建多维的课程体系,使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乡村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行性,调整各个课程的顺序,使其在不断深入的学习中更有连贯性,优化乡村规划设计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分析乡村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对乡村规划的目的与价值有了清晰的认识;在理论、设计、实践三个层面构建多维度的教学目标,培养复合型乡村规划建设人才。

在校内理论课程学习阶段,应注重以实践内容丰富理论学习。具体而言,可以引入大量乡村实际案例,让学生通过对真实案例的分析与探讨,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在乡村环境中的应用逻辑。同时,安排适当的实地考察活动,使学生亲身体验乡村现状,将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乡村场景相结合,增强其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从而提升学习效果。

在校内设计课程学习阶段,强调以理论指导专业实践。教师应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对乡村规划设计项目进行深入分析与构思。例如,在乡村空间布局设计中,依据相关的城乡规划理论,充分考虑乡村的自然地理条件、产业发展需求以及村民生活习惯等因素,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通过这样的实践过程,让学生切实体会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提高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校内外专业实践阶段,则以实践经验提升理论水平为目的。学生参与到真实的乡村

建设项目中,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丰富的经验。随后,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与反思,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乡村发展相关理论的理解。通过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过程,使人才培养与时代需求紧密契合,培养出能够真正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的专业人才。

通过构建多维的课程体系,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乡村规划方案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可行性。在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需合理调整各个课程的顺序,确保课程之间的连贯性,使学生在逐步深入的学习过程中,知识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和巩固。同时,优化乡村规划设计实践教学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分析乡村问题的能力。例如,设置专门的乡村问题研讨课程,引导学生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维度对乡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剖析,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让学生对乡村规划的目的与价值形成清晰的认识,为其未来投身乡村建设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理论、设计、实践三个层面构建多维度的教学目标,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乡村规划建设人才。

此外,融合高校和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优势,是培育高层次乡村应用人才的重要途径。高校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深厚的学术底蕴,政府拥有政策制定与引导的优势,企业掌握着实际的市场需求和先进的技术应用经验,科研院所则专注于前沿技术研发和创新理论研究。通过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借助学科交叉融合、政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等方式,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为乡村应用人才培养提供全方位支持。

一方面,学校与科研院所、设计企业、地方政府联合建立实践教育基地。在这些基地中,学生能够接触到真实的课题,开展实地调研工作,在实践锻炼中积累宝贵经验,切实学到实用本领。例如,学生参与到乡村产业发展规划课题中,深入乡村进行产业现状调研,与当地村民、企业进行交流,获取一手资料,然后结合所学知识,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发展规划

方案。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提供真实的设计课题,相关企业的专家与课程团队组合进行联合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双方协同指导学生,通过公开评图等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实际项目中的设计要求和评价标准。同时,课题成果及时反馈给地方,为地方乡村建设提供实际的参考和支持,真正实现教学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工作的高质量发展。

(三)“四体联动”管理机制

乡村规划课程以联合培养基地建设为纽带,通过构建学院—地方(企业)—团队—导师“四体联动”人才高质量培养保障的长效管理新机制,建立“校企互利、资源共享、协同开放”的长效育人合作新机制,吸引专家全方位参与并指导专业学位学生的培养,聘请一批具有丰富乡村振兴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担任联合培养导师,实现培养计划修订、课程共建、开题研讨、中期检查、毕业答辩等联合培养全过程模式。

联合教学育人活动是立足党建促教学,积极探索“产教学研政融合”的协同育人新路径。挂职教师作为校地合作的重要桥梁,通过从地方政府得到真实课题,与设计企业专家协同指导,课题成果反馈地方,让学生接触真课题,开展真调研,使协同育人贯穿培养方案调整、专业实践、论文选题研讨会与开题、论文预盲审与答辩等全过程。

为适应新时代建筑类人才培养需求,改革单一的“学生—教师”师徒制模式,构建覆盖人才培养“全方位、全流程”的质量标准与保障体系。该体系突出应用与实践能力导向,确保评价结果真实反映学生在设计、技术、管理和创新能力等核心素养的综合表现。通过定期教学检查、多元化网上评教、支持性教改立项等方式,持续评估和优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效果。依托严谨的实践(实习/实训)计划制定、深入的实践过程记录与总结以及严格的实践成果考核答辩等环节,全面保障实践教学质量。通过关键节点的开题审查、中期进度与质量考核以及规范的成果盲审(或专家评审)

等措施,对体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最终成果进行把关。建立由学院统筹协调、地方和企业深度参与、教学和实践团队协作落实、指导教师全程负责构成的覆盖教学、实践、成果全过程的全方位保障机制^[12],协同支撑高质量建筑类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

(四)“五方协同”育人平台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过程中,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育成为关键。为满足这一迫切需求,学校积极探索创新育人模式,构建起校所、校企、校地、校校、校会等“五方协同”的育人平台,致力于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地输送优质人才。

学校充分发挥自身资源整合能力,广泛协同国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部门、设计院所(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以往传统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契合度不高的问题。而如今通过多方参与、深度融合与协同合作,打造出全新的育人平台,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其架构如图3所示。在此平台下,高校、政府、企业等各主体之间实现了紧密的协同联动,构建起“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实践检验—应用反馈”的闭环协同培养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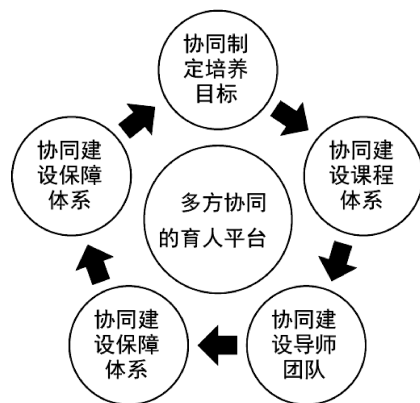


图3 多方协同的育人平台

与科研院所协同,为学生打开了前沿学术研究与高端技术探索的大门。科研院所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前沿的研究课题以及顶尖的科研人才。学校与科研院所合作,一方面,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可走进校园,为学生开展学术讲座、前沿技术培训等,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学生有机会参与到科研院所的

相关科研项目中,如乡村生态环境监测与修复研究、乡村新型农业技术研发等,在实践中提升科研素养与创新能力,将所学理论知识深度应用于实际科研工作。

校企合作则聚焦于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与职业素养,使其毕业后能迅速融入职场,满足企业对乡村振兴人才的需求。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行业动态、市场需求有着敏锐的感知。学校与设计企业、涉农企业等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让学生参与真实的乡村规划设计项目、农产品生产销售项目等。例如在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中,学生跟随企业团队深入乡村调研,参与旅游线路规划、旅游产品设计等工作,在实践中积累项目经验,掌握行业实操技能。同时,企业专家参与学校课程教学,将企业实际项目案例引入课堂,使教学内容更贴合市场实际,实现教学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校地合作以服务地方乡村发展为导向,促进学校人才培养与地方乡村建设的深度融合。地方政府熟悉本地乡村的实际情况,掌握着丰富的政策资源与项目资源。学校与地方政府联合,地方政府提供乡村建设中的实际设计课题,如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设计等。学校组织学生参与这些课题研究 with 方案设计,在解决地方实际问题的同时,让学生深入了解乡村实际需求,培养学生解决复杂乡村问题的能力。并且,地方政府为学生提供实践场地与政策支持,保障学生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校校合作促进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学生提供更丰富多元的学习体验与成长机会。不同高校在学科建设、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方面各有优势。学校与国内外高等院校开展合作交流,通过交换生项目、联合培养项目、学术交流等活动形式,让学生接触到不同高校的先进教学理念、优质课程资源以及多样化的学术氛围。例如,与国外高校合作开展乡村可持续发展国际联合研究项目,学生参与其中可拓宽国际视野,学习借鉴国外乡村发展的先进经验与模式。

校企合作中,行业协会发挥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学校人才培养与行业标准、行业发展趋势接轨。行业协会汇聚了众多行业内的领军企业与专业人才,对行业发展动态、技术创新趋势以及人才需求有着深入了解。学校与行业协会合作,行业协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依据行业最新标准与发展需求,对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提出专业建议,确保学校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需求。同时,行业协会为学生提供行业资讯、职业技能培训、行业竞赛等资源与平台,帮助学生提升职业竞争力,更好地适应行业发展。

通过“五方协同”育人平台的构建与高效运行,学校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振兴事业输送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丰富实践经验与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四、结论

基于党建引领视角,构建并实践了建筑类院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1345”模式,系统回应了当前建筑类院校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中存在的方向偏差、内容脱节、实践薄弱和制度缺位等问题。研究发现:该模式通过“党建引领”这一核心机制,将思政教育、乡村知识体系重构、实践能力强化与多方协同保障有机整合,形成了“思专同行、扎根乡村、多方协同”的全链条培养体系。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以“党建引领”为统领,破解了“重工程轻思政”的育人困境,通过课程思政与乡情教育深度融合,实现了人才培养价值导向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二是构建了“三层递进、多维度联合”的教学体系,系统性解决了城乡知识割裂、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填补了乡村规划领域特色化课程与教学资源的空白;三是创新“校企政研”四方协同机制,通过分时教学、双向渗透等路径,建立了可持续的产教融合生态,为乡村人才精准供给提供了制度保障。实践表明,该模式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乡村认知水平、实践应用能力与基层服务意愿,毕业生在乡村规划、传统村落保护等领域的就业率和地方政府满意度均相应提升。

通过“1345”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探索可以发现,其一,为建筑类院校课程思政的落地提供了“党建引领+专业嵌入”的可操作范式;其二,拓展了产教融合理论在乡村场域的适用性,强调多方主体需以“真问题”为导向构建动态协作网络。实践层面,该模式的推广价值依赖于三个关键要素:院校党委的政治引领作用、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的实体化运作,以及贯穿培养全过程的乡村实践学分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包括实践周期较短、成效评价体系尚未完善,且模式在东部发达地区乡村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适应性差异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围绕以下方向深化:其一是追踪毕业生长期职业发展,评估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其二是探索智能化技术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其三是结合区域差异,构建分类指导的弹性化培养方案。

[参 考 文 献]

- [1] 鲁婵,李伟,张旺,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西部素质教育,2020(13):117-118.
-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EB/OL].(2022-02-22)[2025-07-03].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2/22/content_5675035.htm.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EB/OL].(2025-01-22)[2025-07-03].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7000493.htm.
- [4] 张尚武,李京生,栾峰,等.乡村振兴的规划议题与学科发展思考[J].城市规划,2022(10):18-24.
- [5] 栾峰,殷清眉,孙逸洲,等.竞赛推动下的乡村规划教学改革探索——全国高等院校大学生乡村规划方案竞赛回顾及展望[J].城市规划,2023(2):111-118.
- [6] 彭华.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研究[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2(2):48-50.
- [7] 蔡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人才培养与实践探究[J].大学:社会科学,2020(12):73-76.
- [8] 李致春,桂和荣,刘娜,等.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环境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与实践[J].宿州学院学报,2025(3):77-80.
- [9] 朱光,何康,孙飞,等.工程教育认证导向下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J].宿州学院学报,2025(3):72-76.
- [10] 冷红,袁青,于婷婷.国家战略背景下乡村规划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考——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例[J].高等建筑教育,2022(3):96-101.
- [11] 郭敏,潘护林.基于课程实践教学的乡村规划人才培养路径探索[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19):263-265.
- [12] 赵丁选,王敏,卢辉斌.多主体协同的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1(12):9-19.

(责任编辑 晨 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探究^{*}

郭进萍^{1,2}

- (1.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苏州 215131;
2.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围绕服务国家建设的使命,以宣传为中心大力开展卫生宣教活动,开拓了一条卫生爱国的日常路径。就实践主体而言,爱国卫生运动端赖政府的倡导。红十字会立足于自身职能定位,主动投身其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从方式方法上说,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积极与群众运动和生产建设相结合,主要通过卫生宣教和环境改造两方面来倡导卫生爱国的理念,具体呈现了知行合一的辩证关系。由社会效应来看,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在提高民众卫生健康水平、改造民众精神面貌和改善党群关系等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并建构了红十字会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联。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人探索卫生爱国道路的范例,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关键词] 红十字会; 爱国卫生运动; 卫生爱国; 社会效应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095-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为新时代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供了根本遵循。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掀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人类卫生发展史上的一项伟大创举。在这场运动中,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被誉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力助手”。以史为鉴,可以资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下,中国红十字会被赋予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使命。从服务爱国卫生运动的大局出发,以宣传为中心大力

开展卫生宣教活动,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开辟了一条卫生爱国的日常路径。这一路径从卫生爱国的社会动机到实践主体、方式方法和社会效应,具有独特而系统的内涵,需要全面梳理,以期为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和健康中国行动的深入开展提供智慧和启迪。

一、为爱国而投身卫生运动

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源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反美“细菌战”。1952年2月底,美国飞机共14批148架次侵入中国安东(丹东)、抚顺、凤城等地,先后撒布带有病毒、细菌的昆虫,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争。为粉碎细菌战,毛泽东主席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

^{*}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建国初期中国红十字会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研究”(项目编号:2021SJA1578)。

[收稿日期] 2024-12-20

[作者简介] 郭进萍,女,河南灵宝人,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郑州轻工业大学河南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卫生成了对付细菌战的有力武器。与中国其他公共卫生运动相比,这一卫生运动因其直接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细菌战而具有了强烈的保家卫国的政治底色。1952年3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28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下设办公室,领导反细菌战,开展卫生运动。3月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地做好灭蝇、蚊、蚤、鼠以及其他病媒昆虫。3月23日,《人民日报》首次使用“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一词对当时的卫生工作进行部署,并号召全国各地的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学校,都要开展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做好防御细菌战的准备工作,使人人都来参与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1],由此拉开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序幕。此后,爱国卫生运动逐渐转为经常性的工作,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内容。爱国卫生运动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以反对细菌战和除四害为中心,其根本精神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2]238}。由于该运动的发起具有强烈的保家卫国的政治目的,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踊跃投入其中,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红十字会更是义不容辞。

1950年,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红十字会经过协商改组,通过了新的《会章》。《会章》规定中国红十字会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根据“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及“动员和组织人民实行自救助人”的救济福利方针,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大众,宣传并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3]。这个决定性的变化,给中国红十字会带来了新的任务。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团结群众,担任救护训练及宣传公共卫生;第二,推动卫生防疫工作,进行医疗服务;第三,办理灾害救助及救济性医药卫生工作;第四,在必要情形下,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担负国际性救助及医疗服务^[4]。

作为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的工作

首先“必须与国家卫生建设计划密切结合,才能担负起‘人民政府卫生部门助手’之任务”^[5]。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启动,为保证建设的顺利进行,更需要“有身体强壮的劳动大军”,因此特别有必要在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卫生宣教和初级卫生训练工作,“使他们懂得科学的卫生常识,知道预防疾病的办法,革除旧有的不合卫生要求的生活习惯,改进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6]。立足于自身的职能本位,从服务国家建设的角度出发,红十字会系统以饱满的热情投身爱国卫生运动,在群众卫生普及工作中发挥了先锋和骨干作用。

二、大力开展卫生宣教: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爱国卫生运动是一项全民运动,只有广泛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才能充分发动群众,进而生发出爱国的巨大力量。为此,红十字会总会发出倡言,提出“把卫生科学方法,不要提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要变成群众可能接受的东西;不要把卫生科学描写成为微妙难解的东西,要把它成为广大的劳动群众所能了解的东西;应当学会用不是书本上的公式,而是可能为群众生活中有所体会并乐意接受的知识;避免一般性的说教,避免一时难以做到的空谈。”^[7]这就要求红十字人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走群众路线。

(一) 普遍的群众启蒙

走群众路线,首先进行的是普遍的群众启蒙。当群众被确定为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对象后,卫生宣讲所发挥的教育功能首先需要进行的是对群众开展“普遍的卫生启蒙”。考虑到群众一般知识程度,红十字会在进行宣传教育时,多通过直观教育(或视觉教育)的方式进行,利用群众喜欢的东西和容易明白的事物去宣传卫生知识,如编印宣传画、举办通俗演讲、卫生展览、实物宣传等。

对普通民众而言,图像比文字更为直观易懂,易于产生教育感化效应。因为文字“必须识字通文者始能阅之”,而图像则“虽野老、村夫、妇人、孺子无不能阅。阅之,亦必有因之感

动者”^[8]。为此,部分分会专门编印了一些宣传画(详见表1),以直观形象的方式帮助民众了解卫生知识。

表1 1952—1954年部分红十字分会编印宣传品一览表

年份	分会名称	宣传品	内容
1952	北京	宣传画4幅,印发万余份	预防天花宣传
	北京	卫生常识小册子22种30多万份	预防麻疹、猩红热、煤气中毒、灭虱等卫生常识
1953	西安	《工厂防痨》《肠胃病预防》《灭蚊预防大脑炎》宣传画和连环画	预防痨病、肠胃病和大脑炎
	开封	《灭蚊防病》《扑灭苍蝇、预防肠胃传染病》宣传画	介绍扑灭蚊蝇的各种有效方法
	汲县	扑灭蚊蝇宣传画,防疫卫生大字报	乙型脑炎防疫卫生宣传
1954	福州	做好饮水站消毒工作宣传画	预防夏令胃肠传染病
	武汉	扑灭苍蝇宣传画	预防夏令胃肠传染病

资料来源:董浩撰写的《我们的会务宣传工作——记杭州市分会宣传月转为经常性宣传的经过》刊发在《新中国红十字》1953年第24期,第36页;《西安、开封两分会与卫生部门联合印制卫生宣传品》刊发在《新中国红十字》1953年第32期,第18页;孙敬敏编纂:《北京市红十字会的65年(1928—1993)》,北京:文津出版社,1995年,第57—58页。

根据若干城市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组织小型展览会,效果显著,有的展览会观展人数达11.6万。展览的内容一般包括环境卫生、个人卫生、传染病、妇幼卫生和旧婚姻的连环画及中国红十字会工作活动的图片等。因直白易懂,展览会吸引了大批民众的参与。1954年,青浦县红十字会联合县卫生院等单位筹办了以血吸虫病防治为中心的爱国卫生展览会。3月4日到4月18日先后在全县7个区的13个乡镇上展出。展览会每在一地展出,小小的村庄集镇就顿时活跃起来。妇女们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结伴来看展览;矿山工人、工人家属、各学校学生也都利用工余、课余时间整队前来参观;有的人自己看了两遍、三遍,还动员别人来看,并且自动向他们讲解;闻讯从三、四里外赶来看展览会的也很多^[9]。

用实物宣传卫生常识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1953年,孝感分会在沙沟乡开展钩虫病患者调查统计工作时,一面把显微镜摆开给群众看,一面把肚子里有钩虫就会生病的道理讲给大家听。许多人从显微镜下看到粪便里真有钩虫,明白了致病原理。当天,该村40%的居民都做了检查^[10]。

与此同时,红十字人还注意运用群众语

言。如在宣传种痘时,为劝告群众来种痘防天花,有的就使用了“不种痘,得天花,侥幸不死,落一脸大麻子,怎么找对象?”及“变成了麻子脸,未婚妻要与你退婚的”^[11]等宣传话语,产生了较好的成效。

(二) 深入群众的生活

走群众路线,还必须深入群众的生活。如安岳县分会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中时刻着意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在宣传婚姻法时,即向群众讲要有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必须有健康的身体,也就必须讲究卫生。宣传农业增产时,就说要搞好生产就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和足够的肥料等。每逢星期日还用挂图解说、花鼓、莲花落、金钱报等方式做街头宣传^[12]。这样的宣传方式直白易懂,群众易于接受,推动了运动的顺利开展。又如安阳分会为配合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开展“六净五灭一捕”工作,先后在市区各街巷及城外近郊地带出动五天街头宣传,内容有消灭美帝细菌战等快板及“大扫除”歌剧、活报剧“审问虱子”、相声“灭蚊”等节目^[13]。这些文娱活动极大增强了卫生宣教的成效。1953年,梧州市分会急救站在开展下乡注射活动时,为打破群众的思想顾虑,除举办卫生和会务图片展览

外,还放映幻灯、演出宣传防疫注射的卫生剧,这样,一面宣传,一面注射,做到了“宣传、工作两收益”。群众反映说:“有戏睇,有图片看,又得打针,真是一举三得。”^[14]

(三) 密切结合群众的利益

爱国卫生运动本是群众性运动,讲究卫生本是对群众有利的,但要真正使讲卫生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习惯”,还有待于卫生宣教同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宣传工作要用通俗语言并多举实例,说明讲卫生对生产的好处,群众才易于接受。例如:某分会包干的四个责任乡,过去猪在村里到处跑,街上拉满了猪屎也没人管。在卫生运动中,分会同志针对当地群众用河泥肥田的习惯和认为猪粪没有用的思想进行宣传,说明猪粪肥田的好处,群众懂得了这个道理,以后天天自动收集路上猪粪积肥。这样既对群众生产有利,又保持了街道清洁。还有分会组织了巡回医防队,深入农村做巡回医防工作^[15],在满足群众医疗需求的基础上开展卫生宣传,对郊区农民的医疗与卫生工作都起了推动作用。

红十字会的卫生宣教就是这样,百姓生活在哪里,剧场就在哪里。群众固然是受众,但他们更是社会教育的对象。宣教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指向,即革命—建设的时代主题。围绕这一主题,红十字会在卫生宣教的过程中,常将卫生与爱国相联系,宣称讲卫生就是爱国。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政治层面来看,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可以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红十字人在开展卫生宣教时,常会将美帝侵华的罪行加以展示。如1952年西安市红会在开展爱国卫生宣传时,还播放了《鸭绿江上血泪仇》和《美帝侵华史》等幻灯片。仅10月15日、16日两个晚上,就有1600多名观众观看了幻灯片,并纷纷表示“要响应政府号召,保证做好卫生工作,粉碎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阴谋”^[16]。这其实是红十字会有组织地介入,意在鼓舞卫生热情,进而达到爱国目的。

二是就经济层面而言,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是“增强人民体质、保护劳动力、提高

劳动效率的一项带根本性的重要措施”^[17]。基于此,红十字会经常强调卫生是保障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通过卫生教育达到鼓舞生产情绪的目的。北京市东四区于1953年先后举行了5次卫生讲座,“每次讲演之后,效果很好,群众都要求以后再讲”^[18]。通过卫生讲座的学习,工人增长了卫生知识,纠正了过去夜班随地小便和乱吃乱喝等不卫生的现象,减少了一般疾病的感染机会,进而使缺勤率也逐渐降低了。显然,红十字会意在通过卫生宣教去冲淡及改造旧的及不合时宜的内容,以“保障劳动大军的健康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能完成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任务”^[19]。

总体而言,红十字人大力开展卫生宣教的背后折射的是其对卫生爱国理念的认同和践行,旨在系统地向群众灌输各种卫生常识,逐步提高群众卫生文化水平,减少疾病,粉碎敌人的细菌战,同时增加生产,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少民众就是在红十字会卫生爱国宣传的感召下,主动加入红十字会投身爱国卫生运动的。

三、积极投入环境改造:与生产建设相结合

与卫生宣教相向而行的,是红十字人对“工作是最好的宣传”理念的践行。各地分会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下,采取“一面宣传,一面行动”的办法,发动广大群众积极投入环境改造运动,颇有声色。

环境改造包括个人清洁、环境卫生、强制接种、消灭害虫以及细菌检查等方面。清洁环境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在遏制和粉碎细菌战、保证国家胜利的战斗中,“清洁”成为一种特殊的作战方式,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刷牙、洗脸、洗手、打扫房间这些最日常、最生活化的行为,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价值^{[20][21]}。1953年,福州、芜湖等分会开展了帮助烈军属大扫除的活动。一位军属老太太说:“这样的热情,我只有写信给儿子鼓励他加强学习,多杀敌人!”^[21]

在这场“清洁”的战斗中,除害灭病也成了题中之义。当时普遍的口号是:“消灭一个

毒虫,就等于消灭一个美国鬼子。”于是各地分会以消灭病媒虫、防止传染病发生为主要任务,普遍推行挖蛹减蝇、清除病媒寄生处所和做好饮水卫生、预防接种等工作。安庆市分会组织了16个挖蛹大队,200多个小组,普遍开展挖蛹运动。常州市分会除挖蛹外还迁移了不合卫生条件的粪缸,粪缸加盖,在街道上清除无人管理的垃圾^[22]。万县分会组织儿童灭蝇队,有两个队在两个多月内捕蝇836730个,充分发挥了儿童在运动中的作用。预防接种方面,据部分分会统计,红十字会在改组后的2年时间内完成牛痘接种1811855人,霍乱、伤寒、鼠疫等注射1077226人次。此外,北京、天津、武汉等分会为推行防痨工作做结核菌素试验54681人,接种卡介苗21940人。为培养防疫工作的骨干,西安、开封、永城等30个分会训练防疫员、卫生员8514人^[23]。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任何可能存在病菌和导致疾病的地方都变成了战场,而“个体的卫生、环境的清洁等也与爱国、保家卫国、经济建设等国家政治经济联结起来”^{[20]121}。

红十字会的环境改造运动始终与生产建设任务紧密结合,致力于为生产建设服务。1954年,零陵县等九个分会,在工厂城镇积极开展春季爱国卫生运动。零陵县分会以“卫生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不能脱离生产单搞卫生,以搞好卫生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为总要求,先后在十个工厂开展了以工厂环境卫生、车间卫生及安全卫生检查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清洁运动,疏通了九条共长百余丈的阴沟,全厂环境焕然一新。不少分会将环境改造与春耕生产相结合,把清扫垃圾、环境卫生、疏通沟渠、整理厕所及畜廊与积肥结合起来。麻城县分会为达到增产积肥的目的,提出“屋内光、屋外光、田地光”的口号,在卫生积肥运动中共积肥121028担,值人民币68075000元;另外还打扫了64个公共场所,清除渣子6万担,新建厕所18个。高密县分会在运动中由村干部带头,家家户户进行大扫除,多积肥100多车^[22]。梧州分会提出“挖蛹灭蝇、消灭疾病、保证生产、抗美援朝”的口号,并通过订

立“卫生公约”、建立“爱国卫生日”等方式将运动常态化^[23]。

生产建设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为此环境改造必须注意不妨碍群众生产利益。这样运动才能受群众欢迎,为群众拥护。垫江分会在运动中帮助农民认识到,清除垃圾、污泥对丰产也有帮助,因而极大提高了群众搞卫生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垫江县二区太平村有一条60年以上没疏通的阴沟也被疏通了。群众说:“把这些污泥挑回做肥料比粪尿还好。”^[24]这些事实证明了卫生运动只有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也就是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才能搞好。只有当群众觉悟到卫生运动确实对他们的生产有利,才会真正自觉自愿地投入其中。

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通过卫生宣教和环境改造两方面活动来倡导爱国主义,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一方面,改造以宣教为手段。劝导民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必须善诱,即利用他们喜欢的东西和容易明白的事物去宣传。另一方面,宣教以改造为目的。宣教目的是改造环境卫生,卫生宣教应以不妨碍生产建设为原则。

总之,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红十字会,在党政及卫生部门的具体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都发挥了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起到了政府卫生部门助手的作用。红十字会急救员和会员都发挥了骨干和模范作用,成为有力的卫生宣传员和积极带头的卫生工作者。如北京市第五分会会员谢振福是全市捕鼠模范,以他为首组织捕鼠队,有力带动了捕鼠运动;开封市1956年在全市评选爱国卫生运动和除四害个人模范283名,红十字会员和卫生员就占到85%^[25]。这些基层红十字组织在发动会员及卫生员配合爱国卫生运动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已体现出红十字会是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基本力量。因此,红十字会被亲切地誉为“爱国卫生运动的有力助手”和“医疗防疫机构的耳目手足”^[25]。

四、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卫生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卫生工作的伟大创举,运动规模

之大、参加人数之多、收效之显著,都是空前的。该运动的开展具有双重的意蕴,既是“一项严重的对敌斗争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革工作”^[26]。这决定了爱国卫生运动绝不是一个临时的措施,而要常抓不懈,常态化开展。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及时消除了美国侵略者投下的各种毒虫毒物,而且大规模地消灭了各种传播病菌的媒介,普及了卫生常识,改善了环境卫生,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争。广大城乡的卫生面貌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爱国卫生运动显示出它“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伟大作用。就中国红十字会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表现和作为来看,红十字会充分发挥了“政府卫生部门助手”的作用,在提高民众卫生健康水平、保证国家经济建设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表明,当群众掌握科学卫生知识后,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仅据南昌市分会 1953 年不完整的统计,全市 2000 余红十字急救员在一年工作中,节省工时损耗所提供的生产价值约合 15 亿元^[27]。总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的成效广泛而深远。

(一) 普及卫生常识,提高民众健康水平

红十字会多样化的宣教方式对民众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广大民众逐渐认识到,“卫生”“健康”“生产”三者是分不开的,懂得了“搞好卫生少害病,身体健康多生产”,于是“人人动手,家家动员”^[23],有力推动了环境卫生工作。在江阴,里巷居民都能乐于接受卫生的措施,如预防接种和注射,并经常保持室内外清洁,自觉自愿地在粪坑上加盖,河里不倒马桶,集体送验大便以检查血吸虫等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妇女们对于新法接生的认识和信心也提高了,“接生和产前检查的数字,逐月不断地在增加着”^[28]。在汲县,居民环境卫生有了显著提高。“卫生工作搞得不够好的,平均只有一两户。各街清洁的户数已普遍增加。”^[29]在西安焦岱镇,赶集的老乡们都惊奇

地说:“焦岱镇变了样!”大家洗刷门墙,疏通水渠,修垫街道,迁移粪堆,用白土刷了锅灶,并商议订立卫生公约。妇幼卫生方面,大部分妇女都认识了旧法接生的坏处,自动要求学习新法接生的就有 154 人之多^[16]。在沈阳市铁西区,谭老太太听了红会的种痘宣传后,不由地感慨道:“我 75 岁啦,死倒不怕,可是不能因为我闹病,去传染给别人,所以不但叫家中小孩种痘,我自己也要种。”^[11]这说明红十字会的宣教工作,确是增加了民众的卫生常识,推动了卫生理念的广泛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除旧布新的话语体系和保家卫国的政治宣传交织在一起,使得个体的健康以及日常的清洁活动获得了全新的表述和意义,并与整个国家的政治联结在一起。“个体的身体已经不再是具体的身体而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是整个国家肌体中的基本细胞。”^[20]¹²⁰民众维持自身健康,直接指向的是国家政治胜利和经济建设的目标,因之成为一种爱国的行为和表达。

(二) 破除封建迷信,改造民众精神面貌

红十字会开展的卫生宣教活动也批判了封建迷信观念和漠视卫生工作的看法,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1953 年,江苏武进县马鞍乡的一个村子疾病流行,于是村子里传开了谣言,说是村外一个死水潭子里的水有仙气。于是“携瓶带罐的求‘仙水’的人们,络绎不绝,废时失事,贻害病人”。为此,县里派了武进红十字分会的八位同志下乡给村民治病。他们白天片刻不停地给患病的人们治病讲道理,晚间更分别到各个村子里去放映土电影(幻灯),介绍科学的卫生常识。红十字会卫生工作组进村后仅仅十天时间,死水潭子可以治病的谣言就像是个“历史上的陈迹”^[30],很快被遗忘而不再有人理会了。青浦县东朱舍村夏阿五宝在新中国成立前大儿子患头痛,当时只知求神吃仙丹,花了许多钱还瞎了眼睛。夏阿五宝看了展览会,激动地说:“毛主席比爷娘还要好,教我们懂得了卫生,再也不会迷信了。”^[9]孝感县

有一个村于1953年患疟疾和大肚子病死亡的有10多人,但村民很迷信,不愿意搞卫生,认为“乡里人离屎不能吃饭,讲不成卫生”^[24]。更有甚者,他们认为村里死人是因为修堤把地脉挖断了,所以竖立了三丈多高的制地气符牌。针对这种情况,分会工作人员从正反两方面向村民宣讲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比如不讲卫生会致病的原理,而讲卫生则会促进生产的道理等。这些宣教有力地帮助村民破除了迷信思想,促使他们开始认真搞卫生。

广泛深入的群众卫生运动,有力改变了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集体主义思想,破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卫生的迷信观念。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的社会新风尚逐渐形成,讲卫生也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行动和日常生活习惯。

(三)加强民众对红十字会的认同,改善党群关系

各分会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紧密结合红十字会的性质、任务和发展方向进行宣传,“以改变旧红会在群众中遗留的不良影响,使群众认识新中国红十字会的性质、任务和方向,使群众感到参加新红十字会可以更多地为群众卫生工作上,为人民、为乡里、邻居服务的光荣”^[31]。有些人过去对红十字会不够了解,看过展览“知道了红十字会是人民自己的组织”,还有群众纷纷反映说:“红十字会是好卫生团体。”^[32]西安市分会乡村巡回卫生医防队的爱国卫生运动,激发了民众对红十字会的好感和认同,不少民众发自肺腑地说:“人民时代的红十字会变了样,不但给我们放映幻灯,还给我们讲说卫生常识,我们一定要争取当一个红十字会会员。”^[16]

作为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红十字会的作为是政府形象的一面镜子。伴随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广大民众充分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的重视和关怀。1953年“六一”儿童节时,郾县分会举行卫生图片展览,对儿童及家长宣讲妇幼家庭卫生常识和疾病预防知识,并为600多名儿童开展免费医疗。群众对人民政府称颂有加:

“从前孩子们都没人关心,谁理呀。现在人民政府这样的关心,真是为人民服务啊。”^[33]许多妇女反映说:“毛主席爱护我们妇女,保护小囡,新法接生好处说不完。”^[9]1953年,当红十字会的医生治好费老奶奶孙儿的肺炎后,费老奶奶感激地说:“谢谢毛主席救活了我的孩子。”^[30]这些朴素的话语,直观反映了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加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爱戴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拥护。

毋庸讳言,在爱国卫生运动的推进过程中,部分红十字会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存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强迫命令、追求形式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例如部分分会错误地把卫生工作看成压倒一切的中心,时有强迫农民大搞卫生运动、耽误生产的情形发生。例如,陕西华县人民卫生院干部张明轩为要创造“卫生模范村”,将贫农长到五、六寸的麦子地平作粪场;为了“好看”,竟在农忙季节逼着农民白天黑夜地跑30里远的地方去挑蓝土刷墙;在农民经济困难的春荒时节,命令农民去买口罩;用砖砌茅坑^[34]。这些做法显然违反了群众的利益。有些分会热衷于形式主义,喜欢一刀切,以获得一些表面成绩和数字为满足;有些分会不顾积极分子的生产和生活,专注报道其“全不顾自身的生产和生活,从早到晚只搞卫生”^[15]。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使群众觉得卫生运动对他们有好处,反而会感到卫生运动“不胜其烦”,妨碍生产,卫生运动自然也就难以在群众中生根。这些负面事件启迪我们,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必须走群众路线,时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任何“想当然”的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作风,都将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革命与建设的时代主题下,红十字会紧紧围绕服务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使命,投入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其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与生产建设相结合,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一场运动。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爱

国卫生运动的考察,我们不难得出卫生爱国的日常路径:首先,就动机而言,卫生是抓手。作为实践主体的中国红十字会是人民卫生救护团体,其投身这场运动虽是基于自身职能定位和性质,但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爱国。其次,就方式方法而言,卫生是载体。这场运动以卫生宣教和环境改造为手段,体现了知行合一的理念,爱国建国主题始终贯穿其中。最后,就社会效应而言,卫生推进了爱国。这场运动在国家“清洁”的主导下,成功达成了社会的改造和国民的再造,确实助推了爱国建国事业。概言之,此运动以卫生爱国为动机,以宣传为枢纽,从实践主体、方式方法和社会效应诸方面,拓展出一条卫生爱国的日常路径。此路径为国人提供了一个表达民族主义和投身爱国事业的有弹性的平台。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参与红十字会成为普通中国人日常实践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种方式。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产生的社会力量,重新界定和规范了民族主义,也借此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一项成功实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爱国卫生运动的微观研究,为我们透视卫生和爱国的关系提供了一扇窗口。这对新时代深入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不无启迪。爱国卫生运动是我们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要继承和发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强化社会动员。历史是一面镜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爱国卫生运动启示我们在推进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大力发挥社会组织的潜能,积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从而使爱国卫生运动深入人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防御美国侵略者的细菌战,人人都来参加爱国的卫生防疫运动[N].人民日报,1952-03-23(4).
- [2] 吴玉才.1949—1956年间的中国[M].北京:

- 人民出版社,2016.
- [3] 发刊词[J].新中国红十字,1950(1):1.
- [4] 李德全.新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方向与发展步骤[J].新中国红十字,1951(5):14-15.
- [5] 胡兰生.一九五四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展望[J].新中国红十字,1954(36):9-10.
- [6] 贯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对红十字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J].新中国红十字,1953(25):3.
- [7] 王立章.卫生宣传是红十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J].新中国红十字,1954(39):4-5.
- [8] 阅河南奇荒铁泪图书后[N].申报,1878-03-15(1).
- [9] 青浦县的爱国卫生展览会[J].新中国红十字,1954(42、43):27.
- [10] 李万杰.孝感分会利用实物宣传效力大[J].新中国红十字,1953(31):20.
- [11] 正确地进行卫生宣传工作[J].新中国红十字,1951(12):6.
- [12] 袁大可.安岳县分会积极配合爱国卫生运动[J].新中国红十字,1953(30):30.
- [13] 张页.安阳市分会四、五月份工作动态[J].新中国红十字,1953(30):29.
- [14] 廖寿桂.一面作卫生宣传一面进行预防注射[J].新中国红十字,1953(31):20.
- [15] 密切结合群众利益是开展卫生运动的关键[J].新中国红十字,1953(28-29):4.
- [16] 周克任、艾庄.西安市分会乡区巡回卫生医疗队的乡村爱国卫生工作[J].新中国红十字,1953(25):10-11.
- [17] 干干净净迎国庆[N].人民日报,1958-09-11(2).
- [18] 杨瑞娟.北京市东四区试办卫生讲座[J].新中国红十字,1953(25):16.
- [19] 金宝善.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劳动人民的健康[J].新中国红十字,1954(36):9-10.
- [20] 胡宜.送医下乡:现代中国的疾病政治[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
- [21] 春季爱国卫生运动中的优抚工作[J].新中国红十字,1953(27):11.
- [22] 各分会积极在工厂、城镇展开春季爱国卫生运动[J].新中国红十字,1954(40、41):14-15.
- [23] 中国红十字会两年工作总结报告[J].新中国红十字,1953(26):8-12.
- [24] 卫生运动必须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J].新中国红十字,1953(28、29):5-6.

- [25] 伍云甫.加强红十字会工作,开展群众卫生活动[N].人民日报,1957-04-10(7).
- [26] 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相结合[J].新中国红十字,1953(24):8-9.
- [27] 李德全.纪念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五十周年[J].新中国红十字,1954(44,45):5-7.
- [28] 江阴县分会青阳医院及保健站展开卫生宣传[J].新中国红十字,1953(24):38.
- [29] 冯钟勤.汲县分会进行季节性的卫生宣传[J].新中国红十字,1953(34):29-30.
- [30] 红十字会卫生工作组帮助我们破除了迷信

- [J].新中国红十字,1953(30):11.
- [31] 总会关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J].新中国红十字,1953(25):4-5.
- [32] 当涂分会做了防治血吸虫病宣传[J].新中国红十字,1953(34):30.
- [33] 郟县等分会“六一”儿童节举行儿童健康检查[J].新中国红十字,1953(30):28-29.
- [34] 卫生工作必须与生产结合[J].新中国红十字,1953(30):14-15.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78 页)

- [21] 魏雷,钱俊希,朱竑.旅游发展语境中的地方性生产:以泸沽湖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9-109+190-191.
- [22] 刘晨,朱竑,安宁.文学旅游地的社会文化建构:以凤凰古城为例[J].旅游学刊,2014(7):68-76.
- [23] ANDERSON J. Relational places: The surfed wave as assemblage and convergence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2(4): 570-587.
- [24] JONES M. Phase space: Geography, relational thinking, and beyond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4): 487-506.
- [25] 洪如玉.教育新思维:地方教育与地方感[J].北京教育(普教版),2017(9):14-17.
- [26] 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奇,张茂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 [27] 洪如玉.从地方教育学观点探讨跨议题融入课程与教学[J].课程与教学季刊,2016(2):83-102.
- [28] STEELE F. The sense of place[M]. Boston: CBI Publishing, 1981.
- [29] JACKSON J B. A sense of place, a sense of time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30] BOURDIEU P, WACQUANT L J D. 实践与

- 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 [31] JOHNSTON R J. 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91 (2): 131-147.
- [32] 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33] 董慧.理解空间的三条批判性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5):134-142.
- [34] CARR W, KEMMIS S. Becoming critical: Knowing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M]. Melbourne: Deakin Press, 1983.
- [35] BIAO XIANG. The Nearby: Scope of seeing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2021(2):147-165.
- [36] 张乐天.“附近性”视角下的城市更新策略研究——以长沙西长街片区为例[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21.
- [37] 李旭,陈晓彤,宋洪勤.“足之所至”与“附近”视域下儿童社区生活空间重构的底层逻辑[J].幼儿教育(教育科学),2024(5):30-34+51.

(责任编辑 师 语)

布热津斯基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薛 鹏 程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福建厦门 361027)

[摘 要] 战略互信是冷战时期中美两国营造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局面的重要条件。从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 年布热津斯基访华前,中美战略互信经历了一个由初步建立、逐步削弱到跌入谷底的过程。为应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卡特政府基于战略、政治、经济和个人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做出了派遣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决策。在筹划访华方案的过程中,美方积极弥合内部分歧、调整对华策略,将此次原本定义为“初步通告”型的访问升格成一次包含全球战略和正常化问题的全面、正式磋商。通过访华,中美就“反霸”、正常化、涉台政策和全球战略平衡等问题达成战略共识,不仅基本重塑了两国的战略互信,还大大加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关键词] 布热津斯基访华; 中美关系正常化; 美国对华政策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104-08

一般而言,战略互信是指国家间为了减少或消除因彼此战略意图、战略能力和重要行为产生的错误判断,采取共同努力塑造良性认知以降低冲突风险而形成的一种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的信任关系^[1]。当两个国家在追求自身核心利益的过程中理解对方意图并相信对方以“非零和博弈”和互利共赢为主要目标时,战略互信便应运而生。而通过加强高层往来、保持战略对话和凝聚战略共识则成为增进两国战略互信的有效途径。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两国为了应对和防范苏联霸权主义的共同威胁,通过缓和关系、发布公报和进行军事合作等方式形成了事实上的“准联盟”关系,两国战略互信的“红利”初步显现。但随后由于美方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以下简称“正常化”)方面的摇摆与观望,直到卡特政府上台前两国在战略互信领域不但没有取得

突破,反而有所削弱。尤其是 1977 年 8 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期间在正常化及中国台湾问题立场上的“倒退”,不仅严重损害了双边关系,还使得两国的战略互信跌到谷底。在苏联扩张主义咄咄逼人的情势下,筹划派遣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便成为卡特政府重塑中美战略互信、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的重要抉择。当前,国内外学界对美国 1978 年 5 月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已有所着墨。但受档案解密年限及研究关注点差异所限,当前的研究成果要么侧重于访华的历史性阐述,要么只是在论述美国对华战略或政策转变时略微提及。部分学者对访华前后中美战略互信的演变轨迹、访华方案的筹划及访华对两国战略互信的影响等方面虽有阐述,但仍不够全面、充分。本文将利用美方新近解密档案,以“战略互信构建过

*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利益博弈视角下的中美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9CDJJ01)。

[收稿日期] 2025-03-16

[作者简介] 薛鹏程,男,福建漳州人,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历史学博士。

程中的中美互动”为研究视角来探讨布热津斯基访华与正常化期间的中美战略互信问题。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迟滞与布热津斯基访华的缘起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冷战结束,通过战略接近来应对苏联的全球扩张趋向是中美关系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可以界定为“共同威胁驱动”下的双边关系^[2]。但面对极强的合作需要,中美之间并没有迅速建立起较为稳定的战略互信,而是开始了“步步为营”式的相互试探。

如果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9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前中美两国毫无战略互信可言的话,那么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则开启了两国互信领域解冻的大门。双方迅速结束敌对状态,转而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与挑战。随后尼克松访华期间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保证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并向中国做出五点承诺的做法意味着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与中方达成“底线共识”。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海联合公报》则展现了双方共同的战略基础、利益汇合点及广阔的合作前景^[3]。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我们(中美)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盟友”^[4]²⁰⁴。对此毛泽东回应道,“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作什么 friendship(友谊)”^[5]。毫无疑问,这里的“友谊”意指战略合作。这也是中方第一次用“友谊”来形容中美关系,标志着双方在战略领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可惜好景不长,尼克松在访华三个月后即访问苏联,开启了美苏缓和予以对冲。此外,尼克松在中国台湾问题上总是“脚踏两条船”,多次向台湾地区保证“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据统计,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4年其辞去总统职务,美国行政当局在不同场合保证美国继续履行其对台湾地区的安全义务达52次之多^[6]¹³⁶⁻¹³⁷。以上做法被中方视为“踩着中国肩膀去接近苏联”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表现,两国的战略互信也因此受到了削弱。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继任者福特决定访华以保全中美关系既得成

果。11月,福特派遣基辛格访问中国,提出美国愿意按照“日本模式”实现正常化,但需要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问题,并同意美国在台设立“联络处”^[7]¹⁶⁻¹⁷。邓小平当即指出,这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方案^[8]²⁰⁶⁹⁻²⁰⁷⁰。同年12月,福特本人访华,其不愿意放弃支持台湾地区,也不愿意在大选的敏感期内与中国建交,只是再次做出下一任期实现正常化的承诺。而对中国而言,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在正常化问题上不信守承诺,都让中方的对美缓和政策无法收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导致中国在不满中深刻怀疑美国的动机。为防止美国玩弄“中国牌”而捞取战略收益,美方提出发表联合公报提升中美关系以对苏联施压等要求都被中方拒绝^[9]⁴⁰。毛泽东对此评论道:“在我看来,两国间目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今年、明年或者后年,两国间都不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10]可见,中国已准备维持中美关系现状,直到美国愿意为实现正常化做出必要的妥协^[11]¹⁰³。因此,福特并没有完成重塑中美战略互信的任务,反而因美方无理推迟中国艺术团访美、“达赖事件”和中国市长代表团访美等事件加剧了战略互疑。于是,重建中美战略互信的任务就落到了卡特身上。

1976年卡特上台后,万斯对华对苏“二元平衡”的观念使“苏中等距离”政策在卡特轻视中国战略地位的偏执下迅速贯彻执行,造成了正常化在其任内的首次推延。在1977年1月,美国政府第一次开会并按照重要性列出其亟待解决的16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中美关系^[12]²⁶。而延缓正常化并没有促使美国在对苏缓和外交中取得有利进展,反而助长了苏联的对外扩张态势。于是,卡特重返“联华抗苏”战略轨道,决定派遣万斯访华来试探中国在正常化方面的态度与底线。但万斯针对中国“断交”“废约”和“撤军”建交三原则提出的“将通过‘立法调整’维护未来美台安全关系、‘倒联络处’方案和发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单方声明时不受反驳”的颇具“倒退”

性质的三大反建议均遭到了中国的拒绝^{[12]170-174}。此次访华虽扩大了双方的交流,但就其成果来看,明显是失败的。其立场不仅是对福特政府“在台不保留官方机构”承诺的违背,更退回到“1974年11月基辛格首次提出时邓小平便已经拒绝的观点”^{[13]74}。访华结束后,万斯夸大访华成果以争取对苏谈判筹码的“宣传游戏”再次受到了中方的有力驳斥。1977年9月,邓小平在接待日本代表团时表示不能让万斯“欺骗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了美国人民。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14]199}美国再次不信守承诺和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逾越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与底线,导致两国的战略互信跌到谷底,并造成了正常化进程的再度推延。

应当说,在万斯访华后的正常化停滞期内,美国最主要的目标是在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创造一种“齿轮”效应来增强其政策影响力^{[12]325}。基于国际关系格局、战略、政治、经济和个人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卡特认为应加速推进正常化进程,“以寻求与中国事实上的战略联盟”^{[15]346},并最终做出了派遣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决策。首先,在全球战略上,苏联在欧洲加紧部署战略武器,并在第三世界大肆扩充势力范围,威胁全球政治、军事平衡。美国意识到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才能向国际社会表明“苏联的行径不可能完全不受惩罚”^{[12]301},而接近中国恰是提醒其在东方存在“弱点”的一张王牌。再加上此时中苏关系似乎有了些许缓和的迹象。1977年秋,中国派遣王幼平担任空缺已达18个月的驻苏大使,并派遣外交部部长黄华出席原本均由副部级官员参与的苏联国庆日活动。中苏接近的一系列迹象强化了美国的冷战危机感,使得“正常化不能被孤立地考虑,而必须与对苏联政策共同设计”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12]325}。在外交领域,作为美国对苏政策中心环节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迟迟未果,而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以对苏开展人权外交的做法则使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卡特急需调整对华政策以对苏联施加压力。其次,在经济领域,美

中经贸关系因不具有正常的外交关系大大受限,而中国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让卡特看到了彻底解决中美某些经济问题和帮助美国人民分享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的机会。再次,官僚政治和卡特对国内政局的考虑也成为正常化的重要推动因素。国会中亲台分子的舆论造势迫使卡特在决断中美关系时面临“官僚主义”的问题,如不抓紧1978年秋季国会选举和1979年大选前国会面临人事调整、难以组织反击力量的“机会窗口”推进正常化,“届时正常化的每一步行动都要依据每个机构的着眼点进行斗争”^{[12]234},中美建交将更加困难。最后,个人因素也对正常化起到了推动作用。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利用其与总统的特殊关系积极宣传正常化的意义并寻求参议员、商人和记者对其建交立场的支持。国防部长布朗、副总统蒙代尔及布热津斯基的副手奥克森伯格多次向总统建议推进中美关系。而第三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盖茨、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爱德华·肯尼迪和克兰斯顿等,以及部分学界精英都积极呼吁正常化也对布热津斯基访华决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16]215}。

由上可知,中美两国在尼克松时代就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战略互信。但当时中方的战略目标是提升中美关系以弥补对苏战略上的弱势处境^{[9]39}。而美方推动正常化的直接目标却是将其作为缓和美苏关系并解决越南问题的一张“中国牌”^{[17]108-109}。国家实力悬殊和战略意图的错位导致中美战略互信具有相当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并在福特乃至卡特执政初期经历了一个长时间难以突破,却又逐步削弱的过程。好在保障国家安全、寻求政治经济协作和个人推动等因素促使美国再次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战略作用。筹划布热津斯基访华以调整对华策略,进而重塑中美战略互信以加速正常化进程在此时势在必行。

二、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的筹划

1977年8月,美国派遣万斯访华使当时的中美关系跌入谷底。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布热津斯基开始谋求自己的访华之旅。10月22

日,在为中国外交部欧美司副司长钱大勇举行的告别晚宴上,奥克森伯格暗示“布热津斯基正考虑其东亚之旅……但如果没有得到正式邀请,是不愿意访问中国的”^[18]。由于布热津斯基的“反苏”世界观人所皆知。同时,他对国际局势的某些判断又与中国领导人看法接近,中方遂通过两个渠道传递了这一邀请^{[19]356}。11月3日,蒙代尔在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时,黄镇趁机在会议上公开询问布热津斯基是否愿意到中国访问。布热津斯基立即表示访问北京“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2]260}。

布热津斯基的访华提议在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一场围绕“其是否访华及访华人选”的官僚政治角力。当时,万斯极力反对布热津斯基访华,称“当下访华易致外界误解美中关系将实现正常化”^{[20]204}。其深层考量在于,一是担心国务院对华政策主导权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夺走;二是访华可能会干扰对苏缓和战略,会让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更复杂。基于此,万斯提议由副总统蒙代尔访问远东时顺道访华。后来,万斯对布热津斯基和蒙代尔访华都心生疑虑,甚至默许国务院偷偷向苏联透露访华消息,以削弱访华效果。布热津斯基对此既恼火又困惑,认为国务院此举是在“破坏访华推动关系正常化的目的”,还可能加深中国对美国正常化动机的猜疑^{[12]355-356}。

1978年2月8日,布热津斯基向卡特指出,美国未利用中苏敌对机遇拓展美苏谈判,已成损害美国全球战略地位的“三大关键态势”之一。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埃塞俄比亚问题还未解决之时,访华能彰显美国与北京发展关系的决心,毕竟两国关系源于对苏联侵略政策的共同关切^{[12]289}。27日,布热津斯基再次建议卡特派自己访华,称从维护美中苏三角关系战略高度看,其重要性远超中苏关系;且非洲之角的局势需美国向苏联传递敏感信号。卡特虽未立即同意,但表示“本周内会做出决定”^{[12]295}。此时,国防部长布朗开始积极支持布热津斯基访华。3月11日,布朗指出,

要让苏联为在非洲的“冒险主义”付出代价,关键在于找到能让其损失更大的行动^{[12]300}。他还认为,利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影响力,有助于挫败苏联在非洲的扩张野心;此外,访华推动正常化,会被视为对抗苏联之举,让反对者也能接受^{[12]300-301}。13日,《亚洲政策调整的建议》报告指出,美国要让苏联在全球战略平衡中付出代价,提醒其在东方战略的弱点^{[12]302}。报告还认为,推动正常化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可对苏联在非洲的冒险行动做出回应,促使保守派从战略上支持;二是增强美苏合作意愿,推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三是打出“中国牌”可促使中国在亚洲奉行“不称霸的温和政策”,限制苏联军事实力转化成影响力^{[12]304}。至此,卡特政府内部达成共识,决定摒弃“苏中等距离”政策,采取对苏强硬立场,借正常化向苏联施压。3月16日,第一阶段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获国会批准,消除了卡特推进正常化的部分顾虑。当日,卡特宣布让布热津斯基访华,“若双方同意,最好下个月成行”^{[12]309}。4月18日,第二份运河条约通过,美国确定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间。26日,白宫和国务院宣布,布热津斯基将于5月20-23日访华^{[12]350}。至此,卡特派遣布热津斯基访华的决策终于敲定。

在访华的筹备期里,布热津斯基一直在鼓动卡特推进正常化。5月5日,其向卡特阐明,如果再不以某种方式关注正常化,结果将会适得其反——访华将被中国怀疑为美方只想利用磋商来对付苏联^[21]。10日,布热津斯基建议卡特以“日本模式”完成正常化,并建议自6月起开始与中国进行谈判^{[12]358}。至此,卡特倾向于让布热津斯基与中国直接商谈正常化,并决定在谈判后期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议完成正常化并发布公报^{[12]359}。12日上午,卡特表示希望加快正常化,把此次访华视为正常化的“初步通告”,并授权其在“中方不反驳美方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声明”和“美国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两大条件下实现正常化^{[20]207}。17日,卡特正式下达访华的指示,希望能在扩大与中国的商业、文化和战略领域

交流的同时顺便评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情感素质,进而鼓励中国参与挫败苏联扩张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此外,卡特还要求布热津斯基向中方表明,美国在正常化上已经下定决心。其将进一步减少驻台美军,继续放开对中国技术转让的限制、增加直接来往和邀请中方派遣商业、军事代表团访美等^{[6]211}。更为重要的是,卡特要其向中国重申“五点承诺”并接受中国针对台湾问题提出的“断交、撤军和废约”建交三原则,这标志着美方在正常化立场上重回万斯访华前的“最低限度”方案。

除此之外,为充分探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及表明美国联合中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决心,布热津斯基的访华团队中还囊括了一些向中国介绍国际战略态势及赞成推进中美建立军事关系的专家。如苏联问题专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国详细介绍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略平衡的分析报告;还有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其任务是介绍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具体部署情况,并决定向中国提供苏联设施的实际侦察照片;另一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本杰明·休伯曼则力图向中国展现中美科技交流的前景,包括联合收集反对苏联的情报等^{[13]87}。而在访华方案中,卡特要求布热津斯基向中国强调其不会面临“超级大国勾结”的保证也可视为美国在战略领域赢取中国信任的积极努力。

就这样,布热津斯基访华方案在战略、政治、经济及个人等因素的交织下经历了一个由评估到部分磋商,再到全面磋商的过程。基于东亚政策评估和对苏联威胁的再审视,布热津斯基与布朗等人结成“盟友”,共同挫败了万斯基于争夺对华政策制定权而阻挠其本人访华的企图。带着重塑中美战略互信和实现正常化的外交使命,布热津斯基于5月18日踏上了前往中国的道路。

三、布热津斯基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1978年5月20—23日的布热津斯基访华是中美关系的一次“突破”之旅。访华过程

中,黄华、邓小平与华国锋分别与布热津斯基就“反霸”、正常化、涉台政策和全球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磋商与交流,基本重塑了中美两国的战略互信,并大大推进了正常化的进程。

首先,中美确定了在维持全球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基础上共同抵御苏联威胁的“反霸”战略共识,并就一些相关问题互通战略意图。在黄华与布热津斯基的会谈中,美方提出在全球和地区霸权问题上,双方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长期的战略关切,其目标旨在塑造一个不受单一国家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12]396}。因此,面对苏联共同威胁,中美应该再次合作^{[12]393-394}。中方则提出苏联是最危险的战争根源,争取世界霸权是其既定战略目标,而美国是其主要对手^{[12]411-412}。中美必须联手共同对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针对美国担忧潜在的中苏缓和,邓小平指出,苏联营造中苏和解的印象,主要是想利用中国为棋子,以便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多东西。其意图是欺骗世界人民,掩盖其扩张主义倾向。华国锋则以目前“中国对苏政策不会改变”来给美国吃下一颗定心丸^{[12]411-412}。针对中国批评美国惧怕苏联、对苏软弱和“绥靖”倾向只会膨胀苏联霸权野心的说法,美国则辩解称,其对苏政策必须是“将持续的政治竞争与偶尔的迁就合作”结合起来,中方不能把这种偶尔的迁就误解为结束敌对状态。且中方提出的“美国政府放弃研制中子弹的决定是对苏联的让步”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根本没有中子弹这种东西^{[12]428}。此外,中方经常批评美国绥靖苏联,尽管主观动机是好的,但客观上却会增强苏联的力量。

应该指出的是,双方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印度支那半岛上达成的战略共识也可视为中美国际“反霸”联合行动的一部分。中日建交后,双方就该条约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担心条约中的“反霸”条款会得罪苏联。而中方则认为该条款不仅能改善日本的战后形象,还有利于增强日本抵御苏联的压力。对此,布热津斯基表示“苏联如果

没有霸权主义的野心,就没有理由反对反霸权条款”^{[12]457},美方不会为缔结条约设置任何障碍,并暗示日本首相福田近期已经就缔结条约的可能性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且美方正利用其影响来推进中日关系,包括缔法条约。对于华国锋“希望福田能早日做出决定”的陈述,美方则回应道“我们会鼓励他的”。果然,布热津斯基在访日时重申了美国决心与中国发展更加强有力的关系,且暗示中国已经同意“强大的美日关系对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观点,并就中日签署条约表达了一种“前瞻性的态度”。布热津斯基的暗示明显给日本壮了胆,3个月后,该条约终获签署。在印度支那地区,美方担心该地区可能成为霸权主义的策源地,反对建立一个由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联邦。中方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柬越冲突的根源是越南想要在该地区谋求霸权的野心,其背后是苏联^{[12]419}。与此同时,中方指出虽然蒙代尔访问东南亚有利于延缓苏联在该地区的渗透,但其发布的针对柬埔寨问题的讲话“实际上是将所谓的人权问题变成一个大问题,此举构成了美国与苏联行动的协调。美国过去曾经入侵柬埔寨,因此在人权问题上,美国没有发言权”^{[12]420}。对此,美方则辩称称其不打算助长越南对柬埔寨的野心,人权也不是中美存在分歧的主要问题。

其次,中美在正常化及中国台湾问题方面的磋商也大大促进了两国的战略互信。在访华过程中,布热津斯基向中国承诺美方在正常化问题上“已经下定了决心”达八次之多。中方再次表明:解决正常化问题要满足“日本方式”,即“断交”“废约”和“撤军”三原则后可以保留美国与台湾地区的非官方关系和民间往来。“如果美国政府认为是时候下定决心了,那么我们双方可以在任何时候签署有关正常化的文件。”^{[12]433-436}布热津斯基则指出,“只有一个中国”是解决正常化问题的根本基础,美国依据《上海联合公报》的原则行事。其奉命向中方确认美国接受建交三原则,重申前两届政府对中国的五个承诺,并表示卡特有足够的耐心“在国内承担中美之间悬而未决

的政治责任”。布热津斯基甚至列举了《巴拿马运河条约》和美国向中东出售飞机两个例子来表明卡特总统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如该条约刚开始时100名参议员只有26人支持,只有8%的民意支持,向中东三个国家出售飞机在参议院和民间也有非常多的反对声音。结果运河条约以68比32获得通过,军方也获准向中东出售飞机^{[12]435}。但他同时也指出必须能找到某种方式来表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期待,以防止美国军队在加紧撤出台湾时造成的“不稳定状况”被苏联所利用。对此,中方反对做出仅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认为美方在要求中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却又出售武器装备帮助武装台湾,这仍是制造“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或“两个中国”。“双方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去限制对方自由地发表陈述。”^{[12]435}然而,布热津斯基依然继续向中国提出美国需要克服一定的障碍,表示正常化并不会立即改变美国同台湾地区的关系,希望过渡期内美国同台湾人民保持“全面的”商业关系,暗示双方的“某些关系将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最后,双方还商定6月份在北京开始就实现正常化展开秘密谈判^{[12]438}。就这样,双方在涉台问题上达成系列共识,宣告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开启,正常化进程得以加速。但需要指出的是,美方用“与台湾保持全面的商业关系”和“某些关系将以某种形式继续下去”等极其隐晦的语言表达建交后美国将继续保持对台军售的立场使得军售问题的讨论延宕下来,并成为两国建交的严重阻碍。果然,在建交的最后时刻,双方又一次因军售问题展开激烈交锋,“谈判曾经因这个问题几乎失败”^{[22]227}。

最后,确立两国合作“反霸”及实现正常化的大方向后,中美还互相阐明了双方在维持全球政治、军事平衡方面的共识及分歧,以确保战略互信的最大化。如在朝韩对抗问题上,美方提出其无意从半岛撤军,无意参与任何削弱韩国政治稳定与安全的努力,但愿意参与三边会谈。中方则向美方传达朝鲜有意与美方进行谈判,“其不会对韩国发动战争”,希望韩

国也这么做,因为这将给苏修势力进入半岛带来困难^{[12]456}。在中东问题上,美方阐明其核心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反苏集团,中方与以色列建立关系符合双方反苏共同利益。而中方则拒绝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接触,强调美方因过于关注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而疏远了阿拉伯世界,这“正中苏联下怀”,决定中东未来的是一亿多阿拉伯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在南亚问题上,美方提出“应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成为主导者”,提出中印、美印改善关系可减轻其对苏联的依赖,并认为阿富汗问题是苏联破坏该地区稳定基础的前奏。中方则阐明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来解决中印双方的领土争端,同时指出美国因过度关注印度而忽视了巴基斯坦。在非洲之角的问题上,双方均同意苏联应该对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负责,并表示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反对一切扩张主义,支持非洲人民的正义斗争。

由上可知,布热津斯基访华重申了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共识,并就构筑全球反霸联合阵线及政治军事平衡问题进行磋商,澄清了彼此的战略意图,并极大地拓展了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访华中,美国第一次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且愿意满足中国的条件”使中国看到了美方的诚意,而中美建交谈判的开启则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入了正式的实施阶段,正常化进程得以加速向前推进。

总之,布热津斯基访华实现了中美战略意图交换,双方通过外交信号传递的方式共同将此次原本定义为“初步通告”型的访问升格成一次包含全球战略和正常化问题的全面、正式磋商。访华对中美双方凝聚共识、建立信任,进而形成战略互信并展开战略合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从维持全球政治、军事平衡来说,两国就“反霸”形成战略共识,成功地把苏联置于“美中苏大三角”关系的不利地位。中美“准联盟”关系形成的战略威慑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美方评估机构指出,此次访华“为建立长期、有益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12]456}。《纽约时报》称,“俄国人很紧张”,这对俄国人来说是一个有用的提醒,“他们不是大海里唯一的鱼”^[23]。而苏联官方宣传机构十分负面的反应也表明布热津斯基访华起到了良好的战略效果。塔斯社发表评论称,布热津斯基的目的是让美国在三方超级大国关系中获得优势,认为美国意图维持或加深中苏关系的糟糕状态。他们甚至威胁道:“越来越公开地宣扬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主义……这必然会在某些地方引起冲突。”其次,在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方面,中国在访华后立即公布了中越在华侨问题上的争端,向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国在对苏对越政策上已经达成了重要共识,最终使卡特决定在正常化前暂缓与越南建交^[24]。此外,访华也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成为《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一大促进因素。双方在朝鲜半岛、中东、南亚等地区性问题相互阐明战略意图,也有利于推动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最后,在正常化方面,布热津斯基多次传达美国在正常化方面的决心,双方在“三原则”和“五大承诺”等涉台政策领域达成“底线”共识。总之,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整个决策和实施过程“唤起了中国对正常化和通过美国应对苏联决心方面的期望,创造了一种向前推进的氛围”^{[12]462},并重塑了两国的战略互信。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战略互信并非基于国家间的道德与好感,而是根植于自身的国家利益。正如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时对卡特所言:“我们不是建议成立正式联盟,而是各自根据自己的立场行事,协调行动,采取必要措施。”^{[12]747-748}因此,在美苏三角关系的博弈中,美国对华正常化的政策“灵活性”常常取决于苏联威胁的紧迫程度和美苏关系的调和程度。这就使得中美战略互信在国家实力差距、两极格局及战略意图分歧等因素的制约下呈现脆弱和不稳定的特征。好在双方面临的共同威胁与拥有的互补利益成为两国凝聚共识并进行战略调整的基本出发点,两国并没有因意图分歧而摒弃战略合作。最终,在布热津斯基访华后,中美两国在以利益为基础的、具有实用主义特征的信任状态中完

成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进而“成了迈向共同全球政策的第一步”^{[15]491}。

[参 考 文 献]

- [1] 刘庆.“战略互信”概念辨析[J].国际论坛, 2008(1):40-45.
- [2] 朱锋.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3):4-26.
- [3] 尹继武.“单边默契”与中美战略合作的演进[J].美国研究,2017(2):28-49.
- [4] 孙德刚.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
- [5]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and China - U. S. relations with Mao Zedong [A]. February 17, 1973,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Item number: KT00677.
- [6] 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
- [7]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零四——一九七四):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 [9] 樊超.合作与共赢:蜜月期的中国与美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
- [10] Department of State. Meeting between Gerald Ford and Mao Zedong [A]. December 2, 1975, DNSA, Item number: CH00395.
- [11] 罗伯特·S.罗斯.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1969—1989)——在谈判中合作[M].丛凤辉,滕继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 [12]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of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III, China [M].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3.
- [13] MANN James H.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0.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七九):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15]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 [16] 杨贤.特殊机构:美国驻华联络处揭密[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 [17] TYLER Patrick.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M].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1999.
- [18]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mofrom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on Oksenberg's meeting with Chinese officials Tsien Ta-Yung and Yang Hsu-Chian [A]. 22 Oct. 1977. USDDO, Document Number: CK2349105741.
- [19] 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 [20] BRZEZINSKI Zbigniew.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83.
- [21] White House. Zbigniew Brzezinski summarizes his meeting with Massachusetts Senator Edward Kennedy regarding Brzezinski's forthcoming trip to China concerning U.S. Chinese normalization efforts [A]. 5 May, 1978, USDDO, Document Number: CK2349480156.
- [22] 梅孜.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G].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
- [23] White House. Foreign media reac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Zbigniew Brzezinski's trip to China to continue the normalization process with that country [A]. 20 May 1978, p. 1, USDDO, Document Number: CK2349580683.
- [24] 周聿峨,郑建成.布热津斯基访华与中越华侨争端的公开化[J].东南亚研究,2015(3):92-96.

(责任编辑 光 翟)

《道德经》造物审美意蕴探析*

高云庭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1189)

[摘要] 《道德经》是中国文化之世界身份的最高代表,在全书的思维模式、论述内容、言说方式中,沉融着大量观念和见解都极为深刻的造物审美思想。道、技、形浑然于器是审美的基础,器物之美表现为朴、实、无、和的审美特征,造物主体和造物对象均具有较为丰富的审美内涵。《道德经》中蕴藏的造物美学思想对中国古代造物与世界现代设计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道德经》; 道器; 审美特征;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5)05-0112-12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也是中国文化之世界身份的最高代表。作为人类最高智慧之珍果^[1],书中包含着哲学、技术、社会、伦理、艺术等诸多领域的深刻的文化观念和实践思想,是蕴藏丰厚的造物审美思想宝库。《道德经》文本(引自陈鼓应 2020 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老子今注今译》)中不仅有对造物审美问题的直接论述,并且在“天—地—人”一体观、“对立—循环”观的思想中,在以超越归本性、否定逆向性^[2]、整体和合性的思维方式中,在推天道(道论、德论)以释人事(社会论、人生论)的论述中,在自然事物规律、为人为事之道、社会国家运转的言说中,还沉融着大量有关造物之美的传统思想。言道托理、言人议法、言事指意、言物类象,精妙论说中的许多造物艺术观和美学见解都极为深刻。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21 章)是一个高度宏观总括又极富哲学意味且形象生动的造

物美学命题,旨要性、整体性、艺术性地描摹出了《道德经》的造物审美观,即感性现实中最完美的造物审美形象唯以“道”为转移。书中的造物美论皆围绕此而展开,道美、自然美、无为美是基本审美概念,关于器用、形态、技艺的许多审美诠释及内容论说,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理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立足于造物美学视角,从《道德经》文本出发,循着老子的思脉,结合造物的本体与对象,对所言及的造物观念和审美意向进行挖掘、梳理和阐释,试图系统性把握和探析《道德经》中有关造物美之思想内涵。

一、《道德经》的造物之道器

“道”“器”作为中国古代造物哲学中一对基本范畴的界定见于《周易》,含有关于形、用、意的含义,其精深的审美观念则成于《道德经》^[3]。老子的道器论是基于其道物关系的理论变体和文化延伸,在造物艺术层面,人为的合道的器与物在意义指涉上并无大异,就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基于二十四史《隐逸传》的传统隐逸主题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4AA003),2024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二十四史《文苑列传》‘名’与‘实’谱系研究”(项目编号:24FZSB036)。

[收稿日期] 2025-05-14

[作者简介] 高云庭,男,湖北荆州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白云学院环境设计研究院院长。

两者的美学诠释亦是一致的^{[4][5]143-156}。器物美的存在与发挥方式即是道的显现形态,这种价值是不可能脱离道的主体承载和意义评判而独立生成的,造物的事理要素、逻辑与更大的道的运转结构、秩序本质上相通。道器论是造物美学的理论基底与本然内容,道器形态自然而内涵深厚,是造物审美的主体与前提。

(一)造物之“道”

“道”是《道德经》造物论的中心思想^[6],它有两层属性含义:一是物质性的道,与具体事理物性相联系,即并不永恒存在的“非常道”;二是指存在于人事物之先的造物总根源、总法则^{[7]191,[8]79,[9]359},即永恒不变的“常道”。34章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庄子·天地》云:“行于万物者道也。”道充满于万事万物之中、之间及之外,贯穿于万世万方。道生物、成物、统物、通物,不出离于物又不拘泥于物。道是造物之“始”“母”“奥”“宗”“渊”,在品位上、在时序上都先于任何事物,也是统会一切殊理之大理,“万物殊理,道不私”(《庄子·则阳》)。道为理与物的混成之物,是造物世界里唯一绝对的、独立的、恒久的运转轴心,具有客观的、实际的、最高的生成和决定作用。

造物之道的“虚”“藏”“空”之“谷神”特性是创造之关键、玄机。微而不绝,存而不可见^{[10]7},勤而不倦,用而不穷竭,道好似“玄牝之门”(6章)般具有绵延持续、无限可能的创造力,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51章)其运作方式是无意识的、无目的、间接的、缓和的^{[9]358-359}。事实上,造物之道的本质即是“无”^{[11]55,[13]28},并兼赅“有”“无”^{[12]44-45,[13]20},无言道之体,有言道之用,道之无始器物,道之有成器物^{[14]95}。无、有作为中国古代造物本体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始见于《道德经》^{[15]75}。天、地、物是无显根源,人对器物的需求是有显根源。无是天、地、物、人交互生发与融合的生命境遇,有是天、地、物、人协同构建的器物本体。造物之道总是由相反的两方面组成,“反者道之动”(40章)是其内在动因和总规律:反向运化,返本复初,“周行而不殆”。(25章)矛盾双方对立统一,正反相生(初态)、相渗

(动态)、相化(变态)、相成(新生态)过程集结着孕化和创造,促使事理物性的存在与变化始终向着道这一原点“复归”“复命”“归根”,让正反双方在相兼、相济、相合中构成和谐互利的相若关系。

造物是由道到器物的生成、分化、演化、发展,42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展开自身而为“一”,在展开中孕化出“二”,即阴阳二气,阴阳交感、二气和合、天地氤氲为“三”,所含能量的释放过程便是造物的发生。这是一个循道而动、无有相生、阴阳运化、内外互为,由形而上到形而下、抽象到具体、简单到复杂的层层向下落实,故51章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道”为创物之由,器物由是而生,道分化于物而使其得本性之“德”,依据器的本性而可发展出独立的赋形之“物”,潜在于物内的势能与外在的环境条件是成器之“势”。器物之体、源、德、理、象、用、术、境皆依此而生,载道是造物审美的内在始源和形成基础。造物审美之道在造物活动中可析解为自然之道、人伦之道与事物之道等,它们是造物创造的动力、造物活动的规律、造物行为的准则。

(二)审美之“器”

人依道而主动创造的“器”是一类人造现象之物。同为被动存在物,器有别于宇宙生成秩序中自化的“天”“地”与“物”,它处于物理世界中演化生成的末位次序,属于自然现象之物的衍生物,亦是人为世界的一个重要起点。器物既具有物理世界的自然价值,也具有社会文化价值,它是链接形上之道与生活之道的具体而微的节点,造物的合理性和器物的安顿即是人文与自然的叠构与统合。器物具有人为的、体道的、物质的和意义的属性,是一个提供实用功能和外观形态的实存物,也是一个兼备着内涵本性与物理含义的意象载体,不仅在本然的意义上意味着一个生活的、制度的、人文的世界,也在应然的层面指向着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

合道之器,“其中有精”(21章)。《管子·内业》云:“精,气之极也;精也者,气之精也。”《庄子·秋水篇》云:“夫精,小之微也。”

最微小的原质“精”是“阴”“阳”“和”三气的本真要素。《说文》曰：“精，择也。”择其特异物“德”，使器物成之为器物。德是道对万物、社会和人的作用形式，“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51章）。德与道是有与无、多与一、用与体、显与隐、殊相与共相、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德既是道的赋性，也是器物的元、品、相，两者的内容范畴质性是一致的，皆谓之“玄德”^{[16]23}，后者应当是前者在器物上的体现。《管子·心术上》云：“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以然也。”器物的特性皆得于其精纯物德。《乐记·乐象》云：“德者，性之端也。”老子之所谓器之德即是后代之所谓器之性^{[17]92}。德养育和成就了器物的本性，德性的全分、好坏、是非是对器物的直接评判，德的正性表露决定了器物独特的存在价值。“德畜之”就是本性的发动，是凭借器物之所以为器物的内在根据的作用方式来实现的，不同的器物因各自独有的德呈现出不同的材料、技艺、功能形态。

器德惟精，本性惟真，“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1章）。真字古训诫、训天、训身^{[12]45}，《说文》曰：“信，诚也。”这些德性是极可靠的认知上的信物，都包含于框定器物的“名”。32章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制”即造物之“作”，在“朴”（道）散而为器之初始，即是有物德之本性内容的，器物含义相随而生^{[18]36}。器物因名而有分别、而显表自性，名与制规定了物性的界域和使用的限度。21章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个体的器物生死存灭，但其类名可以永存。说“车”“室”“服”，便可代表载人载物行路、室内活动空间、遮身御寒适体的一切表德。“众甫”即是器性的内理和器物之起始，人所以能识器，多因名的意义作用。“物固有形，形固有名”（《管子·心术上》），“形乃谓之器”（《周易·系辞上》），成“形”曰器，形与器同语连用。《庄子·天地》云：“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故德显在名，而化于形，名定在德，而藏于形，名与德皆常驻于器之形，它是造物成器的实在结果。形态承载的审美对象集合于器，它是造物美学的审美之物和理论客体，合德合名之器即是具备了审美价值的

器物。

（三）道器之“技”

老子主张的“大巧”技艺是有别于一般人为技术、技巧的造物之技。“大”是道的专用词，“大巧”即道巧，它的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建立在从道的基础之上，它的终极指向是“技进乎道”，故大巧技艺又曰道技。一般的造物技术往往破坏了事物的自然本性，是为巧而巧的人为之“巧”，实属小巧。大巧的造物技术遵从造物活动的规律，持存事理物性，最完整地呈现出器物的本然样态。它是对一般造物技术的否定和超越，但并不完全消解和排斥技之巧，所反对的是一切主观妄为的技术行为，不符合自然规律、破坏自然物性的技术内容，所认同的是与之相反的自然性技术与技巧。大巧之技有巧而不见其巧，追求的是夺天之巧、无巧之巧的技术形式，所以往往呈现出“大巧若拙”（45章）的技术形象。《说文》段玉裁注：“拙，不能为技巧也。”若拙一般的造物技艺虽拙而巧，似拙实巧，巧见于拙，似拙藏巧。拙与巧相互融合，由内至外不断地修正、调整技术本身，妨正转反地保持技术去小巧、从大巧的存在状态。大巧是最高层次的造物技术，具有更为精深、丰富的道技内涵和工巧所不及的技术形态和作用效果。

27章曰：“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疵；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键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河上公45章注：“如拙者，亦不敢见其能。”^{[19]62}造物之技和器物之技应存在感极低，技术功能的施展并不张扬。善为之大巧的理想状态是无迹于器物与技艺本身。有效地发挥技术的作用，但不必显露技术的痕迹，虽有可以创造出各种各样器物的技术和工艺，但不应轻易使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王弼45章注）^{[20]127}，唯实用性的造物技术不事修饰、不伤物性、不乱器德，技术逻辑是一个“绝巧弃利”（19章）、以善为质、技隐于用的施动过程。《庄子·天地》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智巧、机巧则必有“奇物”。奇技淫巧是不正之事、邪恶之事，所工之器是不合于道巧之器。真正的技之至者，能够在人工技巧和自然天全之间

寻得平衡关系,以最小的人为因素、最少的材料工艺、最简单的构造形态、最普通的功能技术,创制出器物应有的价值属性。

造物的大巧技艺构建在功能观与文化观之上,它兼具工具性本质和人的属性,含着技术的伦理与决定物性的德。技是道的展开,是器的途径,技是道与器的中介与勾连。“大成若缺”(45章)、“明道若昧”(41章)之状是大巧的技术表现和作用形式,它最为契合道的本质,也最能创构和发挥器的本性。名与实、德与理、物与象通过技术而达成统一。“道一技一器”是造物艺术的认知结构和基本评判体系,三者互为而浑然一体,道的本源与超然追求技艺的内敛与功用,表现事物的本来面貌及状态,进而决定了质朴而简约的形态。大巧是道的感性显性,道器之技天然的具有审美属性。造物的技术态度是一个重要的审美衡量尺度,造物技术美学范畴的器物必然是合道、合德、合名的审美之器。

二、《道德经》的器物审美特征

《道德经》造物艺术的合道本质决定了其器物审美的最高追求是一种自然的、自性的、本然的美。“道”所呈现的最佳状态即是“自然”“道性自然,无所法也”(河上公25章注)^{[19]36}。器物自然美是一种以素朴适用为美的造物观念、效果、价值,是器物存在与发展的最佳秩序和状态。人、物、理三个维度的德性价值之审美文化建构凝集于器,其本然如是的是审美对象具有朴、实、无、和四个方面的特征,它们是《道德经》器物美学的独特思想和意义范畴,包括了器用功能、意象内涵、技术形态、造型结构所必须呈现的道性内容,集中体现和反映合乎自然逻辑和适应需求的造物之美。

(一)“见素抱朴”的朴美

“素”是未经染色的丝,“朴”是未经雕饰的木。《说文》曰:“朴,木素也。”段玉裁注:“素犹质也。以木为质。未彫饰如瓦器之坯然。”器物美学中的素与朴字异而义同,皆指器物的本来状态与面貌。造物艺术所追求的这种朴素之美与道性之美是主从同构的关系,道器之性,“见素抱朴”(19章),器物的生成变化发展不断地向着道的“归根”“复命”亦是

指向“复归于朴”(28章)的稳态。朴可谓道的代名词,“道常无名朴”(32章)。“朴散则为器”(28章),朴是道器的内在本质和形式样态。形而上的道使朴器具有了高而宽广的审美境域,也向其赋予了极深刻的美学含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王弼28章注:“朴,真也。真散则百行出,殊类生,若器也。”^{[20]75}“真”是器物德的体现,未经人为修饰的原始性、生态性、功能性的朴美,是对器物本质与品性的完好持存。41章云:“质真若渝;”81章又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此处的两“言”字皆当作“者”解^{[21]324, [22]348}。故质真之器即是“信者”,“若渝”“不美”之象均是诚朴的表现。为了器物之德全与质真,依照实际需求而产生的造物结果往往包含着一些似有不足实则合理的成分。如实地展现事理物性的本然样貌,是朴器之真的根本特征。真而诚、诚而信,诚、信是朴的审美符号,是朴器的意象展开和美学含义。朴美是造物目的之自然美属性的最直接表达。

“敦兮其若朴”(15章),“处其厚者,谓处身于敦朴也”(河上公38章注)^{[19]53}。老子认为“朴”与“敦”的意义内容具有一致性,敦是朴的表现形式和品性特征,敦还含有诚、信之义。朴器会呈现出敦朴、敦厚的器物意象,以德性具足的样态给人以名符其实、性象饱满的审美感受。器之朴的诚、信形象内涵与敦、厚形态意象是相通的,都指向朴之真、素的艺术境域。看起来真实、敦朴、有信而不落于虚华是朴器美的品相。质淳之德谓器物之精,敦厚之信谓器物之诚。朴乃精诚之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朴其真性者,神动于物外。朴美是器物的诸多本元属性在简素中的统一,朴素、质朴、朴实、真朴都是具有广适性的审美判断概念。

朴素的造物不着人饰而求天饰,返璞归真地工于器物本然应有的样态,“既雕既琢,还归其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朴器不在于形式上的完美,而在于诚实朴素地展现器物的原本属性,大朴不雕,天趣浑然,疾伪尚真,臻于简素,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为其至美。器物的朴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材料的本色及自然原貌,二是最简单适用的本质功能,三是少现人为痕迹的制作工艺,四是支持器物运转的技术不露声色。未经任何非本质因素与外在力量戕害的本性之形象是朴美的内在属性和审美意象,它往往表面上看似无秩序,实质上含纳着器性本身与天地自然的秩序。素朴无华的器物本然的存在状态,是造物艺术的一种质朴、简淡、醇厚之美。

(二)“含德之厚”的实美

38章云:“处其实,不居其华。”老子的“实”是一个与“华”相对的形容事物内容性的概念。《说文》曰:“实,富也。”段玉裁注:“以货物充于屋下为实。”其意为充足、富有、满也、塞也,有者为实,凡中质充满者皆曰“实”。老子所言的“实”意指本质的真实与充实。在器物艺术中它指的是质之饱满、物之厚实、工之精良、用之持久,是道之理性与“含德之厚”(55章)的显现。这种品质使器物赋有技术的善与实体的性。《淮南子·齐俗训》云:“不器无用之物。”精工严制的器物是以“用”为前提,实既是本体功能的美学表征,也是功能价值在器物上的主要承载形态。它天然地具有物质性的审美属性,其美学境界指向即是器性稳态发挥的美,崇尚功能实体道德价值取向的美学内涵。

15章云:“俨兮其若客”,“俨”是道的本体现象和运作属性,意为庄严、恭敬、端整之态。老子用俨来指代合道事物的严谨、规整属性。它也是器物坚固耐久的形象表现,是合乎外界因素和自然器性的最充分的器之实的体现。范应元41章注:“方之大者,无所不通,故无圭角。”^{[23]530}“大方”指端谨、规整的形象,这样的器物能“无所不通”地顺应人、物、境的变化,是一种能适应实时功能需求的实存的不变存在。《考工记》亦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器物是经由最严谨的逻辑分析,因顺实时需求、使用环境、部件材料、制作工艺,进行规矩的创制而得出的结果。器物本体是一种具备了功能审美意义的“质料”,实之特性是器物性能的构成形式,也是底层运作要素,质性实体会通

过自身的形象化使器物得到美的呈现与表达。

整体浑然、落落大方的器物形象主要是基于功能依附的技术和器物构造的形态。器物的各个部分及要素应呈现出恰到好处的严整、完备程度,模块化的部件应可替换更新,以确保器物运转顺畅、功能发挥稳定。它是技术工艺精湛、材料结实整全、结构严丝合缝、构件稳固灵活、造型比例适度等方面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共同作用的效果集合。实美之器的创造与制作追求的是视觉和心理上的可信赖和有效感。它往往似重而非笨,似呆而非拙,正所谓“建德若偷”(41章),刚健有力的盛德反若慵惰,这样的器物初看起来给人不灵巧之感,但形象间实质彰显的是一种具有稳定、牢固、厚实、沉穆、忠实、端严等符号特征的器用质性美,这种审美意向是对呆板、笨重、蠢拙、沉闷之表面感受的审美否定和精神超越。严谨、可靠、耐久、实用是器物本体与功能属性的良好状态所自然产生的美感形象。

(三)“致虚玄妙”的无美

《道德经》所论的“无”可谓空虚,但它并不是要去掉万物。冯友兰说:“无,其实就是有,”“虚,其实就是实。”^{[24]336}造物艺术中的“无”是一个多意指的范畴,它与“道”的性质与作用最为相像,亦可作道的别名。在器物美学中,无与道的部分属性则几乎是相同的。15章用“旷兮其若谷”来形容道的空无,此为器之无的本质属性。21章云:“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为器之无的存在和运化状态。器之无,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它实为器物之大盈,是德之精、性之象的实质成分。无物之处可见着“象”与“物”的生成与变动,这种“玄妙”之感是器之无的美学特性。它超乎声色、名相、思议之表,是道象的表征,“大象无形”(41章)是器物虚空的审美形态。

11章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器物看似虚空的部分实则是功能产生的特殊而必要的条件,“有”给人以便利,“无”发挥它的功用。器物的实有与虚空

是“有无相生”(2章)、相因而立的,老子认为器之用的重要性不下于器之体,物质实体要素的存在意义是提供使用功能。造物艺术更注重的是功能的实现、达成,而非物质的占有、消耗。器用之美因物质实体而产生,也会自然地反衬出器物本体的美。在互依互彰、各美其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器之无的功能美含义是美有于无、美在用无,造物的实用之美是其形态意象。

老子认为最美的器物形象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14章)，“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淮南子·原道训》)，它带给人的体验感受是视觉形式之“无形”，听觉形式之“无声”，表达形式之“无言”，其本质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那是单凭感性所不能全然把握的其妙无穷、其微无竭的无象审美至境。这种审美观不仅着眼于器之物象，也着眼于器物的整个意义世界，通过形态表现器物的灵气、生机和力量，力求呈现其中所含融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等，是一种自由的、无功利的审美思想。在形、意、神的虚实相资的体悟关系中，承载着物象、意味、气韵、意境等美学特质与功能、好尚、伦理、习俗等文化属性，展开的是冲淡自然、内涵充实的审美意蕴。

器之无既是物理世界中的虚空，也是精神世界中的场域，前者是空间上绝对性的无，后者是时间上始源性的无，它们产生的器之用价值是容纳和释放于器物本体的，无体则用无所著，无用则体无所施，非体无以能用，非用无以成体。器物从整体到局部应形成一种本体价值的自然外化机制，具备施展与生成的主体性。造型结构、实体构件、内在技术、运转机制支持使用功能，形制外观、器饰纹样、文化符号、使用形态展现艺术蕴涵。这样的造物艺术能组构器物虚实要素的作用，整体气氛呈现一种饱满、适用、动态、空灵、无限的自然状态。器之无是一种无中生有、以实表虚、象蕴于空的造物美学，器用功能美与器物内涵美统合于无之形象的美学含义。

(四)“和光同尘”的和美

42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是一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其本质是

“阴”“阳”两方面的互动平衡，“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荀子·天论》)。器物由阴阳两种具体元素构成，其存在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是阴阳运化和合的结果。阴阳的律动与均衡是器之和的内质前提，它也是造物之道的运显。15章用“涣兮其若冰释”“浑兮其若浊”来描述道性之和的本体和表现形态。这也是器物大德的一种表现，41章云：“上德若谷”，此处“谷”为“俗”之省，意指高上至德之器，性象反似流俗，即“和光同尘”之义^{[25]265, [22]213}。它是器物不违物理、因顺自然、内外相合的属性与物象。56章云：“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玄同”是造物艺术追求的和美至境，王纯甫曰：“玄同者，与物大同而又无迹可见也。”^{[14]278}器物之和，本然的自性开敞、和融，不见固蔽、偏狭、孤隔，以开豁的方式与一切内外事物并存共荣，臻于“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的境地，那是含敛光耀、混同天地，显出器物世界一气运化之自然和谐形态的美学意象。

55章云：“知和曰常，”王安石16章曰：“常者，乃无始以来不变之称也。”^{[26]41}器物的和合质性具有一种稳定、持续的“常”态。16章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器德之“全”必有“容”，故“常乃容”。器之和所具有的常态就是“容”，基于器物自身德性的整全建构，其本身容有天、地、物、人之德，阴阳调和而正反要素统一，物性自足而含纳万象，进而形成对秩序或规律的适应性和对其他因素的包容性，一是内和于物，达到本体的均衡稳定，二是外和于境，与外界趋向相适相应。这样的器物会产生“光而不耀”(58章)、合抱万物、并融境域的“流俗”“和同”审美形态。和之属性状态具有自身性、空间性、时间性，总体上是一种动态平衡属性，是器物美的内在原动力。和气集于中，盛容发于外，而成大德之象，清适、宁和、盈通是器物和合美感的本然呈现。

适用性需求的满足、最充分的材料本性、所有相关资源的统合、社会文化的观照、技术的自然适宜性等方面是器物和合性象的本源。器物系统性、结构性、复合性地包含着一切元素，每个部分或要素都赋有整体的性质和意

味,各种相容或对立事物之间达到相辅相成、相生相应的总体稳态。这种本性样态展开的是绝对丰富、涵盖全面内容及其形象,这样的器物其本身也保持了最和谐本然的状态。内容、功能、价值、意义是整全、得体、合宜的,体现着功能与文化在器用场景中的多重适应性,以及器物与环境的关联与互为,也反映出使用者与自身、自然、社会的良性关系。造物艺术的和美追求的是一种赋有整体性、协调性、共生性、和合性品质的器物和谐属性与样态。

三、《道德经》的造物审美价值含义

“无为”是《道德经》造物艺术中最重要的实践观念,这是道的本质所决定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无为即是顺道而为,是实现“自然”价值的途径和手段。造物无为的学说发于《道德经》,它是一种原则性方法策略。无为是为之本^{[27]223},亦是有为之宗,造物依顺规律、器物自然简单、契合本然需求,达成的是主体与对象、目标与形式、结果与价值的统一。这个过程具有丰富的行为美学含义,创造着造物审美的要素及建构。从无为造物的自然而然到自然器物的自然而然^{[28]499-500},造物美学涉及理念、现象、作用、效果等多维对象结构,艺术意向基于功能性与文化性而形成,展开审美形态与意义内容。

(一)“柔之胜刚”的主体与方法

身心及行为与“道”相合之人即是老子所谓的圣人,作为道的载体或道的人格化,造物者亦是圣人,故《周易·系辞上》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九天生神经》云:“视之不见名曰夷,精也;听之不闻名曰希,神也;搏不之得名曰微,气也。”臧玄静认为“精”“气”“神”即是道性在圣人身上的常驻和显现,混三为一成造物者之真,散一为三现造物者之应^{[25]228-229},它阐释了造物创造活动的内生力度。2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即从道而为。40章曰:“弱者道之用。”造物“无为”的实际行动发挥即是柔为,老子认为这是最有力量和行事效果的造物方式,“强大处下,柔弱处上”(76章),“守柔曰强”(52章)。它表现出造物主体及方法的“柔弱”“不盈”用“反”的审美意向,这种善

为、顺为、少为、小为反而可以收到较大的作用和成效,“守柔”是造物行为美的总体特征。

“慈”是造物主体的内在品德,它符合天道,与柔弱相通,是主体意向的审美基质。《说文》释“慈”为“爱”,一种无私的、无条件的大爱,超越了贤愚、善恶、亲疏、尊卑、人我等一切差别的博爱。张岱年说:“善利万物而不争,救人救物,皆是慈的含义。”^{[29]440}《韩非子·解老》云:“若以慈卫之也,事必万全,而举无不当,”造物者要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与人、天地、万物为善之心,无分别心地去并包万物、长善救失,一视同仁地去关爱人、物这两个造物对象。这样的心行使造物活动能够与天地之道相应、与造物的本质需求相应、与自己的真心本性相应,体现出造物者心性与行为的仁厚宽阔自然通达的思想境界。

13章云:“贵以身为天下,”49章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造物者要像重视自己的身体一样重视造物及其对象,诚心实意地关注真实需求才是造物之担当。49章云:“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造物者应收敛主观意欲,心思归于浑厚纯朴,消解占有的冲动和一己私欲,不破坏造物活动的正常秩序,正所谓“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67章)。“无私”“不争”“不敢”“不有”“不恃”“不宰”“无身”“无事”“无为”“无欲”“不欲”“不为”皆是造物者之慈的品格主张,秉持这样的造物态度才能成为造物的主宰。它指涉着一种“无我”审美意向,个我不与物对地融入群我中,揭露生命的内在需求和造物的本质,并呈现出回归实际生活及环境、理解他人生活方式、指向器物意义的感性联结。主体的无我能将生命与万物融入整个造物世界,将小我充实为大我,无身、忘身而成就对造物根本价值的追求。

28章云:“知其雄,守其雌,”老子认为造物者的“雌”柔中必应含有“雄”健的气质意象,这是对自己实力、资源、自信的充分了解^{[9]317},是对造物行为和进程的掌控。“其雄”是认识、状态,“其雌”是表现、原则,居雄是造物者的优势地位,懦弱、谦下、敬畏、虚怀是造物者的守雌姿态^{[9]317}。造物实践的主体行为

美即表现在这种柔顺、身退、适度的自然无为精神。这种看似消极的表现,实则是出于慈爱的柔弱至道,是最大的积极,是内在强大和生命力饱满的体现。钱钟书说:“老子所谓‘圣’者,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30]655} 不尽造物之能事,是无法达到自然之境界的。2章中的“生”“为”“功成”都表明老子主张造物者要去发挥、去作为、去创造,但它需要依据顺自然为柔为的认知方法和造物方法。

其一,虚静玄览。“致虚极,守静笃。”(16章)“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淮南子·修务》)王夫之曰:“明白在中,而达在四隅,则有知矣。”^{[31]9}“涤除玄鉴”(10章)揭示造物活动的终极依据和普遍规律,察觉事物背后的隐密微妙之道与理,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心视、心听的直观、静观、双观是一个向内反求的过程,它排除了自我为中心、智巧与诈伪、成见与偏见,敞开了广大、超脱、开放的心灵。对造物之道的感悟、领悟和把握带有虚静、玄思、自觉、体验的意味。“以身观身”(54章)、以物观物、以性见性、观道识真,心通于达万象之理,目明于尽秋毫之末,在理性直观而非逻辑推理的形式中,呈现的是妙悟、体深、体大的感性与知性之内蕴融生。

其二,遵天循古。造物遵天即是合自然规律而“辅万物之自然”(64章)。王弼25章注:“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20]66} 根据所造器物的事物理性,“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国语·越语下》)以自然柔为的方式实践造物的行为意向,“故静则建乎德,动则顺乎道。”(《韩非子·喻老》)68章云:“配天,古之极也。”古文中“天”与“古”释义相通^{[32]203}。造物的历史经验是常见常用的早已显化了的自然规律,是已沉融在造物文化环境中的人之道。它是源古通今的存在,赋有根植于自然之道的传统意味。明史故“能知古始”(14章),常析规律,可“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4章)。造物遵天之道、循古之律,在整个世界时空的范围里,无分别地关涉到社会世俗与天地维度的法则与内容^{[33]56},是一种透着自然文化气息的行为

境域。

其三,尚“俭”。河上公27章注:“圣人不贱石而贵玉,视之如一。圣人善救人物,是谓袭明大道。”^{[19]38}造物从“俭”是符合道的,是慈、柔在行动上的一种表现,以“不敢为”的姿态节约和珍惜材料、物质、人力劳动、费用成本。67章云:“俭故能广;”27章云:“常善救物,故无弃物。”对造物资源的节俭实则是为优化组织利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使资源效用得到最大化的发挥。造物之俭追求节制、少费、爱惜,有而不用、少用、不尽用、尽其用的行事原则,它充分地展现着主观能动性的价值。纯朴、俭啬、简约是俭为的内涵,含藏着培蓄、不奢靡的意象,它们生成于素朴、求真、务实、勤俭的造物行为方式。

其四,“为大于其细”。老子看重通过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效果的造物方法,63章云:“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也重视人在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积极作用,63章云:“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64章云:“慎终如始,则无败事。”面向造物的整体目标,从反向角度关注局部或细处的造物之事,化大难为小易,积小为变大为,慎重认真、谨密周思、细心而为的态度贯穿和表现在整个造物过程中。15章用“豫兮若冬涉川”形象地比喻这样的行为状态。观大见小,观多见少,以小成大,以少成多,整体把握下的每个细节和小问题的处理充满着人的积极作用,都是仔细、专注、毅力和耐心的体现。在这样的创制活动里可以看到厚积的功夫和劳动智慧,折射出的是考虑周全、精心创作、精良制作的造物精神和形象。

(二)“少则得”的物态与形象

器物的物质形态是造物结果及其功能的表现形式,22章云:“少则得,多则惑。”老子认为器物的表现形式定义着器物“得”的本质,只有以“少”的器物形态,才能获得简单自然的外形效果,形式上的“多”对造物无益,反而会引起审美的不适感,这是造物“无为”的形态艺术理念。少不是一个边界确定的固定性概念,它具有一定的程度性和相对性。合宜的物态是表现形式上的少遵循了适度才引出的

特质。它并不是单纯对简单形式的追求,而是在就器物精髓的准确把握前提下,对造物要素重点而整体地完美诠释,表面上有去掉或无化的倾向,但实质上已经将丰富的内涵完全包括了进去,通过形式因素的减少实现器物的含物纳理、执简御繁、臻达自然。

物态应是造物符合功用要求和排除一切不必要装饰之后的自然呈现。叶朗:“他这儿说的‘美’,已经明确地与‘善’区别开来。”^{[34]30}陈望衡认为,老子已经开始把美当作表现形式来使用了,进而有了与之相对应的内容美^{[35]51},1章、81章分别论及了器物的内容美与形态美^{[11]80}。老子认为造物的形态之美是为内容之善服务的,进而否定了纯粹的外形美^{[34]32}。物态的生成并无自主性,它不是单纯的物质化存在,不具有独立的美学意义。造型上否定与器用功能无关联的人工而为的雕凿浓艳、纹饰堆砌、繁缛精细、奇巧纤丽,39章云:“是故不欲琤琤如玉,珞珞如石。”不看重玉“琤琤”的华丽,而应推崇石“珞珞”的质朴浑实,《淮南子·齐俗训》亦云:“器完而不饰。”《韩非子·解老》云:“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有违大道的礼制规定式和表面的型与纹丢失了情质内涵,这些都属于非本质的外直观的貌饰范畴,是老子所摒弃的物态形式。但这种否定意向并不笼统地拒绝造型之美,它反对的是破坏或束缚内容质性和充当虚伪的漂亮外衣的形饰,能被置于“道”“德”价值框架内作为次要元素保留下来的就是美的。

造物活动应专注于器物的内在与本质的需求,让表现形式随内容而定,器物形态随器性而生。器物的形态艺术贵在少而精的深刻道理,一是尽量减少对材料的人为加工,二是利用物质实体的虚空形态,三是与器用属性相匹配的必要造型与纹饰,四是合理而不复杂的结构与形式组织。在诸多的信息量被梳理和整合后,以一种尽可能简练的手法,运用较少的物态感知形式去承载和表达造物的功能及文化内容。不为世俗道德所累、不为固有形式法则所束,通过看似相反(真正与形态认知相反)的形式实现看似相反(实际与形态目的不

相反)的物态,以无形式的形式、无装饰的装饰,内容外式、并得其美地创造出最为简单化形态的器物。

老子不刻意于物态的完美,但因其追求器物内容和质性的完整而能表达出完美的形象,器物的艺术美汇聚和表现于形象。38章云:“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造物艺术表现出的绝不是浅表虚浮又华而不实的形象,而是至简至明而深广丰蕴的形象,这种以少得多的审美意象源于表现形式的特征,也是道的物象性质所决定的。9章云:“持而盈之,不如其已;”44章云:“多藏必厚亡。”老子认为过于繁复杂多的造物意象对于器物本身的德与性的呈现与释放实则是有害的,最根本的简化的本源性审美形象,反而能饱满明晰地营造出“藏”和“盈”的整全、意味、开放化器物形象。只有具备了这种超然感觉状态的器物才是圆满而理想的,并能在相应的环境或情景中产生平衡、稳定的意象生发与建构。一形而众形藏,一象而盛象逸,器物的内容要素在以质胜文的恰当品质形象中才能以自然、真实、朴质、简洁的方式得到审美化展现。

吴澄21章注:“物象为粗而德为精。”“形之可见者成物,气之可见者成像,皆德中之所有。”^{[36]28}器物的质性要素在状、象之中的展开是器物内在的“气”的运化,它是一个生长、流变的物性之“精”的显化过程,在不断运转的相互转化、相互融合、相互作用中,能表现出与器物之“名”相符的器物含义,使规定器物本性的“德”整体自然地表露和展现。器物的审美形象是器用之善及其形态之自然两个方面的互为与表达,赋有本元性的基质意象和深约精广的含融意象,表现着创制和使用过程中所融注和塑造的器物文化意味与艺术生命精神。这种形象的展开是形意、虚像、神韵的动态反映和美感意向的综合,它以内藏而外溢的状态存在着,具有场域性、流动性、多维性、空灵性和超越性的美学特征。

器物形象承载了造物艺术品相存在和变化的微妙而整体的表现,它自然、直接、有力地传递着造物美的完整意义及其艺术价值。从结构到形态、材料到质感、技术到工艺等都是

携带着简单而深刻意指的感知对象,一是器用目的清晰直白,功能形式匹配明确,使用方式简单易懂;二是造型、工艺、技术简洁而平实,外形上似天然性的浑然而协调;三是形态要素与内质成分隐喻丰富,展现着器性的艺术与文化意蕴。器物的朴拙、玄妙、精约形象,呈现的是自然而简雅、大方而和谐、超然而自适的品质意象,所生成的是通物、见理、达意、体情的艺术气象与至味境界,那是天然淳朴、宁静淡雅,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审美体验。让人在感官效果和心理感知的阐发中照见融合天、地、物、人之本然需求与价值的深远高妙的审美意义,领悟到器物世界所展开的简约意蕴之象与境。

(三)“为腹不为目”的目的与效用

器用本质需求是造物艺术的首要目的,“为腹不为目”(12章)是造物“无为”的功能价值主张。“腹”指人的内在自我、无意识、本能,“目”指人的外在自我、欲望、感觉世界^{[25]243[1]55},“为腹”是使用功能、伦理、文化等方面的适用性,“为目”是非必要性的功能、使用方式、外在造型。12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器物的这类“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特性即是“为目”的范畴。这样的造物艺术创造出的是诉诸人的身与心的极乐之美,是感知觉上普遍快适的对象,也直接关联人的欲望心理,所以老子并不承认这种美。35章云:“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顺道而为、契合人自然本性需求的器物应是平淡、朴实、简素的,没有无关器用功能的多余要素和非质性内容的意味,这种出于满足人的根本需求的造物才会具有符合本然价值的审美形态。

为着欲望和非本质目的而脱离了器性功能的产物即是“奇物”“舟舆”“甲兵”等“什伯人之器”(“十百人之器”)(80章)能够十倍百倍地提高劳动功效,制造出大量物品来丰富物质生活^{[13]157,[28]375,[32]206},“文彩服”“利剑”等“难得之货”矫饰浮华,用途特别,感觉珍贵而新奇,令人艳羡,“仁义”“忠信”为上的礼制之器看似尊重和维护着伦理与秩序,使社会更加

文明,但实则都是对“大道”“上德”的背离,不符合自然审美的基本精神。它们形态夸张、技术繁复、功能堆砌、意义扭曲,遮蔽和扰乱了器物的自性,只会带来令人“目盲”“耳聋”“口爽”“心狂”“行妨”之类的后果,都属于老子所鄙弃的对象。

器物自性所有的实用功能是造物的价值核心,所有造物因素都应服从于器物实用性,这是《道德经》造物美学之根基和内涵原点。29章所言的“甚”“奢”“泰”是奇物的品性与状态的整体特征表现,指的是器物上的过量要素和附着部分,即三种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性质与样态,它们是不自然或反本质的功能、技术、形态存在方式。苏辙29章注:“圣人知其不可逆,则顺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过而伤物,”^{[10]38}这是老子主张的防止创制出奇物的“三去”思维观念。器物的本质属性是不可违逆的,累赘的、过载的、技巧的、形式化的不朴、不精、不名的内容对象,都是功能美学所应极力批判和去除的。

务本、致用、简约、唯实的造物功能安排不看重任何非本质和形式维度的要素,将所有关注力都集中于具有实际意义的实用性,所有要素都连接和融合于器用功能。它并非是为之而不能,而是能之而不为。在世俗道德下被认可的器物表现形式、技术效力、伦理取向,只要其在造物之道的统摄下具有功用意义,都可成为器物组成要素和审美形态的一部分。从社会生活与生产劳作的真实需求出发,实用之美应包含物质层面的使用性和精神层面的体验性,它体现在为“食”“服”“居”“俗”等生活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提供方便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器物功能的充分发挥呈现着使用功能、技艺形态、文化承载、艺术表现、观念传播等价值之美。

为民生、为社会是造物活动的出发点和始源,也是器物的效用审美指向。28章云:“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这里的“官长”与“大制”类似于“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周易·系辞上》)中的“法”。人作为天地自然的特殊产物,可谓“神器”“神物”,在裁制与管理这层意义上,

人与器物、万物相通,亦是可被规约、化育和安顿的^{[13]137,[32]202,[19]40}。造物者对器物的开发创造、合理谋划以及功能的设定与利用,能生发出具有价值传递和教化作用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一种隐性制度和软性治理方式。吴澄28章注:“大制则以不制为制,故不割裂也。”^{[36]40}造物因顺人、物之自然,尊重人的本然应有的自性具足状态,不妄为而割裂其全、破坏其性,使人得以抱朴而归心,这种器物之大制以不制而治之,故造物“为无为,则无不治。”(3章)它是老子的“爱国治民”(10章)“安平泰”(35章)社会理想在造物艺术上的寄托,也是其造物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33]2}。

实用主义的造物艺术不以物质占有为前提,不以心理刺激为导向,用最简单适用的功能实现方式授人以道、德。它使人“虚其心,实其腹”(3章)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在使用、接触、观看的过程中“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5章)3章云:“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常使民无知(智)无欲。”^{[26]43}合道而简适的器物不会扰乱感官、役使人心,让人体悟到生活与自然的大道,帮助人去除“智辩”“伪诈”“巧利”的邪陋之思。范应元46章注:“人能明道,自然知足。”^{[23]533}外无可欲之境,内无能欲之心,下化于百姓,上化于统治者,小化于家乡,大化于邦国天下。争逐、贪图、攘夺的不良欲念和社会冲突无所生,使人们心灵开阔、坦怀适然,心思净化,这种“无知无欲”“自然知足”的“愚”态,即是人们的纯真质朴状态,它保持着纯朴、自适、本然的天性。

物质朴素和精神富足让人们味至道,德莹身,和光人世,所在皆安,吴澄80章注:“以所食之食为甘,以所服之服为美”“以此身之居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为乐而乐之”^{[36]113}。“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80章)造物的教化效应会触发人的自我化育的机制,进而使人朴素、宁静、简淡化地自我发展。《尚书·五子之歌》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淳朴自然纯真的天性和道德心会形成良好的政风和民风。人民安乐、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家国安

宁,整个社会自然会趋向于“小国寡民”(80章)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理想^{[37]125}。故17章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真正的素朴淡然之美是从真心本性中自然而然地导出和流露的,而绝非任何虚伪和勉强所能为之,这是造物“自然”和“为不为”的本有之义。这种完全出于自性本能的、毫无居心的、既不知其然又不知其所以然的心性与品行,是一种内在的复归呈现出的宁静超然的审美之象。

四、结语

《道德经》的造物审美观是一个凝集诸多文化价值和实践观念共同作用的艺术现象,其内涵构建在合于天地自然、人之本心、社会伦理的基础上,具有深刻精妙的哲思高度和自然意象。造物之美,合道而呈性,内有大道之实,外有盛德之容,它不是一般意义的造物艺术美,而是自然的、本性的、纯朴的、简单的、和谐的真美、大美,含融着相对性、本元性、至高性的功能逻辑、文化结构与行为思想,崇尚的是大象、大巧、大德、大成、大化之艺境,用老子的言说方式概言之可谓“美可美,非常美”。这样的造物美论虽有一定的保守复古的历史局限性,但并不掩盖其东方智慧的高明和魅力。作为一种传统造物美学内在的思想定势和器物艺术发展的内趋力,《道德经》造物艺术的审美指向、审美评判、最高价值、美学精神^{[38]67},都成为后来中国古代造物审美的认知与思维引导^{[39]29},并在世界范围内对现代设计形成了明显而广泛的影响^[40],这些造物审美思想在当代对生态设计、传统式设计、数字智能化设计仍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黄嘉德,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 [2]李均洋.《老子》哲学的海外认知[J].中国道教,2016(3):27-30.
- [3]张岱年.论老子在哲学史上的地位[M]//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4]陈鼓应.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J].哲学动态,2005(7):55-64.

- [5] 池田知久.《老子》的“道器论”[M]//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2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6] 董京泉.论老子的思想中心[J].社会科学战线,2014(2):26-31.
-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8] 刘笑敢.老子哲学的思想体系:一种模拟性重构[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2):79-99+159.
- [9] 刘笑敢.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修订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0] 苏辙.道德真经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1]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上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12]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3] 憨山德清著,尚之煜校释.老子道德经解[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14] 陈鼓应.老庄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15]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16] 许抗生.老子与道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
- [17] 罗安宪.虚静与逍遥——道家心性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18] 林希逸.老子鬳斋口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19] 河上公,杜光庭,等注.道德经集释(上)[M].北京:中国书店,2015.
- [20] 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21] 朱谦之.老子校释(第二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2] 许嘉璐主编,李春晓,翁美凤点校.马叙伦全集老子校诂[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
- [23] 范应元.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下)[M]//张继禹.中华道藏(第十一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2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25] 成玄英.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M]//张继禹.中华道藏(第九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26] 王安石.王安石老子注辑佚会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27] 颜师古.玄言新记明老部[M]//张继禹.中华道藏(第九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 [28] 池田知久.问道:《老子》思想细读[M].王启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29]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30] 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第三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 [31] 王夫之著,王孝鱼点校.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9.
- [32] 俞樾著,王华宝整理.诸子平议(一)[M].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
- [33] 汉斯-格奥尔格·梅勒.《道德经》的哲学[M].刘增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34]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35] 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第二版)上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36] 吴澄.道德真经吴澄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37] 陈柱注,冯玉校订.老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38] 王荔.中国设计思想发展简史:石器时代—清代[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5.
- [39] 邵琦,等.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史略(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
- [40] 严荷菱.从老子到密斯——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中的“少则多”[J].江淮论坛,2016(6):114-117.

(责任编辑 南山)

Adherence to the Legislative Approach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Poli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LI Liyan¹ ZHANG Xiaoqing²

(1.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100, China)

Abstract: Legisl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prerequisite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rticle 6 of "Legislation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legislation shall uphold and develop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which has the value of demonstrating the political logic behind the rule of law, aiming to directly express the state's political stance via an explicit legislative form, highlight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style democracy centered on the people, and confirm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socialist democracy as well. The cognitive principle from the general to the specific should be followed to analyze the dialectical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islation and politic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al the basic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legislation. The logical justification of upholding the people's position in the legisl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display its profound cultural roo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expose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adhering to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in legisl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focus on the socialist legislation practice in the new era and reveal the 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Key words: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legislation; political logic

Construction Logic and Practical Approach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YEYiming¹ CAO Yongsen²

(1. School of Marxism,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2. Jiangsu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Jiangsu Administrative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09, China)

Abstract: Soci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ensuring social stability in the new journey toward fully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as emphasiz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generation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three-level progressive trend of social management model can be found; from the "centralized management"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government-led market economy, from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o public service-centered mode, and from an innovative governance system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to a "governance community" with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By clarifying the value logic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s inherent ideological orientation value, the value of practical behavior norms and the val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an be revealed. Via grasp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further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 ability to seize opportunities, respond to challenges, and transform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s into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can be strengthened, thus more effectively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where "everyone has their responsibilities, everyone fulfills their duties, and everyone enjoys the benefits".

Key words: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logic; practic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CP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me, Logic and Prospects

LIU Li¹ JIA Baoyu² YING Yan¹

(1.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ser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the main threads running throughout the century-long journey of the CP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which contains ten major themes,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lue theory, path theory, strategy theory, talent theory, system theory,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heory, scientific spirit theor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ov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the CPC'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can be exam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and the path f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a leading ideological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for the future can be explored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party building guidance, mission guidance, strategic guidance, talent guidance, and cultural guid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der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of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urriculum: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LIUYuanxin¹ WANG Wei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urriculum.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urriculum demonstrates the strategic orientation value of combining spiritual inspiration with the determination to serve the country in the dimensions of motivational encouragement and educational mission, reflects the soul-casting and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pling of virtue fostering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dimension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displays the integrate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specialty-social service" in the field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dimension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which aims to build and promote a "top-down" and "bottom-up" multidimensional and spatiotemporal cultivation paradigm for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with dialectical thinking.

Key words: "Five Histories" education; curriculum-based ideolog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otivational encouragement; casting soul and cultivating people;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Prospects of Empowering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Evaluation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on Deep Ecology

LIAO Li^{1,2}

(1. Education Group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2.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Kashgar University, Kashgar, Xinjiang, 844000,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Arne Naess's deep ecology theory, adopts a three-in-on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system-ecological wisdom-ecological niche",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holistic system construction,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wisdom, and tool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entrism, which transforms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to an operational intelligent evaluation technology framework. The study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still faces three challenges: the vulnerability of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the theoretical-practical gap in algorithm fairness, and the cognitive barriers of data interpretabilit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building a "law-technology-ethics"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system, especially achieving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fairness correction algorithms and cross-cultural correction paths, and constructing a dual-channel interpretation model to narrow the understanding gap. The intelligent ecological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proposed in this study will open up a new path for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in the evalu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decisions made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ep ecology; early childhood learning evaluation; educational fairness; technical ethics